

学校代码: 80201

学号: B10500002

分 类 号: C

密级: 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学位论文

## 普罗米修斯在中国

潘桂英

导师姓名及职称: 陈中梅 研究员  
系 别: 外国文学系  
专 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 究 方 向: 西方古典文学暨文论

评 阅 人: \_\_\_\_\_  
答辩委员会: \_\_\_\_\_  
答 辩 日 期: \_\_\_\_\_

2013 年 5 月

## 普罗米修斯在中国

### 中文摘要

普罗米修斯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在延续已近 3000 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奥德修斯之旅”中，普罗米修斯形象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以并非“十全十美”、颇能精湛表达古希腊“节制”精神的“原型”、以及作为彻底反叛者的“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为两座丰碑。1907 年，鲁迅通过《摩罗诗力说》首次介绍了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并在 1930 年提出的“翻译盗火说”中将普罗米修斯直接比附“革命者”。1924 年，郑振铎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小说月报》上首次介绍了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原型。普罗米修斯身上体现的“抗暴”精神，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革命志士们带去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激情。然而，在足够肯定普罗米修斯这一外来形象带给中国的仁人志士与革命进程以绝对正面效应的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普罗米修斯原型还是他的近代形象，普罗米修斯在中国都单向度地、绝对正面地表现成了彻底的反叛者、革命者和胜利者的象征，与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极为近似。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换言之，普罗米修斯原型进入中国后，其全貌几乎完全被遮挡在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所形成的主流中；两种形象（甚至是西方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多种形象）已然混合成为了一种形象，而以近代形象的面目示人。普罗米修斯的原型和近代形象，这两个里程碑式的形象进入中国，却因为其中一个形象的过分展现而失去了二者本应受到制约的平衡。普罗米修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在一种貌似十分明确的评判定势之下，隐含着学界人士对理解这一经典形象在西方文学的复杂变迁过程中囫圇吞枣、不求甚解的含混与模糊。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固化，阻碍了我们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人们受压的心灵只能关注那个“十全十美”的、作为彻底反叛者的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那么在经历过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之后，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回头去审视一下那个进入中国也已将近百年的普罗米修斯原型。一直蒙蔽真相的幕帘，已到了该被扯下来的时候了。如同上个世纪中国急需普罗米修斯近代革命者形象一般，在经济飞速发展（这有赖于逻各斯精神的大放光芒）而“秘索思”失落的今天，我们或许能从普罗米修斯原型身上发现“制衡现代文明”的一束亮光。

**关键词：** 普罗米修斯；原型；近代形象；节制；单向度；误读

## Prometheus in China

### ABSTRACT

Prometheus is a classical image in Wester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ourney of Odysseus” which has lasted for almost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image of Prometheus has undergone persistent and complicated transformations in which there are two significant milestones: the “im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rototype intending to express the spirit of “control” of ancient Greece, and the modern new revolutionary image as a thoroughgoing rebel. In 1907, Lu Xun introduced the modern image of Prometheus portrayed by Shell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directly described Prometheus as a “revolutionary” in his “Translation of Stealing Fire Said” presented in 1930. In 1924, Zheng Zhenduo, for the first time, introduced the prototype of Prometheus by Aeschylus in *Fiction Monthly Magazine*, an authoritative journal at that time. The spirit of the “anti-authority” embodied by Prometheus brought unprecedented fighting passion to th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rometheus, the imported image, indeed and surely enough exerts an absolute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nevertheless, the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finds that Prometheus appears as one-dimensional and as an absolute positive image in China who symbolizes the thorough rebel, revolutionary and winner, which resembles the modern new revolutionary image. Prometheus of that meaning is sanctioned by usage. In other words, after entering China, the prototype of Prometheus is almost completely blocked in the mainstream of the modern image of Prometheus. Or rather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two images (or even many images of Prometheus in the West) blended into only one image taking the form of the modern image of Prometheus. So, because of the excessive show of the modern image of Prometheus, the two landmarks of the prototype and the modern image loses the balance which should be constrained. The reception of Prometheus in China, under a seemingly very clear judgment, implies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vague and

fuzzy image of the classic's complex changing process i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A comprehensiv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totype of Prometheus has already been hampered by the stereotype of the modern image of Prometheus in China. If it is true that in modern time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determined that people in pressure could only look on that "perfect" modern image as a thoroughly rebel, then after experiencing a bloody revolution era, we are supposed to go back and reconsider the prototype of Prometheus who has been in China for almost a century. It's time to pull the curtain back which covering the neglected truth. After the urgent need of the modern revolutionary image of Prometheus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the rapid economic progress but a lost "mythos", we may find a glimmering light for "checks and balances for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rototype of Prometheus.

**KEY WORDS:** Prometheus; Prototype; Modern image; Control; One-dimensional; Misinterpretation

## 目 录

中文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2
KEY WORDS .....	3
绪 论.....	1
一、选题的来源.....	1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4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5
第一章 形象变迁.....	7
第一节 最初的文学形象：工于心计的行骗者.....	7
第二节 古希腊原型：奠定普罗米修斯普遍形象.....	9
第三节 过渡形象：知识精英的诉求对象.....	11
第四节 又一座里程碑：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	13
一、歌德笔下自由不羁的叛逆者.....	13
二、拜伦式悲剧英雄：隐忍而悲壮.....	14
三、雪莱的普罗米修斯：完美的革命先驱者.....	14
小 结.....	16
第二章 进入中国.....	17
第一节 革命语境呼唤.....	17
第二节 进入中国.....	19
一、歌德的普罗米修斯.....	22
二、普罗米修斯式人物：拜伦.....	22
三、雪莱的普罗米修斯.....	25
四、古希腊原型.....	28
第三节 积极反响.....	30
一、革命领域.....	30
二、思想文化领域.....	31
小 结.....	34
第三章 走近原型（一）——并非“十全十美”.....	36
第一节 重看“盗火”.....	38
一、神并非“爱”人——“我让凡人不再预见自己的死期”.....	39
二、神界的“叛徒”.....	41
第二节 普罗米修斯的骄横.....	43
一、骄横(Hubris).....	44
二、“预见”与“不死”.....	46
第三节 “先知”的恐惧.....	48
一、“不管什么，都会使我不安”.....	48
二、“你们曾被预告，并非秘而不宣，并非突然袭击”.....	50
第四节 “妥协派”.....	51
一、与歌队及俄开阿诺斯.....	52

二、与伊娥.....	54
三、与赫尔墨斯.....	55
四、三万年后.....	56
小 结.....	59
第四章 走近原型（二）——普宙和解.....	60
第一节 敌对与和解.....	61
第二节 “节制”体现的“智慧” .....	66
第五章 国人的误读.....	69
第一节 误将 hubris 当革命激情.....	71
一、杨晦的《普罗密修士》 .....	72
二、灵珠的《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 .....	74
三、其他文本.....	76
第二节 忽略“普宙和解”之深义.....	77
第三节 其他误读.....	81
一、简单解读普罗米修斯在宙斯与克罗诺斯之间王权争夺战中的立场 .....	81
二、简单解读普罗米修斯被绑高加索之原因 .....	81
三、误读普罗米修斯给予人类的“盲目的希望” .....	82
四、误解歌队在悲剧中的作用 .....	82
小 结.....	83
第六章 误读之缘由.....	86
第一节 艰难处境下的实用主义态度.....	87
第二节 对“隐忍”民族性的反叛.....	89
小 结.....	94
结 语.....	97
中外文参考文献.....	99
英文参考资料.....	99
中文参考书目 .....	99
中文参考论文.....	102
中文参考文献.....	102
后 记.....	104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1

## 绪 论

### 一、选题的来源

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伊阿佩托斯（Iapetos，十二提坦巨神之一）与女神塞弥丝（一说俄开阿诺斯之女克鲁墨奈）之子，他聪明、诡谲、多才多艺。其名字前半部分 pro- 为前缀，表示“在前”、“先于”；后半部分 metheus 意为“知识”或“知道”，合在一起表示“先知”之意。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技术而成为人类利益的代表者。在一次神灵举行的决定人类权利和义务的集会中，普罗米修斯想做得比宙斯还要狡猾，想出了一种诡计来骗取天神们应享受的食品。他把肥油裹着的肉和脏腑放在一边，另一边却放着盖了一层富于引诱性光泽的肥油的骨头。他叫宙斯去挑选，很愚蠢地希望宙斯会被外表所欺骗。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而故意挑选那些骨头，并拒绝向人类提供火种。于是，普罗米修斯再次向天神宙斯发起挑战，成功地用茴香杆盗取天火带回人间，使人类得以发展各种技艺，从而告别了蛮荒时代。作为报复，宙斯将火神赫淮斯托斯创造的女人潘多拉送下凡间来迷惑众人，使他们惹下许多祸事。普罗米修斯更是未能逃脱惩罚。他被绑在高加索的巉壁上，日晒风吹，并有宙斯派来的老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白日啄食殆尽，夜里复又生长。直到三万年后赫拉克勒斯射死恶鹰，普罗米修斯方得解放。<sup>①</sup>

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显然并不完全具备一位英雄应有的光辉形象。赫西俄德在《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中首次将普罗米修斯写进了文学作品，其描述与最初神话并无大异。赫西俄德之后，“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创作了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深为遗憾的是，其中的《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和《带火的普罗米修斯》均早已佚失，仅留下残余片段待后人研究。在仅存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形象较之从前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埃氏一改普罗米修斯在神话传说中原本狡黠的盗火者形象，而代之以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多角度阐释性的受难英雄形象：其主调是庄严、高大、敢于蔑视宙斯强权，虽然性格中也有鲁莽、骄横、狡诈、恐惧、反复无常等诸多负面因素，但背后又隐藏着剧作家更为深刻的意图。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借悲剧人物形象精准概括了古希腊人的善恶观：“悲剧的主人公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sup>②</sup>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承载了埃氏对真实人性、社会道德的全面探讨。笔者将这一极其复杂的形象称为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古

<sup>①</sup>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笔者参考：[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7 页；王甜甜：《变异与重塑——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与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3-4 页。

<sup>②</sup>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修订版，第 97 页。

希腊原型，他成为文学史上该形象树立的第一个里程碑。

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古罗马的奥维德、维吉尔、塞内加、阿刻绪斯、琉善等，都创作过关于普罗米修斯的题材，但其创作基本都未能超越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原型。唯一有变化的是，本以“盗火者”面目出现的普罗米修斯开始变成主要以“人类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并且带有了阴谋家的特性。随后，西方文坛继古希腊罗马文学之后进入黑暗漫长的中世纪，普罗米修斯一直沉寂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马洛塑造的浮士德博士和弥尔顿塑造的反叛英雄撒旦，才又再现了与普罗米修斯相似的“提坦精神”。

时间的钟摆走进十八世纪，一群德国青年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歌德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题为《普罗米修斯》的戏剧，塑造了启蒙时期的时代英雄，表达了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身上不甚明显的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日渐偃旗息鼓，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崭露头角。拜伦于 1816 年创作的《普罗米修斯》奏出了激昂火热的战斗激情，对当时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诗人在诗歌结尾处强烈而悲壮地预言：普罗米修斯必将高唱胜利的凯歌。“拜伦式英雄”也因拜伦的个人遭遇与精神气质和普罗米修斯的接近而得名。尽管这些形象都未能超越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但为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再次飞跃作好了准备。1819 年，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完成。雪莱以“爱”的精神贯穿整个诗剧，将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为“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开创了西方近代全新的革命者形象。普罗米修斯形象继原型之后再次树立了新的里程碑。雪莱之后，再现普罗米修斯题材的大有人在，然而均未突破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古希腊原型和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sup>①</sup>

近代以来之中国处于由旧社会向新社会发生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水深火热。新文学发动期以西学为“新”，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启新的资源，参与新文学的思潮进程和文体创设打开了合理的大门。<sup>②</sup>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应运而生”。1907 年，鲁迅通过《摩罗诗力说》首次介绍了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以及“普罗米修斯式人物”拜伦，并在 1930 年提出的“翻译盗火说”中将普罗米修斯形象直接比附“革命者”：“人常常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艰深正相同。”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就是革命者的象征。适逢雪莱、拜伦逝世百年纪念，《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当时著名期刊纷纷以介绍、纪念二人为头条，文人墨客竞相重写、改写和引用普罗米修斯的相关题材。随后，茅盾、郑振铎等人又相继介绍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形象和古希腊原型。1924 年，郑振铎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小说月报》上首次介绍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大概剧情：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宙斯因此而责罚他，将他缚在岩石上。但他骄傲地沉默着，心中只有一件高兴的事，那就是宙斯将遇到一个只有他知道的恶命运。

<sup>①</sup> 关于普罗米修斯在西方形象的嬗变，参考王甜甜：《变异与重塑——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与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3-9 页。

<sup>②</sup> 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总序”第 8 页。



最终，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复相和好而得了释放。<sup>①</sup>不管是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还是以雪莱创作为代表的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一时间都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普罗米修斯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英雄的标杆。

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的“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普罗米修斯作为革命者形象进入中国并引起强烈反响是必然情况，因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需要革命者的力量。并且，作为革命者的典范，普罗米修斯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激情。但是，在足够、充分地肯定普罗米修斯这一外来形象带给中国的仁人志士和革命进程的绝对正面效应的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原型、还是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更多地被理解和阐释成为一个绝对正面的革命者形象，与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极为近似。换言之，普罗米修斯的原型进入中国之后，其全貌几乎完全被遮挡在雪莱创作的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的主流中；或者说两种形象（甚至是西方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多种形象）混合成为了一种形象，而以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的面目示人。普罗米修斯的原型和近代形象，这两个里程碑式的形象进入中国，却因为其中一个形象的过分展现而失去了二者本应受到制约的平衡。人们说到普罗米修斯，并不区分是哪一个普罗米修斯，而只关注他所代表的革命者和启蒙者的崇高意义，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而关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相异于那种象征符号的普罗米修斯原型所涵盖的概貌与意义，却只有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带有先入为主性的解读。例如 1934 年，介绍过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郑振铎以《取火者的逮捕》为名创作了由四部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子。郑振铎在序中表示，他所作的小说集，其写宙斯统治被推翻的情形，虽不甚同于雪莱之所写，而其颂扬“人”的胜利、“正义”的胜利的情调，却是一致的：“大悲剧家这伟大的三部曲虽仅存了中间这一部，而我们读之，却是怎样的感动！那伟大的为人类而牺牲的普罗米修斯，便是一切殉教者的象征……就这三部曲的全剧看来，其情节还不是反叛的；人和神是终于得到一条和解之路……英（国）诗人雪莱的‘Prometheus Bound’却更敲弹了一个别调：表示出永不屈服的人的精神来。”<sup>②</sup>可以看出，即使是对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较为熟悉的郑振铎也更青睐于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的原型所携带的“人神和解”也是一笔带过。如上已言，这在当时特殊年代可以理解。但是，对一个形象的绝对重视极为可能造成对另外一个相关形象的忽略，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固化已经阻碍了我们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尽管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更难把握。正如陈婧凌在她的论文《普罗米修斯的历险——一个古希腊形象的中国流传与挖掘》中所写：“西

<sup>①</sup> 郑振铎：《文学大纲（七）》，《小说月报》1924 年第 15 卷第 7 期，《文学大纲（七）》第 6、7 页。

<sup>②</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IV、VI、VII 页。

方文明的源头，古代希腊和希伯莱，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遥远得近乎缥缈。但是对普罗米修斯来说，这么一个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要穿越两千多年的岁月，进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却有一个绝好的途径，就是英国的浪漫诗人拜伦和雪莱，尤其是拜伦……这位近代的‘普罗米修斯’，被视为中国启蒙者的先驱与典范。”

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人们受压的心灵只能关注那个“十全十美”的、绝对高尚的革命者和启蒙者形象，那么在走过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之后，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回头去审视一下那位进入中国也已将近百年的普罗米修斯的原型。西方古典学者没有放弃对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执着研究，他们试图多方位解读“悲剧之父”的经典剧作，中国至今却鲜有相关做法，更无系统研究。东西地域虽相隔，学术精神却不应分高下。尤其是作为研究人员，审慎的研究态度不可或缺。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中梅发表《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首次专篇颠覆了普罗米修斯在中国的十全十美的英雄形象，言简意赅的语言力透纸背：“埃斯库罗斯相信，无休止的抗争不符合当事者的根本利益，把正确推向极端将导致错误。”陈先生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通过对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分析而开启了对国人心目中完美的普罗米修斯主流形象的修正之门，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常规思维局囿，挑战了人们思维中某些定型的固论。笔者正是受之启发而开始了对“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这一问题的全面思考。

##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指出普罗米修斯在西方具有两个里程碑意义的形象，纠正中国对该形象一概而论的完美英雄印象，提请我们在西学接受过程中尽量避免囫圇吞枣的错误。

第二：为国人还原普罗米修斯原型的真实形象，澄清某些常识性概念，打破国人对原型的狭隘性和错误性理解，并为后人昭示那个“奇迹”的希腊难能可贵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理性精神。普原型远非只是一位人类利益的战斗者，而是可以上升为宇宙整体和谐的捍卫者。并且，他体现了过度与节制的辩证关系，为人们激情四溢之时建立起“度”的标尺，规避激情勿要超越理性的轨道。诚如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家”伊迪丝·汉密尔顿说：“与希腊是激情和理智的结合对照，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时代更近乎狂热和平庸的交替。”

第三：从本真的不完美的普罗米修斯的原型身上寻找人类普遍性的意义。普原型并非完美，他虚荣、纵容 Hubris（骄横）、还不时流露出“不知”的恐惧。然而，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它指向“每个人”的卑微与真实，但又不止步于此。承认弱点，但不局限于弱点，从弱点处升华出方法和意义，这就是古希腊艺术的“真”与“美”的关系。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演变、该形象的文学再现、普的近代革命者形象的论文数量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由于笔者着力挖掘的是普罗米修斯古希腊原型在中国的接受状况,故以该形象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为重。

杨晦、罗念生、李健吾、缪灵珠、王焕生、陈中梅先后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但由于三联剧的佚失等原因,普的古希腊原型一直淹没在其近代革命者形象里,阐释意义限定在启蒙、奉献等崇高精神范畴。上个世纪,缪灵珠表述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绝对正面的形象;<sup>①</sup>叶君健歌颂一心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普;林昭写《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严杰人创作《今之普罗米修斯》。除此之外,当时活跃于文坛的柳丝、沈玄英、洪深、玄珠(茅盾)、华林一等都对普的古希腊原型有介绍评论,但都未走出完美“英雄”的立场。<sup>②</sup>

截至目前为止,通过“中国知网”的查询,题目中带有“普罗米修斯”的论文有 157 篇,其中主题含“埃斯库罗斯”和“普罗米修斯”的论文 96 篇。国内优秀硕士论文以“普”为题的有 11 篇、以“普”为关键词的有 10 篇,博士论文以“普”为题的有 2 篇。关于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角度有:以普象征中国现代启蒙者命运的民主、科学精神角度;赞扬由鲁迅开启的以普精神象征翻译人员的“借火煮肉”;阶级斗争角度;人文主义角度;法律视角;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角度;古希腊人命运观角度;普与鲧或女娲比较看东西方文化之差距;科学与文化的矛盾角度;结合普的两个里程碑形象勾勒其在中国的接受状况;普作为古希腊神明的性格弱点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将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派归结为普罗米修斯似的英雄和维特似的多愁善感的才子两种类型,认为维特身上缺乏的恰好是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感。

关于和本论文相关的涉及“普的性格弱点”的论文有《重读古希腊悲剧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但都是点到为止,未从系统上去就该问题进行研究,更未对此进行升华。值得专门提出的是上文提及的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中梅先生发表《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重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另外,刘小枫的《昭告幽微》的第一章节“普罗米修斯之罪”,力图证明普罗米修斯并非埃斯库罗斯所作,普罗米修斯实则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化身,所涉及的内容可供笔者参考。

相较于国内,国外对《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研究时间更早、视角更丰富。

1、关于《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佚失内容,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根据剧本残存片段以及 an Apulian red-figure vase-painting 推断《被释囚的普罗米修斯》的剧情梗概。

<sup>①</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 年第 6 卷第 5 期。

<sup>②</sup> 能从表述中找出对普一味的抗争精神些微质疑的是柳无忌在《希腊悲剧中的人生观》借欧里庇得斯之口指出屠杀生灵的战争是一个最不合理的方法,争执可以通过谈判或议会的方式解决。但他的这一提法并非专门就普讲的。参看柳无忌:《希腊悲剧中的人生观》,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3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13 页。

2、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James Scully 和 C. J. Herington 打破了普罗米修斯的完美英雄形象，指出普罗米修斯身上存有与英雄形象相悖的“负面”因素。普罗米修斯也有恐惧，他消除恐惧的心理支撑是他深知自己握有宙斯婚姻秘密的筹码，宙斯必会同自己友好。并且，普罗米修斯的行为还时常自相矛盾。他对宙斯的婚姻秘密，时而守口如瓶，时而自我泄露。他与宙斯既曾结同盟，又树为敌人；虽以为敌，却又同质，二者有着同样的骄横，A.J. Podlecki 早前曾就相关问题提出过同样见解。

3、关于智慧，Simone Weil 提出普宙存有对智慧的同质性：普宙之争其实是智慧的较量。从这个角度看，普罗米修斯实则比宙斯强大。宙斯正是因为缺乏对未来秘密的智慧而影响其宝座岌岌可危。宙斯也并非万能，他也需要借助其他神的智慧。在埃斯库罗斯的其他剧本中，宙斯是智慧的象征，而这里普罗米修斯却成了更高智慧的象征。

4、关于普罗米修斯与凡人的关系，Richmond Lattimore 指出二者关系紧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为人类受难、最后终被半人半神的赫拉克勒斯释放。

5、关于“度”的思想：Richmond Lattimore 认为普罗米修斯与宙斯虽为神明，却都要受制于“度”的掌控。一方面，宙斯的力量既不绝对，更不永恒，他也要受复仇三女神的掌控，威胁其宝座的婚姻秘密也掌握在普罗米修斯手里。另一方面，普罗米修斯也被容纳在有限的“度”内。首先，他的预见性有限；其次，他的骄横有限；再次，他对宙斯的反抗也有限。

6、关于“必然”：Richmond Lattimore 指出一切（pre-nature）都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之中，解除不安氛围的是，普宙终将和解的 Nature（或译为“定数”，或译为“必然”）——superior power.

7、关于最后的和解：David Grene 指出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惯常出现的让步与和解主题，并借普罗米修斯表达了人类的经验：智慧与蛮力相争，虽痛苦却终会胜利。Simone Weil 也提到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和解：普宙敌对是表象，同质才是本质。埃斯库罗斯深受毕达哥拉派影响，和谐（harmony）才是埃氏要表达的中心。

8、关于自由：Simone Weil 提出普罗米修斯的“自由”，普罗米修斯帮助宙斯、帮助人类、和宙斯和解，都在其自由选择范围内。

# 普罗米修斯在中国

## 第一章 形象变迁

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起源已无以稽考。根据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关于神话的起源观来看,该神话与火的起源问题密不可分,是最古老、最具世界性的神话之一。类似的故事在印第安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神话中均可以找到。<sup>①</sup>在系统的文本模式出现之前,这些故事极有可能已为人们口口相传。荷马提到过普罗米修斯的父亲伊阿佩托斯和提坦,但未提到普罗米修斯。公元前 8 世纪的赫西俄德首次将该神话写入文学作品。

普罗米修斯神话世代流传。至 20 世纪中叶,像“普罗米修斯式人物”和“普罗米修斯式人文主义”这样的表述已很流行,它表达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与颠覆。然而应当指出,此种表述相对来说出现较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才逐渐形成。在已经延续了近 3000 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奥德修斯之旅”中,普罗米修斯神话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其间经历了各式各样、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阐释。<sup>②</sup>

### 第一节 最初的文学形象：工于心计的行骗者

古希腊神明普罗米修斯第一次出现于文学作品是在公元前 8 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中,所占篇幅均很短小。《神谱》中的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同辈,是提坦伊阿佩托斯(伽娅和乌拉诺斯之子)与美踝的克吕墨涅<sup>③</sup>之子。他聪明狡黠、喜行欺骗,和他的三个兄弟阿特拉斯、墨诺提俄斯、厄庇米修斯一样,都因违逆宙斯而受到惩罚。赫西俄德对他的描述带有“半喜剧”的味道,故事是这样的:

神灵与凡人发生争执。为与奥林波斯之王宙斯比赛智慧,普罗米修斯宰杀一头大牛,并布置了一个圈套:把牛肉和肥硕的内脏堆在牛皮上,放于凡人面前,上面罩以牛的瘤胃,而在宙斯面前摆了一堆白骨,巧妙堆放之后蒙上了一层发亮的脂肪。识破诡计后的宙斯勃然大怒,不愿把不灭的火种授予会死的人类。普罗米修斯再次挑战宙斯,用一根空茴香杆偷走

---

<sup>①</sup>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68.

<sup>②</sup>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68.

<sup>③</sup> 忒修斯与大洋神俄开阿诺斯之女,他俩的孩子均为诸河之神。参见[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2 页。

火种。愤怒得无以复加的宙斯立即给人类制造了一个祸害，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他为人类送去带给他们不幸、只能同享富裕而不能共熬贫穷的女人潘多拉。普罗米修斯更是罪责难逃。宙斯用挣不掉的绳索和无情的锁链捆绑了他，用长矛剖开他的胸膛，派大鹰停在他身上不断啄食他那不死的肝脏，但夜晚肝脏又复生长。为给自己卓越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带来荣誉，对普罗米修斯仍很气愤的宙斯最终还是捐弃了前嫌，让赫拉克勒斯杀死大鹰。普罗米修斯的痛苦也得以解除。赫西俄德在故事的结尾处评论到：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像伊阿佩托斯之子、善良的普罗米修斯那么足智多谋。<sup>①</sup>

赫西俄德把普罗米修斯神话嵌入到了另一部关于道德和训诫的诗歌《工作与时日》中，以教导他的侄子佩尔塞斯：要尊重神的正义，欺骗是不道德的行为，只会阻碍发展。他开篇称颂代表正义与公正的父神宙斯，谴责“挑起罪恶的战争和争斗”、“乐于伤害”的第一类不和女神；并将这类不和女神与第二类“有益于人类”的不和女神作对比，指出第二类不和女神给人激励，鞭策人们进行正面攀比而热爱劳作，有利于人类进步。紧接着，赫西俄德便引用普罗米修斯神话：是“狡猾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宙斯）”，宙斯才为人类“藏起了火种”、“设计了悲哀”。普罗米修斯神话明显成为了第一类不和女神的注解，是他挑起了神与神、神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不像第二类不和女神期望人类那样的勤劳致富。欺骗是勤劳的反面。普罗米修斯在赫西俄德的叙述中被作为反面例证，他玩弄的花招打破了“原本生活在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sup>②</sup>的人类的安居乐业，“迎”来了“可怕妇女的起源”潘多拉。尽管他预见了宙斯送给厄庇米修斯<sup>③</sup>的这一礼物会“成为人类的祸害”，但却没有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短浅。带有赫尔墨斯的“谎言”和一颗“狡黠的心灵”的潘多拉，俨然就是那个欺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在某种角度上的翻版，宙斯的这一报复行为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见他对欺骗行为的极端厌恶，赫西俄德还讲到：“无所不见的宙斯也从不唆使对他们（人类）发动残酷的战争，饥荒从不侵袭审判公正的人，厄运也是如此。”<sup>④</sup>是普罗米修斯挑战了宙斯，可怜的人类是因为普罗米修斯对宙斯鲁莽的欺骗而惨遭株连。赫西俄德一再强调正义，要劳动，不要欺骗，不要说假话去伤害正义，“害人者害己，被设计出的不幸，最受伤害的是设计者本人。”普罗米修斯罪有应得，因为“财富不可以攫取，神赐的财富尤佳。一个人如果以暴力夺取巨大的财富，或借狡猾的辞令进行骗取……神灵（就会）贬斥他……夺取是恶，它会带来灭亡……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劳动、劳动、再劳动”。<sup>⑤</sup>

显然，赫西俄德是站在奥林波斯父神宙斯的立场记述和评价普罗米修斯神话，正如韦尔南所说：“在赫西俄德描写的城邦制以及以前的世界里……在天国，公正则是一个至高无

<sup>①</sup> 参考[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5 页。

<sup>②</sup>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 页。

<sup>③</sup> 普罗米修斯之弟，“事后者”。

<sup>④</sup>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8 页。

<sup>⑤</sup>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1 页。

上却又远不可及的神。”<sup>①</sup>用布鲁内尔·皮埃尔的评价就是“屈从于神意”，即“宙斯的意愿”。而人类只是宇宙秩序中的微弱部分，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作为独立发展体的权利。人类的真正快乐在赫西俄德笔下不占任何分量。“在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永远轮回地生活未必就是好事。不仅尊重宇宙秩序，还要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并在二者之间寻找智慧的和谐，几百年后的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为我们提供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另一种崭新诠释。

## 第二节 古希腊原型：奠定普罗米修斯普遍形象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456 年）对普罗米修斯神话极为青睐，该题材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他现存最早的作品《波斯人》后的萨图罗斯剧题目是《普罗米修斯——点火者》（前 472 年），其中萨提尔赞扬普罗米修斯对人类恩惠的一个片段还出现在了纸莎草纸上。公元前 467 年，埃斯库罗斯在《七勇攻忒拜》的萨图罗斯剧《斯芬克斯》的片段中也提到了普罗米修斯和他的花环，说这花环是他最好的锁链。<sup>②</sup>

不幸的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的写作年代已无从考证，近年来多数人都认为它一定晚于《奥瑞斯提亚》（前 458 年），创作于埃斯库罗斯最后一次西西里之行。<sup>③</sup>《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三联剧<sup>④</sup>的第一出，<sup>⑤</sup>其他两出为《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和《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均已佚失。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新生的奥林波斯神系初掌世界。不同于赫西俄德的“半喜剧”式叙述，埃斯库罗斯从那个遥远的创世神话中设计出的是一个具有政治性和宗教性的悲剧人物，<sup>⑥</sup>他首次奠定了世人心目中普罗米修斯高大的普遍形象。赫西俄德笔下作为伽娅孙辈、与宙斯同辈的普罗米修斯一跃而成宙斯的叔辈、老一辈提坦的一员。连他的兄弟，埃斯库罗斯也只提到了那位悲壮的受苦英雄：阿特拉斯。普罗米修斯成了“本身也是大地（伽

<sup>①</sup>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40 页。

<sup>②</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

<sup>③</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sup>④</sup> 试图将“普罗米修斯”三联剧重构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作家通常指称其为《普罗米西亚》。

<sup>⑤</sup> 一些学者认为《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讲述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为三联剧第一出。笔者赞成 James C Hogan 的观点，《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为第一出，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在该出戏中得以讲述，这一行为也并不需做前期解释；而《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很可能是最后一出，它讲述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和解，以及火把节的成立和在雅典崇拜普罗米修斯的节日庆典。详见 James C Hogan.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274. 另外，James Scully 和 C. J. Herington 也认为，有确定的理由可以证明，《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紧接现存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而《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在时间上一定晚于普罗米修斯的释放，详见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01-103.

<sup>⑥</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

娅) ”<sup>①</sup>的塞弥丝的儿子, 直接继承了“大地”母亲对未来之事的预知能力, 掌握了连宙斯都无以得知的秘密。这个只为塞弥丝和普罗米修斯所知的秘密, 成了普罗米修斯对付宙斯的唯一也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并且, 通过普罗米修斯出场时所作的自我表白, 埃氏展示了普罗米修斯在神族斗争史以及人类文明史上的双重重要性:<sup>②</sup>是普罗米修斯帮助宙斯打败提坦一族, 建立了奥林波斯神权; 也是普罗米修斯不仅给了人类火种, 还带去了一切技艺。

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 宙斯初为众神之王, 这位在埃斯库罗斯其他悲剧作品中正面的人神之父形象, 在此只剩下了凶残、多变和专制的特性。他决意摧毁人类, 而普罗米修斯却在此时因盗火惠人而获罪。神匠赫法伊斯托斯与强权和暴力上场, 将普罗米修斯钉于高加索之巉壁, 而使其成为了不公正力量的受害者和正义的殉道者。河神俄开阿诺斯一方面同情普罗米修斯, 但一方面也指责他僭越了权利。因为无论普罗米修斯的初衷何等善良, 他毕竟违背了神族规则。<sup>③</sup>俄开阿诺斯的劝说遭到了普罗米修斯的拒绝和反对, 他向歌队表示自己不怕苦难, 宙斯终会同他“联合, 建立友好的关系”, <sup>④</sup>因为他握有那个足以推翻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宙斯的另一位受害者伊娥向普罗米修斯讲述了她的“命运”, 普罗米修斯预言伊娥的后人将会解救自己。赫尔墨斯劝说普罗米修斯说出宙斯的婚姻秘密, 否则宙斯就会加重对他的惩罚, 但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 甚至扬言让宙斯给予自己更残酷的酷刑, 最后在山崩地裂中坠入深渊。

敢于救援凡人, 为宇宙秩序中渺小的人类盗取火种; 敢于因此而同奥林波斯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叫板, 让其无法一手遮天, 并身限镣铐而毫不示弱, 埃斯库罗斯将命运的天平直接拉向神界, 其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文学史和人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宇宙秩序不(再)像在传统的神谱中那样建立在一个主神的威力、他的个人统治或‘王权’之上, 而是建立在宇宙的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 这种规律和法则要求大自然的所有组成部分都遵循一种平等的秩序, 任何部分都不能统治其他部分。”<sup>⑤</sup>是普罗米修斯, 首次气壮山河地正面挑战了宙斯的王权, 誓要为人争得一份利益。尽管他在埃斯库罗斯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受难英雄的形象, 但他对宙斯的抗争, 已全然不同于公元前 9-8 世纪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的消极反抗。<sup>⑥</sup>作为与“自然”抗争的先驱者, 他开启、表达的是人类整体心灵中对强权和压迫的正面抗争, 代表了人类以自己的意志和智慧去突破宙斯的秩序、去尝试人类的自由:

<sup>①</sup>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 陈中梅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03 页, 注释。另参考:“塞弥丝, 也叫大地(众多的名字, 同一位神灵)。”(《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第 212 行)

<sup>②</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

<sup>③</sup>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70.

<sup>④</sup> “他(宙斯)会酥软意志, 总有一天, 被我知晓的方式镇得服服帖帖, 罢息难消的怒气, 急匆匆地赶来, 和我一样急切, 要求联合, 建立友好的关系。”参见[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 陈中梅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02、203 页。

<sup>⑤</sup>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 秦海鹰译, 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新版序言”第 3 页。

<sup>⑥</sup> 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阿基琉斯, 因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夺了自己心爱的女俘而拒绝出战, 整日拨弄竖琴以排泄苦闷。



“(我)知晓当时在做越分的事情,不想否认,出于自愿。”<sup>①</sup>

然而,这只是三联剧中的一出。从三联剧残篇我们得知,悲剧并非止于鱼死网破。三万年后,宙斯最终让伊娥的后代赫拉克勒斯射杀大鹰、释放了提坦;作为回报,普罗米修斯将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告知了他。<sup>②</sup>他们之间达成了相互的友好关系,一切都不再是剧本之初那看似永难休止的残忍折磨和骄横反抗。他们各自捐弃前嫌、收敛锋芒,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向对方。世界也在暴力与喧嚣的解脱中达成了宁静与平和。

这就是整个三联剧中的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首次塑造了普罗米修斯高大正面的受难英雄形象:他为人类谋利而自陷囹圄,其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一直影响到了当代的读者。也是埃斯库罗斯首次为这一正面形象划定了抗争的界限。<sup>③</sup>普罗米修斯(包括宙斯)不是纯粹的脸谱形象,他和宙斯一样带有古希腊神明不可避免的“神”性缺点,他是在双方“节制”各自缺点的痛苦过程中,才逐渐和宙斯之间达成了正义与神意的谐和,表达了一种循序渐进的进步观。埃氏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因其对宙斯正面的抗争、形象的复杂和意蕴的深远,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普罗米修斯这一西方经典形象史上的开山鼻祖,笔者将之称为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他成为了这一形象变迁史上第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广为后人效仿。

### 第三节 过渡形象:知识精英的诉求对象

继埃斯库罗斯之后,古希腊古典时期以普罗米修斯为主题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未能幸存。但根据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关于神话的结构研究看,这一神话在当时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是很受欢迎。<sup>④</sup>这一时期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虽无法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受难英雄同日而语,但其中的某些主题塑造得也极为成功。普罗米修斯不仅被描述为科学技术的鼻祖,而且有了更为重要的转变:他从受难英雄一跃而成为了人类的创始者。并且,与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生活哲学相关,古罗马时期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带有了反叛权威和颠倒秩序的阴谋家的气质。<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几乎所有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文学文本(完整文本或残篇),其写作都带有喜剧或幽默色彩。<sup>⑥</sup>传统神话的严肃性受到了挑战。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sup>①</sup>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7 页。

<sup>②</sup>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71.

<sup>③</sup>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并非坚持抗争到底。参看本论文第三、四章。

<sup>④</sup>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72.

<sup>⑤</sup> 参考王甜甜:《变异与重塑——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与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6 页。

<sup>⑥</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

现存的《鸟》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搞笑片段；卢西安对普罗米修斯神话进行了滑稽的模仿；即使是柏拉图笔下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讲述的关于人类起始的伟大神话中，也没有给予普罗米修斯多少尊重。<sup>①</sup>此外，古罗马时期奥维德(Ovidius)的《变形记》和《爱情诗》、维吉尔(Vergilius)的《牧歌》、塞内加(Seneca)的《美狄亚》和阿刻绪斯等人都提到过普罗米修斯，但这些形象几乎都源出于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悲剧英雄，并未发生太多变化。<sup>②</sup>

整个漫长的中世纪，普罗米修斯形象都不为世俗所知，而主要出现在学者和教父笔下，他们利用普罗米修斯形象去激化异教徒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视普罗米修斯为那个时代的摩西；而有些人则认为普罗米修斯是被一个无知的民族神化了。罗马帝国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对中世纪神学及哲学、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影响，他之后的作家倾向于对普罗米修斯形象进行寓言式和哲学式的阐述，但他们都只是在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义之间做一些简单肤浅的穿凿附会。<sup>③</sup>

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神话重现光芒，《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出现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版本。但这一时期对埃斯库罗斯的了解也只限于学者范围，人文主义者们通过古代二流作家或神话字典和汇编（仅仅是古代文学中或教父作品中的概括）获得神话的相关知识。唯一的例外是薄伽丘(Boccaccio)的《论异教神谱》(*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其中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为学者的象征和知识的捍卫者。他的被绑高加索，象征了人的心智被困于追寻知识的路途中。普罗米修斯向人们展示了知识文化，帮助人们摆脱原始困境、去寻找对他们自己来说实际的成就感。在薄伽丘笔下，普罗米修斯渴望、也有权利去探寻自然的奥秘。这一主题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学者的共鸣。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摒弃形而上学，成为了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反抗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束缚，呼唤完全的自由。只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悲叹其自我发展愿望永被禁锢的“可怜的普罗米修斯”的处境：普罗米修斯体现了有死之人注定无法获得成就的悲惨命运，他只能做现实世界的奴隶。普罗米修斯在这些哲学家笔下成为了人类处境的象征，是有创意的艺术家，他渴求知识，渴望掌控世界。<sup>④</sup>除此之外，英国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r. Faustus*)中的主人翁身上明显带有普罗米修斯的影子，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的反叛英雄撒旦比浮士德更贴近于埃氏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然而整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按照普罗米修斯神话塑造的形象变化太过随意，失去了形象本身包孕的内涵力量。

<sup>①</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

<sup>②</sup> 参考王甜甜：《变异与重塑——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与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页。

<sup>③</sup> 参考：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72.

<sup>④</sup> 参考：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973-974.

17 世纪，普罗米修斯形象少有创新。比较神话学以《圣经》的绝对权威为基础，视普罗米修斯为异教徒。值得注意的有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Calderon)的《la estatua de 普罗米修斯》，该剧富含深意，是继埃斯库罗斯之后阐释神话的首部重要作品。普罗米修斯与其弟厄庇米修斯象征了激情和理性之间的对抗。对卡尔德隆来说，道德可以强化知识，知识让人摆脱蒙昧、拥有自信：谁开化了人类，就是给了人类知识；谁带来知识，谁就给了人类生命。卡尔德隆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主要阐释。<sup>①</sup>

可以看出，埃斯库罗斯之后至 17 世纪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影响范围有限，未能走出原型涵盖的范畴。但在这些过渡形象中，“人”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绝对的重视，普罗米修斯成为了越来越强调自我的文化人诉诸自身精神和文化处境的一种象征，更多地代表了人类精英阶层对知识的渴望、对蒙昧主义的抗争和对自我精神的诉求，从而为普罗米修斯形象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次新生做好了铺垫。

## 第四节 又一座里程碑：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

18 世纪，伴随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相继兴起，古希腊戏剧更加广为流传，埃斯库罗斯的一些剧本被翻译成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等多个版本。然而，该世纪也出现了一种对普罗米修斯神话极为悲观的阐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批判普罗米修斯在人类社会化的罪恶进程中扼杀了人类原本美好的天性；布吕墨瓦(Brumoy)等人认为盗火行为的本质是“违抗”，而违抗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源头。尽管如此，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积极阐释依然占据了时代主流。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青年歌德以及英国浪漫主义的双子星座雪莱和拜伦分别创作的诗歌，是普罗米修斯形象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演绎。

### 一、歌德笔下自由不羁的叛逆者

18 世纪 70 到 80 年代中叶，狂飙突进运动席扫德国。否定上帝否定权威，推崇天才，主张与自然融合、与现存秩序决裂，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一生经历了欧洲文学史上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两个时期的天才诗人歌德便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代表，他改写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但他的《普罗米修斯》(1773)只写了两幕，并未完成，1774 年又写了一首《普罗米修斯独白》，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诗歌《普罗米修斯》。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位薄伽丘式的教育家，他教导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存在和感受，还教会人们如何去爱。他是社会公正的奠基人和立法者，反对暴力和掠夺，只承认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财富。最重要的

<sup>①</sup> 参考：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75。

是，普罗米修斯成为了天才诗人，他的创造源自内心，消除了艺术哲学的抽象性，挑战了假借创造力为名的一切模仿形式。<sup>①</sup>普罗米修斯甚至否认自己的神性：“神明？我不是神，但自认与神一样伟大。”他反对一切外在规则，拒绝对神的崇拜。曾经，普罗米修斯受朱庇特（宙斯在古罗马时期的名字）管制；现在，他与之决然对立！他也经历过迷惘和无助，但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诉说了自己的觉醒，并凭靠自身的创造力，对残暴却又无能的宙斯发起了激烈的攻击。他甚至已完全无视宙斯，尼采让后人惊服不已的“上帝已死”，歌德早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出了：<sup>②</sup>“我就坐在这里，请按照/我的模样造人吧，造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种族，/去受苦，去哭泣，/去享受，去取乐——/而且不尊重你，/也像我！”这就是歌德笔下叛逆英雄的代言人：他积极对待现世人生，具有摧毁一切的革命精神，誓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

## 二、拜伦式悲剧英雄：隐忍而悲壮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日渐偃旗息鼓，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崭露头角。拜伦于1816年创作的《普罗米修斯》打响了激昂火热的战斗激情，对当时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战争的诗人在诗歌结尾处悲壮地预言：普罗米修斯必将高唱胜利的凯歌。“拜伦式英雄”也因拜伦的个人遭遇和精神气质与普罗米修斯的接近而得名。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对可悲的人类满怀悲悯、为其受苦而紧咬牙关的殉道者。他不屈服于任何酷刑的折磨，也不愿让任何人看出他的痛苦。埃斯库罗斯作品中作为普罗米修斯制胜宙斯之一的法宝——神明的不死性——在拜伦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也表现为了“最不幸的天赋”，因为被囚禁的巨人被剥夺了“死的幸福”，只能“永恒”地“忍受”。即便如此，他依然不肯“求得和解”，他保守着对未来的秘密，以无止境的沉默让宙斯悔恨和惊悸。与埃斯库罗斯笔下那位不时还要长吁短叹的普罗米修斯原型相比，拜伦诗中的普罗米修斯从未有过半点哀叹，他在逆境中顽强振奋，与敌人对抗到底，读者感受到的完全是一种强烈而悲壮的情感。

## 三、雪莱的普罗米修斯：完美的革命先驱者

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诗人们纷纷崇尚希腊精神。雪莱以埃斯库罗斯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阐释为基础，于1820年创作了别具一格的五幕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雪莱表示非常喜欢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却无法容忍在自己看来有损道德和正义的普宙和解，他完全改写了埃氏剧本的结局，“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

<sup>①</sup> 参考：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77.

<sup>②</sup> 叶隽：《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普罗米修斯〉断片中的“宿命叛逆”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第70-71页。

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sup>①</sup>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的雪莱从小广读诗书，上学期间就对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生发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压迫的仇视。离开学校后，满眼望去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黑暗腐朽，更加坚定了他的民主自由思想。雪莱对于社会的反叛意识越来越强烈，他的诗剧有着明显的政治性。英国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自己所遭受的压迫，让雪莱深感要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彻底推翻现存秩序。他将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为“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sup>②</sup>他智慧勇敢，捍卫人类而不屈服强权，充满了乐观精神，代表了爱和希望，他博大的胸怀甚至可与基督相比；<sup>③</sup>而朱庇特却象征着一切暴君和人类的压迫者。诗剧在矛盾的紧张对立中展开，却整体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革命情绪。雪莱继承了歌德在两幕诗剧中表现的思想，即支配世间万物的不是神，而是“全能的时间和永恒的命运”，雪莱称之为“必然性”。他认为社会和自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是历史之必然规律，坚信人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达成善良和公正。普罗米修斯最终在伊翁涅（希望）和潘堤亚（人的信仰）的帮助下战胜了邪恶势力，朱庇特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神族被彻底打垮，宇宙恢复了爱的秩序。作为人类捍卫者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代表了人类和一切万物的解放。不可否认，雪莱的思想极具超前性，并对当时的社会革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历史也证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缺乏社会根基的乌托邦理想的脆弱，它只能以失败收场。

歌德作品中与朱庇特争得平等地位的叛逆者、拜伦笔下隐忍而悲壮的受难英雄，通过雪莱的塑造，靠着爱的力量和他人的帮助最终彻底推翻了压迫势力。神被驱逐了，普罗米修斯代表的人胜利了，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开始了。相较于埃斯库罗斯笔下那位通过漫长痛苦的煎熬而达成最终的智慧——与宙斯和解——的普罗米修斯，雪莱的普罗米修斯与对立阶级决裂了。雪莱在埃斯库罗斯、歌德和拜伦等人作品的基础之上树立的完整丰满的西方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使普罗米修斯形象继古希腊原型之后达到了又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该形象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浪漫主义支持者们争相效仿雪莱树立的这一主题形式。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帕斯奎特(Pasquet)、格雷尼尔(Grenier)、雨果(Victor Hugo)、托马斯·布莱克韦尔(Thomas Blackwell)、伏尔泰(Voltaire)、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 énard)等人都对普罗米修斯神话加以了阐释。就连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序言中，为了充分论证伊壁鸠鲁学说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也借用普罗米修斯——“哲学日历上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sup>④</sup>——去表达“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sup>⑤</sup>的深刻哲理。这些形象和歌德、拜伦以及雪莱

<sup>①</sup> [英]雪莱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邵洵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原序”第1页。

<sup>②</sup> [英]雪莱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邵洵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原序”第2页。

<sup>③</sup> 余冰：《欧洲文学中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嬗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7页。

<sup>④</sup> [德]马克思：《〈博士论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sup>⑤</sup> [德]马克思：《〈博士论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等人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一起，共同建构了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而在这些共同建构中，以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最为有力：他在漫长岁月中遭致压迫、折磨和酷刑也决不放弃、决不妥协，最终彻底推翻朱庇特的统治，吹响革命胜利号角；他也不再是埃斯库罗斯三联剧中那位可从多角度阐释的受难英雄，他是彻底的反叛者、革命者和胜利者。

## 小 结

普罗米修斯形象在西方的发展确实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奥德修斯之旅”。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意义，并非只限于今人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和“普罗米修斯式人文主义”等术语的指代。从赫西俄德笔下攻于心计的行骗小丑，到埃斯库罗斯笔下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独具古希腊贴近事实之理性精神的受难英雄原型，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精英阶层诉诸自身对知识的向往和对蒙昧主义的抗争的过渡形象，到最后歌德、拜伦以及雪莱等人笔下作为彻底的反抗者和胜利者的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普罗米修斯神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阐释与发展。应予以再次强调的是，在这漫长的形象变迁中，埃斯库罗斯塑造的古希腊原型和以雪莱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成为了普罗米修斯形象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需指出的是，现代主义的兴起让卢梭等人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悲观解释有所回巢。犹如尼采批判苏格拉底将人类带进了痛苦的理性文明一般，普罗米修斯也成为了现代文明攻击的对象。他的人类创造者形象受到了质疑。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西方人深感衍生自机械文明的种种现代性痛苦，向往回到那原本“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普罗米修斯被置于了现代文明的两难困境之中。<sup>①</sup>阐释的多样性正说明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广博魅力，普罗米修斯似乎成为了任何一个时代均可借以表达自我的一种象征。

---

<sup>①</sup> 一方面，普罗米修斯代表了对旧势力、旧传统的抗争；但同时，对“旧”的抗争中也包含着走向矫枉过正的危险。

## 第二章 进入中国

### 第一节 革命语境呼唤

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一片水深火热。乾隆后期，闭关锁国，大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败，中国自此落后于世界大潮。吏治腐败，军队腐化，武备废弛，人民生活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曹雪芹写“红楼”讽喻“末世”，龚自珍哀叹“衰世”如“将萎之花，惨于槁木”。与世隔绝的落后状态，被英国商人带来的特殊商品——鸦片——打破。19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鸦片销蚀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人的精神；鸦片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白银大量外流；鸦片的泛滥让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林则徐虎门销烟，却为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找到了借口。此次战争以清廷失败告终，中国由此签下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之后，中英在虎门就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相关问题又签下了《虎门条约》。英国的获利，让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十分眼红。他们纷至沓来，在中国的土地上趁火打劫、肆意攫取。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之下，被动卷入世界漩涡，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动荡难安的中国，承受着深重的外部侵略。法国侵华，中国不败而败；中日战争，辽东失陷；《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清政府完全沦为了“洋人的朝廷”。日俄为争斗中国领土，在中国的土地上厮杀，清政府竟宣称要“局外中立”。<sup>①</sup>英国在西藏点燃战火，德国炮舰驶入长江，日本觊觎东三省。刀俎之下，鱼肉反抗。孙中山等人拉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却又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中国又进入到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荣所剩无几。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世纪之交的中国。她衣衫褴褛，毫无光彩。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危机，让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彻底明白了战斗之必须、“睁眼看世界”之必须。“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sup>②</sup>林则徐、魏源、姚莹、许继畲、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陈宝尊、黄遵宪、严复、孙中山、陈独秀等一批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向西方学习以求民族自强。文学界亦无法只沉浸于艺术的天堂。

<sup>①</sup> 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96 页。

<sup>②</sup> 赵瑞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 页。翻译意思如下：如果要发扬祖国真正的伟大的精神，首先在于认识自己，同时也要了解别人。有了周详的比较，才能产生自觉。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表述了“别求新声于异邦”<sup>①</sup>的思想：“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sup>②</sup>并且，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翻译介绍“战斗的作品更为要紧”。<sup>③</sup>此时的文人们希望寻得借此“就可以生存，就可以发展，就可以进步，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sup>④</sup>的“摩罗”力量，以为政治斗争服务。

当时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如文研会、创造社、太阳社等，都积极投身进入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在我国的推介这一伟大事业，且成绩斐然。西方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文学与现实相连，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主张，深深激励了一代中华儿女。他们于20世纪初头十年将这一思潮引进；随后，创造社成立，郭沫若、郁达夫、湖畔四诗人、前期新月派等，使浪漫主义开始在中国发出强音；至20世纪30年代，为了纪念法国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100周年，中国文学界开始较为系统地介绍浪漫主义。<sup>⑤</sup>浪漫主义文学的引进对中国文艺界、思想界的影响不可小觑。郭沫若说：“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sup>⑥</sup>文学研究会成员王统照，表达了国外“叛乱诗人”的力量：

叛乱的诗人，其思想以革命为根底的，他们不满意于道德，宗教政治艺术等古旧的因袭的，束缚的观念，所以先时事而高揭革命的旗帜，为群众的导引，从智慧的反射镜中，映射出诗人心底的火焰，随其生命活动的区域，而无往不熊熊灼灼向一切社会之堡垒的防御线而放射，燃引。此等观念，如雪莱（雪莱），如裴俄（雨果），如哥德（歌德），皆已占据了他们的中心，……而以拜伦为最甚。<sup>⑦</sup>

这些叛乱的革命诗人，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中国也十分相似。相似历史背景之下发出的抗争——以拜伦助希腊独立为甚——更激起了国人对他们的崇拜：

当时的欧洲思想界，各种新思想均次第萌芽，以之与百年前的中国（清道光四年）相较，常觉彼近而我远。此无他，盖我国那时，海禁未开，新知不启，似尚在混沌状态之中……故此百年前的时代，差不多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无覆二致。<sup>⑧</sup>

中华儿女的反抗激情因之熊熊燃烧：

要知道那时不必定要拜伦，无论那个人只要大胆的呐喊一声，大家都能仰首承敬他，向着他叫喊的地方看去。<sup>⑨</sup>

<sup>①</sup>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sup>③</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sup>④</sup>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sup>⑤</sup> 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页。

<sup>⑥</sup> 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引自《接受、创造与误读——关于早期郭沫若读外国书的札记》，李继凯著，载《郭沫若与东西文化》，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sup>⑦</sup> 王统照：《拜伦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评论》，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第5页。

<sup>⑧</sup> 樊仲云：《诗人拜伦的百年纪念》，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诗人拜伦的百年纪念》第1页。又如张定璜在《Shelly》一文中所说：“亢奋的青年诗人们顿时感染”。参看张定璜：《Shelly》，1923年《创造季刊》第4期。

<sup>⑨</sup> 徐祖正：《英国浪漫派三诗人》，1923年《创造季刊》第4期，第16页。



此种背景之下，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生机勃勃的普罗米修斯”<sup>①</sup>——通过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被首次介绍进入中国。在深重的民族苦难面前，中华儿女终于在一个西方文学形象身上，找到了渴慕已久的抗争英雄的典范。有学者指出：古希腊人把为民造福的思想和坚韧的反抗精神凝聚在普罗米修斯身上，这才使普罗米修斯具备了永世长存的生命力。“为民造福”、具有“坚韧的反抗精神”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契合了国人对于英雄人物的期待心理。中华民族当时极为需要的，正是这种为了弱小势力不惜与强权抗争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普罗米修斯形象势必会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界译介、赞美、模仿的对象。查阅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普罗米修斯”这一古希腊神明名字的中译多达二十一种，其中包括有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司、普罗米修士、普罗密修士、普罗美妥士、普罗米塞斯、普洛米修士、普洛美透思、普洛美透斯、普洛美休士、普洛末修、普罗沫司、普罗美迢、普洛美迢斯、普罗朱修士、伯罗米修士、伯洛美沙士、柏洛美沙士、柏米修士、泊洛米修士和沛罗米撒。中国人对该形象接受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普罗米修斯形象吻合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人的期待视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接受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符合中国神话中的英雄观。中国神话不乏普罗米修斯般的英雄人物，如夸父、鲧禹、女娲、伏羲、神农、商伯和后羿等。茅盾认为夸父是中国型的普罗米修斯，袁珂和冯天瑜认为鲧即中国的普罗米修斯。<sup>②</sup>中国神话中与火相关的神，还包括有燧人氏、神农氏、商伯、祝融、回禄，以及《封神演义》中的赤精子、罗宣、刘环等，他们或多或少都具备一些普罗米修斯的特点。神农氏的所作所为中有许多接近于普罗米修斯。“中原火神”商伯，更是典型的中国式盗火英雄，和普罗米修斯有着惊人的相似，可谓东方的普罗米修斯。此外，让当时国人感觉普罗米修斯形象难能可贵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普罗米修斯填补了中国神话英雄性格中大众化的隐忍一面。普罗米修斯藐视一切的战斗激情，让习惯了几千年儒家“中庸”式伦理道德的中国人，感觉格外激动。

## 第二节 进入中国

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译介，离不开伟大的鲁迅先生。在黑暗的封建统治和国民党反革命的围剿与刀丛中，鲁迅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普罗米修斯的战斗精神。极为崇拜拜伦的鲁迅，将自己的文章称作“投枪”和“匕首”，<sup>③</sup>射向一切黑暗势力，以为中国照亮“暗夜”<sup>④</sup>。这火是生命的火头，年轻的生命，烧毁一切的力量。<sup>⑤</sup>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

<sup>①</sup> 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2 页。

<sup>②</sup> 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6 页。

<sup>③</sup> 拜伦把自己的作品生动地喻为“手榴弹”。

<sup>④</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73 页。

<sup>⑤</sup> 郑思：《火》，《诗创作》1941 年第 6 期，第 8-10 页。

10 年》一书中，表达了鲁迅在改造中华民族灵魂与人性方面留下的深刻意义：

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与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

1907 年，鲁迅写成“五四运动”前夕思想启蒙的巨作：《摩罗诗力说》（《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向中国引进了最能振奋人心、<sup>①</sup>最具摩罗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的“摩罗诗派”。<sup>②</sup>该诗派以拜伦、雪莱等十九世纪初期积极或革命的浪漫主义流派为代表，他们追求独立、自由和人道精神，“立意在反抗”，在使“闻者兴起，争天拒俗”。<sup>③</sup>在年轻的鲁迅看来，1907 年的中国缺乏拜伦、雪莱等“伟大的精神界斗士”，就像俄国的西伯利亚缺少栖息于樱花树上的夜莺一样。<sup>④</sup>瞿秋白在解释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的用意时明确指出：“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sup>⑤</sup>茅盾称鲁迅就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正是通过《摩罗诗力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解到了雪莱及其最伟大的杰作之一：<sup>⑥</sup>《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鲁迅摘要介绍了这部诗剧梗概：

假普洛美迢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朱庇特），窃火貽人，受禁于山顶，猛鸷日啄其肉，而终不降。僦毕多为之辟易；普洛美迢乃眷女子珂希亚，获其爱而毕。珂希亚者，理想也。

普罗米修斯的近代革命者形象，通过鲁迅的引介首次为国人所知。鲁迅也因此被称作为“我国最早把欧洲的所谓‘恶魔诗派’——革命浪漫主义的‘反抗之火’运进祖国大地的普罗米修斯”，<sup>⑦</sup>“把天火盗到了人间”。<sup>⑧</sup>除了雪莱及其作品，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花大量篇幅重点介绍了“摩罗诗派”的鼻祖拜伦的生平、言行及代表作品，<sup>⑨</sup>并称其作品“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sup>⑩</sup>

作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摩罗诗力说》

<sup>①</sup>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摩罗诗派“至力足以振人”。参见赵瑞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 页。

<sup>②</sup>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密茨凯维支、斯洛瓦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诗人。所谓“摩罗诗派”，即“恶魔派”，是十九世纪初年英国御用反动文人、消极浪漫派“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谩骂攻击拜伦和雪莱以及其他同派诗人作家的用语。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摩罗之言……人本以目裴伦（拜伦）”。详见赵瑞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 页。

<sup>③</sup> 赵瑞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 页。

<sup>④</sup>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sup>⑤</sup> 瞿秋白：《文艺论辑沙，瞿秋白文集》（二集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983 页。

<sup>⑥</sup> 另一部为《钦契》。

<sup>⑦</sup> 赵瑞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前记”第 2 页。

<sup>⑧</sup> 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1 页。

<sup>⑨</sup> 鲁迅在该书中介绍拜伦的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异教徒》、《阿拜多斯的新娘》、《海盗》、《莱拉》、《唐璜》、《曼弗雷特》和《该隐》。

<sup>⑩</sup> 赵瑞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 页。

是在忧郁的、甚至是压抑的气氛中突然收束的。<sup>①</sup>鲁迅本人也最终选择了“一条个性主义的然而极其人性的道路”。<sup>②</sup>然而，这把灼灼燃烧的“摩罗之火”在血与火的年代所散发过的力量，不可磨灭。<sup>③</sup>

1930年，鲁迅再次通过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人物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盗火说”，并将普罗米修斯直接比附革命者：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sup>④</sup>

普罗米修斯之“火”，在此成为了从外国“盗”来的翻译革命文学理论和作品，普罗米修斯被表现成为了带有悲剧气质的坚韧的文化英雄。<sup>⑤</sup>事实上，这也正是鲁迅自己的形象。刘再复在《鲁迅传》中说鲁迅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不怕钉在岩石上被老鹰折磨的苦楚，硬是要把火窃给人间。鲁迅的翻译，是出自民族救亡的立场，从别国“盗取”振兴民族的“火种”来点燃新的希望，他这种崇高的翻译目的正像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悲壮和伟大。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正如杨义所言：以之自许的鲁迅是把火化作了自己的生命形式，与当时的左翼文学思潮一道经历水深火热的进程。<sup>⑥</sup>

1934年，鲁迅发表于《清华周刊》的《火》中又以沛罗米撒（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开头，并将普罗米修斯与中国的神话人物燧人氏相比，强调了普罗米修斯道义上的高尚：

希腊人的得火，据说是古时候沛罗米撒从天上偷来的；中国则不然，却是由燧人氏发见的——或者可说是发明。因为不是小偷，所以燧人氏没有受到被吊在岩上，任鹰鹫啄剥的灾难；却也因此，他是没能像沛罗米撒那样被人称颂，被人尊重。<sup>⑦</sup>

这就是鲁迅先生介绍和理解的普罗米修斯。他对这个形象的认知，完全基于雪莱的塑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介绍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和原型进入中国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文本中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普罗米修斯式人物”，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更多的代表了一种精神，即近代以来死灰般黯然的中国需要的“叫喊复仇与反抗”<sup>⑧</sup>的战斗精神。因此，下文的介绍不仅会包括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和原型在中国的引进，也会涉及典型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进入中国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普罗米修斯形象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普罗米修斯式人物”对这一形象在中国的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sup>①</sup>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sup>③</sup> 关于鲁迅后来对恶魔诗人以及恶魔附体的英雄们的厌倦，笔者将在以下章节中，结合国人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误解进行阐释。

<sup>④</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

<sup>⑤</sup> 杨义：《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学术界》总第128期，第15页。

<sup>⑥</sup> 参看杨义：《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学术界》总第128期，第15页。

<sup>⑦</sup> 鲁迅：《火》（一），1934年《清华周刊》第41卷第34期，第1页。

<sup>⑧</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比起普罗米修斯形象本身的影响，还要更为深远。

## 一、歌德的普罗米修斯

在参与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的建构者中，歌德最早为中国人所知。歌德二字在中国的翻译有：歌德、哥德、果次、瞿德、瞿提、桂特、戈德和贵推等。尽管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便有奉派出洋的大员李凤苞在自己的《使德日记》中有过对歌德的简要介绍，但歌德在我国产生影响，首先是通过郭沫若的翻译和介绍。<sup>①</sup>郭沫若在《三叶集》中说：“我想哥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sup>②</sup>——同我国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sup>③</sup>

歌德创作过许多自由豪放、雄浑有力的诗歌，塑造了经典的广为中国人熟悉的维特和浮士德形象。作为狂飙突进号角之一<sup>④</sup>的颂歌《普罗米修斯》，创作于狂飙突进运动掀起高潮的1774年，可谓是歌德一系列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自由的斗士形象的代表。然而遗憾的是，国内研究者对这一作品涉猎甚少，<sup>⑤</sup>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得到的关注远远比不上他笔下的维特和浮士德。但该形象的伟大不可因此而磨灭，“在歌德一生数以千计的抒情诗中，《普罗米修斯》以富有革命精神和阳刚之美而出类拔萃，经舒伯特等谱曲被世代传诵”。<sup>⑥</sup>该颂歌由傅东华<sup>⑦</sup>翻译为《普洛米修士》，刊载于1935年第1卷第6期的《译文》。冯至也翻译了该诗，以《普罗米修士》为名，发表于1948年第4期的《诗号角》。

## 二、普罗米修斯式人物：拜伦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将两类英雄视作西方浪漫主义遗产支配中国文学界的两种模式：少年维特般的消极而多愁善感型以及普罗米修斯似的生机勃勃的英雄。陈婧凌指出：“当‘少年维特’弥漫在当时（中国）的文学空气里，普罗米修斯却似乎踪影难觅……李欧梵恰恰在拜伦身上，发现了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传统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存在……直接地讲，拜伦的人生承担了普罗米修斯的意义。”<sup>⑧</sup>尽管陈婧凌关于普罗米修斯在当时中国难觅踪影的提法不无偏颇，但她认为拜伦人生的意义接近于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之意义的观点却很有道理。拜伦助希腊独立的事迹广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作品和人物也“无

<sup>①</sup> 严宝瑜：《冯至的歌德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0卷第4期，第66页。

<sup>②</sup> 即“狂飙突进时代”。

<sup>③</sup>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8页。

<sup>④</sup> 杨武能：《狂飙突进的号角：关于普罗米修斯及其它颂歌》，《名作欣赏》1987年03期，第32页。

<sup>⑤</sup> 叶隽：《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普罗米修斯〉断片中的“宿命叛逆”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第69页。

<sup>⑥</sup> 杨武能：《狂飙突进的号角：关于普罗米修斯及其它颂歌》，《名作欣赏》1987年03期，第29页。

<sup>⑦</sup> 傅东华（1893—1971）：一生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和文字学研究，他翻译的《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

<sup>⑧</sup> 陈婧凌：《普罗米修斯的历险——一个古希腊形象的中国流传与挖掘》，《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第89、90页。

异是他自己的反映”。<sup>①</sup>他对当时中国文人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雪莱，是“中国最受吹捧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sup>②</sup>李欧梵指出：“中国的仰慕者不怎么把拜伦和他的作品相区别，拜伦似的英雄主要由拜伦自己代表。”<sup>③</sup>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就是拜伦本人的事迹参与了中国人对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的建构，他是典型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因此，要介绍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进入中国的过程，绕不开拜伦事迹与拜伦精神进入中国的过程。

### 1. 梁启超、马君武与拜伦

清末民初，拜伦就在中国掀起热潮，除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原因，拜伦本人的思想、行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拜伦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精神独立、具有自主的人格和对行动与实践的追求。他不仅做诗，还直接参与到政治漩涡中。<sup>④</sup>笔者搜集到的拜伦名字的中译计有拜伦、裴伦、摆伦、摆（山）仑和拜轮等。中国对拜伦的最早介绍是梁启超翻译拜伦《哀希腊》的第一、三部分。梁启超通过黄君之口评价拜伦：“摆伦（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的说法哩。”<sup>⑤</sup>梁启超还在《新小说》第2号上首次刊出拜伦的照片，称“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犹为拜伦派云。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拜伦不特为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sup>⑥</sup>第一个翻译《哀希腊》全诗的马君武，认为西方十九世纪的大文豪中只有雨果与拜伦才令人“恋爱”和“崇拜”。马君武自己也是“欲以一身捍天下”，<sup>⑦</sup>他因进行爱国革命活动被清廷追捕而四海飘零，理想在胸可叹壮志难酬。尽管如此，他却很少消沉萎靡，诗歌里总是充满乐观光明的调子。

### 2. 苏曼殊与拜伦

中国全面译介拜伦的第一人是苏曼殊。拜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曼殊影响。1906年，苏曼殊译成《拜伦诗选》并自为序。<sup>⑧</sup>在序言中，苏曼殊高度评价了拜伦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人格：“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园，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sup>⑨</sup>1908年，苏曼殊以拜伦自喻，写成《题拜伦集》：“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词刻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sup>⑩</sup>

### 3. “诗人拜伦的百年祭”

1924年，恰逢拜伦百年忌辰。我国创刊最早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和官方报刊《晨报》，都掀起了对拜伦译介的高潮。当年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是

<sup>①</sup> 诵虞：《拜伦名著述略》，《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拜伦名著述略》第1页。

<sup>②</sup> 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sup>③</sup> 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sup>④</sup> 当然，拜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人对拜伦的接受较为狭隘，他们选取接受拜伦身上最能当时中国人表达政治感情的一面。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分析。

<sup>⑤</sup>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2页。

<sup>⑥</sup> 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0页。

<sup>⑦</sup>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

<sup>⑧</sup> 该书于1908年出版。其中收有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毡带诗》和《星耶峰俱无生》共五首诗歌。

<sup>⑨</sup> 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一），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25页。

<sup>⑩</sup> 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一），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53页。

“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晨报每年纪念赠刊号》上辟有《拜伦底百年纪念》专栏。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晨报副刊》在4月21日的第32期、和4月28日的第33期上分别刊登了“摆伦百年纪念号”的上、下两部分。<sup>①</sup>

《小说月报》时任主编郑振铎乐观表示：“我们对于这个光荣的诗人，似乎应该为之举行一次伟盛的百年祭，较世界上一切诗人都更伟盛的百年祭。”<sup>②</sup>当时文坛一流人物如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赵景深和徐志摩等人，纷纷发表关于拜伦的论文和译作。其中包括有拜伦的诗剧译作共十篇，国内的论文十三篇，国外的评论六篇，此外还刊登了有关拜伦的六幅插图。西谛（郑振铎）在卷头语中讴歌了拜伦的反抗性：

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社会。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sup>③</sup>

西谛所言，还明确表示了拜伦事迹对当时中国人的意义更甚于拜伦的诗歌：

我们不惟崇慕他的伟大的诗歌，并且崇慕他的伟大的豪爽的事迹……他竟为希腊之故，为一个古民族的自由之故，竟强制住他与夫人的离情，竟决然地走，竟走到东方，躬自参与于昔所梦想的美丽的希腊人的独立军中而与土耳其的暴政相战了……拜伦是在希腊人的心上，是在近东各民族的身上，是在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身上。伟大的诗人拜伦我们崇慕你！……他（拜伦）的作品里，无不明白的显出他的‘伟大的表现，豪爽的坦白’，他的撒旦的精神，他的对于个人威权，个人自由的强固不屈主张与他的对于虚伪、庸俗、以礼教的假面具掩饰一切的社会的深绝痛恶……他的作品不久便有了极大的影响。<sup>④</sup>

徐志摩对拜伦最直接的评价，是刊登在《小说月报》上的《拜伦》一文。徐志摩称“痛骂世界的卑污”<sup>⑤</sup>的拜伦为“一个美丽的恶魔，一个光荣的叛儿”<sup>⑥</sup>。他赞美拜伦誓死不屈的可贵精神：

冲锋冲锋冲锋跟我来！这不是早一百年拜伦在希腊迈索隆基翁死前昏迷时候说的话，那时他的热血已经给冷血的医生给放完了，但是他的争自由的旗帜却还是紧紧地擎在他的手里。<sup>⑦</sup>

王统照发表《拜伦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评价》，分析了拜伦思想的三个方面，分别是热烈的冲动，自由的观念和革命的影响。<sup>⑧</sup>

“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中，还刊载有樊仲云的《诗人拜伦的百年祭》、汤澄波的《拜

<sup>①</sup> 但“纪念号”下的文章与本论文关系不大，故不予以介绍。

<sup>②</sup> 西谛：《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第1页。

<sup>③</sup> 西谛：《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卷头语”。

<sup>④</sup> 西谛：《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诗人拜伦的百年祭》第2页。

<sup>⑤</sup> 成芳编：《我看尼采—中国学者论尼采（1949年前）》，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sup>⑥</sup> 徐志摩：《拜伦》，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拜伦》第2页。

<sup>⑦</sup> 徐志摩：《拜伦》，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拜伦》第9页。

<sup>⑧</sup> 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6页。

伦的时代及拜伦的作品》和甘乃光的《拜伦的浪漫性》。翻译作品有张闻天翻译的《勃兰兑斯的拜伦论》的蓝本，其中充满了激情的赞美：“拜伦！你错了！在我们的眼睛中，我们不知为你落了多少眼泪，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知为你占了多大的地位。”<sup>①</sup>另外还有顾彭年翻译的《拜伦在诗坛上的位置》、《拜伦的个性》，陈博翻译的《拜伦论》，仲云翻译的《拜伦的快乐主义》。这些都着力介绍了拜伦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

拜伦至此达到了在中国接受的巅峰。然而遗憾的是，笔者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相对于拜伦英勇事迹在中国的介绍，显得明显单薄。尽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花了大量篇幅重点介绍拜伦生平事迹与作品，但拜伦的《普罗米修斯》一诗却未被鲁迅在该书中提及。直到1924年，诵虞在《拜伦年谱》中首次提到“《普罗米修斯》断片零简”。1939年，《诗人丛刊》刊登了朱维基所翻译拜伦的《普罗米修斯》。<sup>②</sup>1955年出版的梁真（查良铮）译作《拜伦抒情诗选》中收有《普罗米修斯》。

1954年，在臧之远所译苏联人伊瓦士琴科的《拜伦》一书中，高度赞扬了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

（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同‘压迫人类的’一切恶势力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的榜样。拜伦歌颂的普罗米修斯和曼夫雷德，都同样是精神伟大和意志坚强的榜样。拜伦在这里赞美这个英雄，因为他‘在坚决抗击野蛮的恶毒中间，在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里面，遗留给我们强大的榜样，天上人间的一切暴风雨，都不能把他的灵魂摧残’。

### 三、雪莱的普罗米修斯

在郭延礼编著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雪莱”二字共出现了约十五次之多。其名字在中国的翻译有：雪莱、雪莉、锡兰、希烈、席烈、师梨、解莱、薛雷和薛悝等。雪莱晚于拜伦进入中国。除了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雪莱一直到二十世纪早期，可以说一直到了1923年的“雪莱百年祭”，这个“诗人的诗人”<sup>③</sup>才逐渐开始露出光辉。

雪莱是“充满着革命的热诚和急进的理想的青年诗人”，<sup>④</sup>他是“爱自由的，他是不愿意受束缚的……使人类平等的志向是他‘灵魂的灵魂’”。<sup>⑤</sup>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拜伦和雪莱的百年祭，为接受和研究这位大诗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除新文学杂志《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的“雪莱纪念号”之外，当时很多著名期刊杂志如《新时代》、《青年界》、《文艺杂志》、《文学》、《清华文艺》和《小说月报》等，都持续刊载介绍雪莱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多达十八篇。

<sup>①</sup> 张闻天译述：《勃兰兑斯的拜伦论》，《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勃兰兑斯的拜伦论》第24页。

<sup>②</sup> [英]拜伦著：《普罗米修斯》，朱维基译，载于《诗人丛刊》1939年，第38-40页。

<sup>③</sup> 张定璜：《Shelly》，1923年《创造季刊》第4期，第2页。

<sup>④</sup> 潘纫秋译：《雪莱小传》，非力·魏斯特姆著，载于《青年诗人》，1946年第3期，第57页。

<sup>⑤</sup> 《读雪莱诗后》，1921年《文学周报》第94、95期。

在雪莱百年忌辰之前的 1921 年,《文学周报》就刊登了一篇无名氏的《读雪莱诗后》,表达了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高山仰止:“他的 *Prometheus (Un)Bound*, 我实在够不上读他,因为太浓厚伟大了。”<sup>①</sup>

1923 年 2 月上旬,“雪莱纪念号”发行。这是继鲁迅之后雪莱在中国受到的又一次隆重介绍。郭沫若极为青睐雪莱,<sup>②</sup>他说“革命诗人(雪莱),天才诗人的精神大抵可以复活于我们现代青年的意识中”。<sup>③</sup>在他翻译的雪莱那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等几首抒情诗前的《小引》中,郭沫若称赞道:“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除了推崇雪莱的品格,他还很欣赏雪莱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sup>④</sup>在郭沫若撰写的《雪莱年谱》中,他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雪莱的“两大雄篇”<sup>⑤</sup>之一: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人,人类是他造的。他因为从天上取了火(智光)来赐予了人类,触犯了至上身 Zeus (宙斯)之怒,囚之于高加索山。古希腊诗人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525-456BC),有 *Prometheus Bound* (《普罗美妥士之幽囚》)一剧,已残阙;似以与至上神妥协为本旨(。)雪莱作翻案名曰‘普罗美妥士之解放’,表现地上的胜利,天界的倒踢,上帝自天上坠下,陷落在地狱里。<sup>⑥</sup>

张定璜在 *Shelly* (《雪莱》)中介绍雪莱生平时,说到他早年“只抱了一种改革社会的意见,事事不满意于学校和同学”。<sup>⑦</sup>徐祖正发表的《英国浪漫派三诗人——拜伦、雪莱、箕次》中写到雪莱“真能发挥撒旦派特色”<sup>⑧</sup>。

1929 年,梁遇春翻译 Robert Lynd 写的《论雪莱(续第十一号)》,其中讲到雪莱爱放风筝,“为的是要从云里勾下电来——从天上取下真火来,做个新伯罗米修士”。<sup>⑨</sup>另外,雪莱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的宇宙是一团密密布着,闪闪作光的星群。他那成千个的黎明爆裂出罩着大地时候,带有一种允诺,伯罗米修士的长久苦痛也会因之化为欣慰。在文学里再也找不出雪莱这种彻底的欢欣。而且这不是一个盲目的,没有尝过人间世烦恼的人的欢欣,却是一个在暴虐环境的漫漫长夜里,受尽了没有私心的人们在这世界所要推的苦痛的人学会了怎地……去望前希望,一直等‘希望’从失败里能够创造出自己所梦想的东西。写出了这样的诗的人可说是战胜了挫折。这是不愿再做牺牲品,要变为创造者的表示。雪莱承认世界是被魔鬼播弄得限于

<sup>①</sup> 《读雪莱诗后》,1921 年《文学周报》第 94、95 期。

<sup>②</sup> 李欧梵说“郭沫若被认为等同于雪莱和歌德”。参见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著,新星出版社,第 282 页。

<sup>③</sup> 郭沫若:《雪莱年谱》,《创造季刊》1923 年第 4 期,第 57 页。

<sup>④</sup> 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5 页。

<sup>⑤</sup> 另一篇是“*Percy Florence*”。

<sup>⑥</sup> 郭沫若:《雪莱年谱》,《创造季刊》1923 年第 4 期,第 51 页。雪莱在后面“附白”:这篇年谱大抵是根据内多精一氏的 *Shelly no Omokage* 一书编成的。

<sup>⑦</sup> 张定璜:《Shelly》,1923 年《创造季刊》第 4 期,第 3 页。

<sup>⑧</sup> 徐祖正:《英国浪漫派三诗人》,1923 年《创造季刊》第 4 期,第 16 页。

<sup>⑨</sup> 梁遇春译:《论雪莱(续第十一号)》,Robert Lynd 著,《北新》1929 年第 3 卷第 14 期,第 53 页。



奴隶的地位，但是他比人和人更相信在一天黎明里人类能够恢复上帝起初的意旨……他（雪莱）就是处在今日也要同那时一样歌颂新人的出现。由他看来旧专制势力的死灰复燃，国际的或者国内的，只好像是‘愤怒神’对于伯罗米修士的新袭击。他要唱一曲新诗将这群‘愤怒神’赶走。<sup>①</sup>

其后的注解中附有对普罗米修斯的介绍：

伯罗米修士是一位天神，他用土抟造成人，又替他们从天上偷下火来，因此触了上帝的怒，将他用练缚在岩石旁边，叫大鹰去啄食他的心肝，‘愤怒神’日日去鞭挞他。所以伯罗米修士的火代表人类的睿智同灵感。雪莱有一篇长诗 *Prometheus Bound*，歌颂伯罗米修士的重得自由。<sup>②</sup>

1934年，梁遇春又写了散文《观火》。“火”的意象突现在他的一组散文中（《吻火》、《观火》、《救火夫》）。在梁遇春笔下，“火”与奉献和奋进相联，是一种始自古希腊时代普罗米修斯高高举起的象征着崇高精神的火种。

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孙席珍著的《雪莱的生活》，提到“雪莱可歌可泣的抒情诗之一《普洛美透斯之解放》”。1931年，梁宗岱节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片段《柏洛米修士底光荣》，悲壮无畏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表达了战斗者的激情与胜利者的欢欣：

忍受那希望以为无穷的祸灾；  
宽恕那比死或夜还黑的损害；  
蔑视那似乎无所不能的权威；  
爱，而且容忍；希望，直至从残堆  
希望创出它所凝视的对象来；  
也不更改，也不踌躇，也不翻悔；  
这就是，巨人，与你底光荣无异，  
善良，伟大和快乐，自由和美丽；  
这才是生命，欢愉，主权，和胜利！<sup>③</sup>

该诗后来收入梁宗岱的翻译文集《一切的峰顶》。1941年在尹及发表的《偷天火者——希腊神话》中有对这几句译诗的引用。

1946年，《青年生活》刊载潘纫秋翻译的非力·魏斯特姆的《英国大诗人：雪莱小传》，<sup>④</sup>其中介绍雪莱的《普罗米修斯被释》是雪莱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957年，《解放了普罗米修斯》的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一流翻译家邵洵美先生的笔下诞生，并成为该诗剧至今唯一的经典译本。

<sup>①</sup> 梁遇春译：《论雪莱（续第十一号）》，Robert Lynd 著，《北新》1929年第3卷第14期，第57、59页。

<sup>②</sup> 梁遇春译：《论雪莱（续第十一号）》，Robert Lynd 著，《北新》1929年第3卷第14期，第60页。

<sup>③</sup> 梁宗岱译：《一切的峰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sup>④</sup> 非力·魏斯特姆著：《雪莱小传》，潘纫秋译，《青年诗人》1946年第3期。

## 四、古希腊原型

埃斯库罗斯首次让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获得了得以传诵千秋的生命力与影响力。1924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5卷7期上首次介绍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取火者柏洛美沙士》、《囚禁的柏洛美沙士》、《柏洛美沙士的释囚》）：

在（尚完全保存着的）《囚禁的柏洛美沙士》剧本的开始，叙柏洛美沙士因触怒了大神修士，被海泛斯托(Hephaestus)锁在一块岩石上。修士正建立了他的天国，想毁灭了人类，在地球上传播一种更好的生物。柏洛美沙士是帮助人类的；他偷了天上的火给人类，以阻止大神修士的毁灭人类的计划；（火是一切艺术的最古者，）又常常教导人类以木匠的技术，农耕的方法，以及医药，航海术等。修士因为他的这个反抗，把他判定了一个可怖的责罚。当他被缚在岩石上时，他仍旧骄傲的沉默着，到了海泛斯托离开了他，他才哭着向地与日诉说他本是一个神，却被别的神所苦至此。海中的仙女也去访问他。他心中只有一件高兴的事，因为大神修士将遇到的一个恶命运，只有他知道。他说，“修士将从最高的权威上一跌而无存。”他的预言达到了修士的耳中，便叫神的使者合尔姆士（Hermes）到他哪里去，问他详细的情形；他不肯告诉修士便降更酷虐的刑法到他身上；一个大鹰啄嚼他身上的肉，土地裂开了，他被锁在那里的那块岩石，沉到深渊中去。在已散逸的第三篇《柏洛美沙士的释囚》中，则叙柏洛美沙士与修士复相和好而得了释放的事……这部三联剧的道德是众神知道法律的严肃的精神，但用他们的对于人道的同情和缓了性质。等于生了那新的秩序，拿（那）合理的法则的统治。<sup>①</sup>

这是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首次露面，它比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进入中国晚了整整十七年。

1926年，华林发表《希腊悲剧的研究》（第一章：伊士奇的研究），其中有《伯罗米修士的被缚》、《伯罗米修士的被释》和《取火的伯罗米修士》的剧情梗概：

伯罗米修士因为不从薛乌斯（Zeus）的命令，偷了火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来给人，以致引起薛乌斯之怒，把他缚在石上，叫鹰鹫每日来吃他的肝。不过在第一出剧里面，已暗示伯罗米修士将来终于被释放的一日了。第二剧表现赫邱利（Hercules）射死鹰鹫，释放伯罗米修士的情事。最后一剧，伯罗米修士的故事，大概和雅典所崇拜所纪念的文化之神发生关系了。<sup>②</sup>

华林在下文中表示：富于英雄精神的伯罗米修士存心谋人类的幸福，不顾自己的死活，不畏强权的恐吓，甘心受罚，始终不悔。

1929年，玄珠（茅盾）在《文学周报》上发表《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提到了埃斯库罗斯与普罗米修斯：“在伊士奇（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里，我们看见了阿加绵依一家的故事，

<sup>①</sup> 郑振铎：《文学大纲（七）》，《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7期，《文学大纲（七）》第6、7页。

<sup>②</sup>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民铎》1926年第7卷第3期，第7页。

看见了远征底比斯的故事，又看见了伯罗米修士为人类谋福利而受酷刑的故事……”<sup>①</sup>

1926年，“沉钟社”的发起人及主要成员杨晦，首次全剧翻译了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题为《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该书于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印数1500册。后附杨晦创作的《普罗米修斯》（1926年），是他结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情感抒发。

1934年，洪深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希腊的悲剧》，其中写到：“在现存的他（伊士奇）底七部作品中，最积极，对于我们最有意义，因为可以称为最伟大的，是《捆绑中的伯罗米修士》。”<sup>②</sup>在扼要介绍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之后，他说“伯罗米修士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代表人类底毅力，人类底不肯屈服的精神：虽明知遭遇不可敌的命运（即处在万难的环境中），而能不惜牺牲，忍痛前进，向上奋斗的。”

1947年（1942年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念生翻译的《普罗米修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罗念生又对《普罗米修斯》的译本作了修订，与埃斯库罗斯另一部代表性悲剧作品《阿伽门农》合在一起，以《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之名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1年10月，平明出版社发行了李健吾翻译的《浦罗米修斯被绑》。译者在后记中称普罗米修斯“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成了人类的榜样”，是“被压迫阶级的光荣的形象”。<sup>③</sup>

此外，王焕生、陈中梅等人都对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有过精彩译本。

通观普罗米修斯及普罗米修斯精神进入中国的过程，有如下几点需做说明：

一、除了普罗米修斯原型与近代形象，赫西俄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也有所介绍。1928年沈玄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的《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中，多次提到普罗米修斯抁土造人：“伯罗米修士又偷给了天上独有的神圣的火，于是人乃过着最幸福的生活了。伯罗米修士因此受宙斯的重罚，做了为人类谋幸福的第一个牺牲者。”1941年发表于《战国策》第1卷第2期上尹及的《偷天火者——希腊神话》与《偷天火者——希腊神话（二）》中，当宙斯因为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而勃然大怒之时，普罗米修斯战战兢兢，与宙斯讲情，企图把自己的死罪减轻为终身监禁。但即使是这样不甚光彩的形象，面对惩罚也不忘为人类求情：“天神的王呀，臣知罪该万死，千刀万割亦不后悔。我死后求陛下可怜那一对凡间的男女，千万照顾照顾。他们是无辜的，不要毁灭他们。让我来替他们受苦，以补我从创造欲得来的快乐。”尹及随后还附上雪莱对普罗米修斯的赞美之词。但总体而言，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形象的相关介绍比较零星，未成规模。

二、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文献中，还未能发现普罗米修斯的过渡形象被译介到中国的资料。

三、拜伦形象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上个世纪初被政治热情鼓动的中国人，

<sup>①</sup> 玄珠：《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文学周报》1929年第7卷，第355页。

<sup>②</sup> 洪深：《希腊的悲剧》，《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7页。

<sup>③</sup> [古希腊]艾斯吉勒斯著：《浦罗米修斯被绑》，李健吾译，平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版，“后记”。

更加乐于从正面角度去理解拜伦。在中国，作为享乐主义的拜伦已不再重要，作为正义之神、自由战士的拜伦才具有意义，这与真实的拜伦就有了差距。<sup>①</sup>事实上，真实的拜伦是多面的，他是自然之子、善感的英雄、哥特式的流氓、浮士德式的叛逆知识分子、该隐般的道德弃儿……<sup>②</sup>人们在对拜伦形象接受过程中出现的有针对性的偏颇，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结合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误读”加以论述。

### 第三节 积极反响

普罗米修斯的各种形象被译介进入中国后，对光明极度渴望、对压迫奋力反抗的中国人，迅速接受了以反抗到底、永不屈服示人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这个形象又成为象征，幻化为旗帜，聚集号召了各种力量。王泽龙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提到中国 30 年代的普罗诗人具有甘当“普罗米修斯盗火以人间”的英雄姿态与襟怀。蔡同庆在《周扬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过程》中，将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周扬同志比作“普罗米修斯火把”在中国的传递者。刘白羽在《外国文学与我》一文中回忆道：“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像天穹上霍然一亮的闪电，打开我辽阔的视野……如同普罗米修斯盗得天火，革命圣殿的灯光带我走进了一个新世界。”在国人心中，普罗米修斯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积极象征。

#### 一、革命领域

茅盾曾在讲述完普罗米修斯盗火惠人的故事后说到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普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外受欺凌、内部倒戈的中国，是内外矛盾兼具的中国。普罗米修斯之火带给水深火热之中急需革命斗志的中国人的鼓舞，几乎完全超越了其他所有外来形象。翻阅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以“火”为标题创作的诗歌作品浩如烟海，它熊熊燃烧于受压的一代国人心中，“天火自从给人们偷下，便开始在生命里燃烧……”<sup>③</sup>它如春风吹遍大地般，抚慰、振奋了进取中的一代革命先驱。

1907 年，在血与火的战斗年代，“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秋瑾（1877-1907），以自己年仅三十岁的青春生命，用鲜血演绎了普罗米修斯为人民利益而与强权殊死搏斗的抗争精神，以期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就义前五日，她写下了如下诗剧：“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净土；

<sup>①</sup> 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33 页。

<sup>②</sup> 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94 页。

<sup>③</sup> 何肯：《献诗》，1927 年《话剧特写》第 1 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sup>①</sup>

殷夫（1909-1931）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左联五烈士”之一，一生执着于“引下天火给人间的理想”。<sup>②</sup>在创作于1929年的《别了，哥哥》一诗中，他表达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渴望：“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普罗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真理和忿怒使他强硬，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两年之后，未满二十二岁的殷夫为革命献身，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政府残忍杀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饥荒蔓延、饿殍遍野。被冠之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的林昭（1932-1968），于1960年起被长期监禁。在狱中她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控诉国民政府当局对她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压迫，表达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发表于首期《星火》杂志上的《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渲染了普罗米修斯受难的极致血腥场面。但即便如此，普罗米修斯也欢呼并坚信“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火！）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燃烧，火啊，燃烧在这漫漫的长夜，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炉灶里，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 二、思想文化领域

要复活那伟大的精神！要再生那高洁的心情！……青年们，有热血的青年们，来，来，我们一同跑上高加索的山头，去朝拜那为人类受罪的普罗密修士；奔往锡狄亚北部的山野，去顶礼那为人类而战的战士。他是我们的导师，是人类的光明；是我们的生命之海，是我们的力之泉，他代表了伟大，象征着高洁；他是宇宙的光荣，是世间的骄傲。……哟，伟大的普罗米修斯！……愿你的伟大化作春风来吹醒我们的花朵！愿你的高洁化作秋雨来洗清我们的污浊！愿你的伟大好似长江大河的流遍人间！愿你的高洁好似洪水的泛滥地上！<sup>③</sup>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哪一个时段，像二十世纪上半叶般文学与政治联系如此紧密，以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普罗米修斯为人类而战的精神，不仅激起革命人士的战斗激情，也是文人抒发胸志的最佳主题。普罗米修斯的题材渗透进了文人的血液中，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以上文字，摘录于杨晦写自1926年12月的《普罗密修士》。这篇文章是“杨晦同志翻译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基拉著名悲剧《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之后所写的附录”，<sup>④</sup>字字充盈着对普罗米修斯深情的崇拜，极富代表性地概括了普罗米修斯这一外

<sup>①</sup>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sup>②</sup> 摘自殷夫诗：《小母亲》。

<sup>③</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sup>④</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来形象带给中国人精神上的震撼。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杨晦也是“伟大”与“高洁”的象征。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一生以笔为剑，与黑暗势力顽强搏斗；他称道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sup>①</sup>以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他勇敢地与“虚伪的世故、勾心斗角的行为、尔虞我诈的争斗进行斗争，自己经受多大的损失也不后退”。<sup>②</sup>他将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化在了自己的血液中：“他坚强的性格和忧郁的心情在西方的某些悲剧里得到共鸣，他谈讲那些悲剧的情节，象是在述说自己亲身的经历。”<sup>③</sup>

郭沫若也是普罗米修斯的崇拜者，其创作深受雪莱影响。1928年，他在拟作的《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的提纲中提到雪莱对他的诗歌爆发期产生的影响。<sup>④</sup>在《创造季刊》宣言中他说文学创作事业充满了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并且，他关注、赞美“不起眼”的农民和工人，他们为人类创造财富，给人类带来光明幸福，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sup>⑤</sup>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还拥有外来者看待世界文学的高度，“是他发现了直到当时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气质’”，<sup>⑥</sup>并将这种气质融化进自己的创作，写出了具有豪迈的英雄主义和囊括宇宙想象力的《女神》，表达了鲁迅所期望的“摩罗精神”：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从今后该我为空间的霸王！……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sup>⑦</sup>

郑振铎是将普罗米修斯原型带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借鉴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创作了《取火者的逮捕》。《取火者的逮捕》由四个短篇小说组成，写普罗米修斯盗火和宙斯被从宝座下推翻的故事，即“神”的统治的横暴与“人”的最后胜利，<sup>⑧</sup>于1934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在《创作文库》中出版：

这伟大的三部曲虽仅存了中间的一部（即 Prometheus Bound），而我们读之，却是怎样的感动！那伟大的为人类而牺牲的柏洛米修士，便是一切殉道者的象征。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墨翟，都是这一型式的人物。在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空气，若烟雾腾腾，黑底昏天似的弥漫于一切之时，能不有感于这！

<sup>①</sup> 冯至：《从癸亥年到癸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5页。

<sup>②</sup> 冯至：《从癸亥年到癸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3页。

<sup>③</sup> 冯至：《从癸亥年到癸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2页。

<sup>④</sup>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sup>⑤</sup> 摘自郭沫若诗：《地球，我的母亲！》

<sup>⑥</sup>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sup>⑦</sup> 摘自郭沫若诗：《凤凰涅槃》。

<sup>⑧</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新序”第1页。

1956 年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印该书之际，郑振铎借“新序”表示：

虽然写的是古代的希腊神话，说的却是当时当地的事。‘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有大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在中国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残酷无比的统治者和喽罗们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们和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我写这部东西的当儿，是从萧杀的秋天，经过狂风虎虎的冬天，到繁花怒放的春天的。满腔的悲愤，一肚子的牢骚。却也就在这最黑漆漆的夜里看到了将要到来的黎明时的红色曙光……<sup>①</sup>

尽管为了避嫌，郑振铎不得不采用笔名“郭源新”。但他借用普罗米修斯形象，巧妙抨击当时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呼唤崭新明天的写作目的却是一目了然。

被周恩来戏称为“20 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的聂绀弩，于 1941 年创作了《第一把火——为鲁迅先生五年祭作》。该小说借用普罗米修斯盗火惠人的故事梗概，塑造了一个寂寞的先驱者形象。别开生面的是，开场那个刚刚刷洗过锅碗的阿霞——普洛美休士之妻，一瞬间便将这个故事置于了一个世俗的层面，暗示了世俗世界最终将成为主宰。普洛美休士也不再是高加索山上那位遥不可及的神，他同样生活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尽管他依然还是神。他曾帮助“神”战胜了“魔”，而这群新得势的神却整日歌舞升平、沉湎于酒色、压迫人类。普洛美休士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和这世界是不调和的”。他呼唤人类起来与神作战，“外科手术似地割掉这些腐烂的东西们”：“起来，用你们的手解除神给你们的枷锁吧！用你们的手推翻神的统治吧！用你们的受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吧！叫做神的东西是用不着怕的，他们现在腐烂地连什么力量也不会有了！”他坚信人类的胜利：“（只要人类）一聪明、一勇敢，神的江山就完了。”<sup>②</sup>

1930 年，《燕大月刊》刊登李得木司基的《普罗沫司》，虽看似一首打油诗，艺术成分单薄，但普罗米修斯的悲壮英雄形象也是呼之欲出：“身失自由光荣在，抹杀正义毋宁死；首末沧桑十三世，忍受创痛如一日。”<sup>③</sup>1940 年，萧霏在《火的微笑》中叙述了自己对于“伯洛美沙士”盗火被囚的感叹：“复活的热情，诅咒了‘神’的存在！痛恨了‘神’的残暴！”<sup>④</sup>1941 年，严杰人在《文艺阵地》第 6 卷第 4 期上发表《今之普罗米修士》，以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为基础，指出被关入了集中营的今之普罗米修斯，还记取着普罗米修士的不屈和倔强，和普罗米修士一样爱着人类、承受着和普罗米修士一样深重的苦难。若干年后，“人们谈起你们底名字的时候，犹如现在我们谈到普罗米修士一样”。<sup>⑤</sup>同年，与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废名等诗人都是相识的吕亮耕，在《火的宣示》中高呼“普罗密修士的告诫”：“生命的意义是战斗！战斗！再战斗！”<sup>⑥</sup>1942 年，西莽在叙述普罗米修斯盗火惠人的神话故事之后抒发到：“我在希望着我们都是普洛米修士的化身，不怕牺牲，不怕苦痛，带着

<sup>①</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新序”第 1 页。

<sup>②</sup>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六卷·小说 剧本），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5、139、142、145 页。

<sup>③</sup> 李得木司基：《普罗沫司》，《燕大月刊》1930 年第 7 卷第 1-2 期，第 157-158 页。

<sup>④</sup> 萧霏：《火的微笑》，《华文大阪每日》1940 年第 5 卷第 6 期，第 36 页。

<sup>⑤</sup> 参考严杰人：《今之普罗米修士》，《文艺阵地》1941 年第 6 卷第 4 期，第 35 页。

<sup>⑥</sup> 吕亮耕：《火的宣示》，《创造月刊》1942 年第 1 卷第 3 期，第 39 页。

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的精神，将古今中外哲人们一流下来的‘真理的心血之结晶’，那光明与智慧的火，散步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里去！”<sup>①</sup>1947年缪灵珠发表《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以爱斯克拉（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泊洛米修士》开头，专门有一节评论了“我受苦？——是为了人类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泊洛米修士”，指出“伟大的悲剧往往把积极性的斗争表现到白热的程度”。<sup>②</sup>在译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中，也有灵珠关于普罗米修斯是被“最纯洁最正当的动机”驱使，走向“最美好最高尚的目的”的译文。<sup>③</sup>叶君健也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了一组故事。在《潘多拉的匣子》中，他批判了与人类为敌的天神宙斯，歌颂了一心为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整个故事洋溢着高度乐观之情。普罗米修斯已然成了走不出黑暗、愚昧和落后状态的中国思想者最为青睐的精神慰藉：“起风了…多凄其，走进门吧，划根火柴点好灯，翻开《被囚的 Prometheus》——谁写的？‘感谢你，你为人类带来了光明……’”<sup>④</sup>

如前所述，中国人不仅崇拜普罗米修斯，也崇拜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建构者。陈独秀激情宣告自己“尤爱桂特（歌德）”等人。茅盾表示“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sup>⑤</sup>。蒋光慈写《怀拜伦》歌颂天才的无畏的反抗，赞美拜伦帮助希腊人民争取独立的壮举。他认为天才是痛苦的，但是他不会屈服，坚定地寻觅着自由。蒋光慈的爱人吴似鸿在《蒋光慈回忆录》一书中写到蒋光慈不仅歌颂拜伦，还以雪莱为榜样，将“雪莱”二字贴在房间的墙壁、门边、床头和书桌前，与自己共学雪莱。

## 小 结

通观普罗米修斯形象进入中国的背景、过程以及在革命领域、文艺界引起的积极反响，我们的确应该感谢普罗米修斯。凭借这个经典的外国文学形象，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在那血腥恐怖的岁月中，看到了穿越时空的天地边界上，还屹立着一位与自己神气相通的古希腊英雄；在这位英雄身上找到了一种可借以表达自我处境、宣泄激情愤慨、高呼明天未来的精神慰藉。可以说，普罗米修斯鼓舞了一个时代。

只是，这样一位被如此钦赞的普罗米修斯，已经失掉了普罗米修斯形象在西方建构过程中的诸多成分。无论是普罗米修斯原型，还是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甚至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更多地被理解和阐释成为了绝对正面的革命者形象，单向度地变成了革命者、反抗者的化身。即使偶尔有人提及原型身上相异于

<sup>①</sup> 西荪：《火》，《读书生活》1942年第1卷第1期，“卷头语”第1页。

<sup>②</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3页。

<sup>③</sup> 缪灵珠：《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sup>④</sup> 因子：《火》，1946年《时代（重庆）》第9期，第5页。

<sup>⑤</sup> 沈雁冰：《拜伦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拜伦百年纪念》第2页。



那个时代中国式理解的成分，基本上也只是隔靴搔痒。人们说到普罗米修斯，并不区分是哪一个普罗米修斯，而只关注他所代表的革命者和启蒙者的崇高意义，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当然，我们“拿来”这样的普罗米修斯，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的确更需要这样的普罗米修斯。这在特殊年代可以理解。然而，对一个形象的绝对重视已然造成了对另外一个相关形象的忽略，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固化，已经阻碍了我们对普罗米修斯原型全面、深刻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自普罗米修斯形象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当真我们只需要这个能够给人以希望、鼓舞，能够让人热血沸腾的普罗米修斯吗？

受陈中梅的《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文的启发，通过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解读与分析，笔者发现，“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原型，不仅颇具神明的气概，更有人之为人的种种缺陷。他有让人反感的恣意骄横，有不那么“英雄”的偶感恐惧，有出尔反尔的言行，甚至还会经常忍不住地自我标榜……但是，埃氏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探讨笔下人物如何在克服以上种种弱点的痛苦过程中，去找寻事情的真正解决方案，以最终获取真正的“智慧”。他将人物置于了一个需要发展的动态环境之中。相比于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原型没有站在完美道德的起跑线上。而原型的对立面宙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获得了在道义上制衡普罗米修斯的权利。只是，宙斯应该如何制衡对方？普罗米修斯又该如何克服自我？埃斯库罗斯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矛盾双方必须正视矛盾，解决矛盾，以期在矛盾的对立中达成有张力的和谐。此种通达古今的古希腊理性，会让我们忍不住对林昭式人物拿自己“鸡蛋般”的力量去蛮击国民党政府的“顽石”产生一些唏嘘感叹，甚至能够引领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当今纷繁芜杂的社会。我们有必要真正走近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

### 第三章 走近原型（一）——并非“十全十美”

大约许多的评论者都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普罗米修斯的对立面宙斯对宇宙的统治是最粗蛮、最无理的专制统治，他身上带有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希罗多德到亚里士多德——眼中之僭主的全部固有特性：统治残暴、缺乏法律依据；诱奸女性（伊娥是典型代表），不负责任；任意打压人类；不听从友人劝谏<sup>①</sup>等。他是古希腊僭主<sup>②</sup>的化身。在埃斯库罗斯<sup>③</sup>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所遭受的酷刑——被隔离在位于荒原峭壁的高加索山上、因一直要保持被直立捆绑的姿势而无法入睡、永无休止地被老鹰啄食肝脏、不时受到宙斯及其使者的各种威胁恐吓等——还带上了 20 世纪集权主义者在战俘集中营实施的种种酷刑的诸多特征。不仅是古希腊，任何时代都会愤懑于宙斯的统治。<sup>④</sup>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宙斯是僭主，他压迫人类利益的代表者普罗米修斯，并阻止人类的觉醒。<sup>⑤</sup>而普罗米修斯，其形象则因与宙斯看似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而愈发显得高大伟岸，让人景仰。他被表现为一个绝对正面的彻底反抗者形象，即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这个被光环笼罩的形象进入中国后，国内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对其长期以来不加吝惜的赞赏更是形成了一种评论定势，遍布于 20 世纪国内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和评论文章之中：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十全十美”的“英雄”<sup>⑥</sup>，他为了帮助人类摆脱草莽和愚昧、为了人类的幸福，不惜与宙斯的强权决然抗争，甘受一切难以忍受的苦难。<sup>⑦</sup>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一些与生活是非评判密切相关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sup>⑧</sup>知识领域内许多被扭曲镜像的真相也逐渐得以发掘。如同撒旦在基

<sup>①</sup> “暴君不会信任他的朋宾。”见《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第 227 行。参看[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4 页。本论文对埃斯库罗斯悲剧作品的引用均参考陈中梅译本。

<sup>②</sup> 注意“僭主”一词在古希腊所表达的意思。在古风时代的希腊，“僭主”（tyrant）并非一定就是“残暴，不受欢迎的统治者”（与英语单词“tyrant”不同）。僭主是好是坏，希腊人依据其作为统治者的行为来评判。参看[美]托马斯·R.马丁著：《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00 页。论文此处所取之意与英语单词“tyrant”的意思相同。

<sup>③</sup> 被称作“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一位多产的悲剧诗人，具有炽烈的宗教热情。他于公元前 500 年左右第一次参赛狄奥尼索斯戏剧竞赛活动，前 484 年首获头奖。一生约创作过九十出剧作（包括萨图罗斯剧），现仅存七出（其中六部出自获奖的三联剧）：《波斯人》、《七勇攻忒拜》、《奥瑞斯提亚》（三联剧，含《阿伽门农》、《奠酒人》及《善好者》）、《祈禳女》以及《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sup>④</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12.

<sup>⑤</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Aeschylus), p.13.

<sup>⑥</sup> 普罗米修斯是否可以被称为“英雄”值得探讨。陈中梅指出：英雄属于泥地精灵，与阳光灿烂的奥林波斯神明不同，可以在最高的层次上到位地表示对人中豪杰的符合他们身份的尊重。参看陈中梅：《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2、267 页。

<sup>⑦</sup> “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甘愿忍受一切难以忍受的苦难，是人类自身崇高品质的化身。”参看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9、30 页。

<sup>⑧</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5-266 页。

基督教的刻意误导之下，脱离了其最初接近于一位考验人类信仰的天使的含义，变成了邪恶与黑暗的代表；对于那些习惯把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划分为决然对立的两个派别的读者来说，最让其倍感苦恼的“模棱两可”是：在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身上居然带有宙斯的诸多特性！他所展现的骄横恣蛮几乎与宙斯如出一辙！<sup>①</sup>更让人费解的是，普罗米修斯最终与他的对立面宙斯走向了和解！困惑产生的原因多样而复杂，但追根溯源，都与人们长期以来对该形象的混淆理解与简单定论有关。普罗米修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在一种貌似十分明确的评判定势之下，隐含着对这一经典形象在西方文学的复杂变迁过程中囫圇吞枣、不求甚解的含混与模糊。当然，将“完全颠覆”四个字用在普罗米修斯身上肯定过分，因为颂扬一位为人类心智的开启做出过先驱者般贡献的勇士，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错。问题在于：其一，普罗米修斯在西方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形象演变过程，以彰显理性精神的古希腊原型和作为彻底反抗者的西方近代形象为两座丰碑。然而，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学术界与评论界已然形成的评论定势，明显地忽略掉了普罗米修斯的原型意义。顺承此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真实面貌（甚至是宙斯的原貌）究竟如何？此神是否真如后人所钦赞的那样绝对是一位“十全十美”的革命者、反抗者和胜利者？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树立该形象的根本用意是否与后来的雪莱、拜伦和歌德等人相一致，即主要着力于歌颂抗争的彻底性？抑或埃氏本人根本就原非是会受到崇尚个性的现代主义者推崇的大师？结合上述问题，埃氏创作此剧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其中隐含了剧作家对时代的何种思考，蕴藏了哪些深刻的智慧，又会为今人带来什么别样的启发？

要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抛弃对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固有的“偏宠”与“成见”，打破二者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分别形成的绝对正面和负面的形象，深入到公元前 6-5 世纪的古希腊城邦，结合《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和三联剧可贵的残篇，以期站在一个足够公允、客观的立场去体会古希腊巅峰文明时期复杂的人文思想，领会剧作家深刻的创作原意。称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为原型，不仅在于普罗米修斯得以在埃氏笔下奠定了世人心目中普遍的高大形象，更在于这一复杂形象蕴含了深刻的古希腊理性思想，表达了剧作家针对那个时代所包蕴的某些重大社会问题所提出的根本性见解。

悲剧是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最为伟大的文化成果之一。和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把美好撕碎给人看”（鲁迅语）的悲剧理念不同，古希腊悲剧“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质的事”<sup>②</sup>，其主人公在本质上是与我们类似的普通人，尽管它相当程度上借用的是神或英雄的故事。<sup>③</sup>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悲剧的主人公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sup>④</sup>陈中梅在译注

<sup>①</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5.

<sup>②</sup>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修订版，第 81 页。

<sup>③</sup> “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他们和世俗生活很接近。多数的神很像氏族生活中的贵族，他们很任性，爱享乐，虚荣心、嫉妒心和复仇心都很强，好争权夺利，还不时溜下山来和人间的美貌男女偷情。”参看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9 页。

<sup>④</sup>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修订版，第 97 页。

中讲到：“尽管悲剧人物往往在一个崇尚力量和英雄的时代里有过不寻常的经历，为一般人所不可企及，但他们也有人的弱点和喜怒哀乐，也会像一般人那样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和我们或一般人没有太大的区别。”<sup>①</sup>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人物的定义和陈中梅的解释，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主要表达的是人类主观意愿上对于完美革命者形象的诉求。雪莱写下的是一首关于人类“现代性”的诗歌，歌颂的是“他自己”<sup>②</sup>立场所向的无产者，其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失掉了“人之为人”的客观真实性与根本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及其中国式的完美理解，不能被列入真正的悲剧经典人物形象之列。而不管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还是宙斯，都不是后来基督教意义层面上的完满形象，而是古希腊人世俗理念的象征，带有“人”的诸多复杂特性，没有、也不可能走向绝对和完美。因此，笔者在本论文所要重点纠正的偏颇，不是普罗米修斯是否应该受到颂扬，而在于普罗米修斯是否仅仅只应受到颂扬。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论文第二章——（普罗米修斯）“进入中国”——中已经着力表述了普罗米修斯盗火惠人以及因此不惜与宙斯强权抗争的优秀品质，鉴于整篇论文的主旨，笔者在此不再就相关问题进行重述，但并不代表普罗米修斯“缺点”多于“优点”、或者说没有“优点”。毕竟，普罗米修斯原型的魅力，主要来源于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抗暴”行为。笔者所要尝试说明的中心问题是：普罗米修斯是令后人崇敬的“抗暴英雄”，但又并非是一位只有“优点”的“十全十美”的“抗暴英雄”。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

## 第一节 重看“盗火”

文明的车轮看似滚滚向前。随着人与自然的分裂，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越发苏醒，掌控世界的意愿越发强烈。人们渴望依靠自身理性决定自我行为，过分强调主体的独立性。哲学所关注的中心对象是“人”。作为主体的人，希望摒弃一切与自身相悖而驰的规则秩序以为自己服务。普罗米修斯擅自盗取天火致送给渺小的凡人，对于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人们来说，很容易顺理成章地得出如是结论：为人类做好事的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亲密朋友和导师；他为了人类的利益，英勇无畏地与宙斯强权决然抗争，他是为增进人类利益的殉道者。这是我们对普罗米修斯形象一贯的评判态度，也正是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所表达的意义之一。

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当然值得称颂。然而，埃斯库罗斯的用意却或许并非简单于此。并且，作为神族中的一员，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行为也不能不受到神界处事规则的指责与评判。

<sup>①</sup>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修订版，第 99 页。

<sup>②</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8.

## 一、神并非“爱”人——“我让凡人不再预见自己的死期”

普罗米修斯向歌队表达了他对人类的馈赠：

普罗米修斯

（……）只有

我具备抗拒的勇气，我救援凡人，  
使他们不致彻底毁灭，坠入哀地斯的府居。

……

歌队

你是否还做过什么，除了已经提及的这些？

普罗米修斯

我让凡人不再预见自己的死期。

歌队

你教出什么办法，治防这个痛疾？

普罗米修斯

我把盲目的希望填入他们的胸襟。

歌队

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你给了凡间的生灵。

普罗米修斯

此外，我还给了他们火种。

歌队

什么？短命的凡人如今有了眼睛闪亮的火焰？

普罗米修斯

是的，由此他们将学会许多记忆。

（第 236-256 行）

Simone Weil 指出：普罗米修斯之受苦，是因为他对人类太多的爱。<sup>①</sup>他在宙斯试图毁灭人族时“救援凡人，使他们不致彻底毁灭”（第 237-238 行）。他还致送给凡人令其“眼睛闪亮的火焰”（第 255 行），“凡人拥掌的技艺无不得之于普罗米修斯的匠心”（第 506 行）。除此之外，普罗米修斯还将“盲目的希望”（第 252 行）填入凡人的胸襟，“让凡人不再预见自己的死期”（第 250 行）。

专属于神界的天火是“永生的火”，能够帮助人类克服弱小与浑噩，使其生命丰盈。普罗米修斯将永生之火致送凡人的行为，因此而带上了试图让凡人与“永生”构成某种联系的

---

<sup>①</sup> Simone Weil.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Greeks*, London and New York (first published 1952), Routledge, Reissued 1998, p.67.

意味。当歌队问到：“你是否还做过什么，除了已经提及的这些？”普罗米修斯回答说：我让凡人不再预见自己的死期，把盲目的希望填入他们的胸襟。换言之，普罗米修斯让人类摆脱死亡这一终极恐惧的方式是让人类盲目地预见不到自己的死期。但事实上，人有与生俱来的“限制”（即命运，*Moira*），死亡是人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与神的根本区别（人与神之间的差异着重还有能力和力量方面的悬殊），即在于人会死，而神却可以长生。<sup>①</sup>须知人类即使像神灵般快活生活的黄金时候，也是会死的，“他们的死亡就象熟睡一样安详”<sup>②</sup>。黑铁种族的人们更是“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sup>③</sup>。荷马史诗中，英雄无论如何象神般勇猛伟大，也无法拥有象神一样不朽的躯体。格思里(Guthrie)指出：“我们将神或神性与不朽同义，因为在希腊人心目中它们就是同义词。诸神可以有其他禀性，但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不朽，正是他们不朽，把他们与人区分开来。”<sup>④</sup>布尔克特(Burkert)在谈到荷马史诗时说：“对于人来说，最重要、也是最痛苦的界限是死亡：这是人有限的份额。”<sup>⑤</sup>“死”将人与神截然分开，成为人与神之间区别的最大标识。“‘不死’在人类和诸神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在希腊人眼中，神的这个特点太重要了。”<sup>⑥</sup>而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一项帮助，居然是让必会死亡之人盲目地预见不到命运之神赋予人这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死亡的力量。歌队评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第253行），但这份“了不起的礼物”是否真能为凡人所享，却是显然。善良的歌队紧接着对凡人的修饰语就是“短命的”（第255行），这清楚地表明即使凡人预见不到自己的死期，也改变不了自己“会死”的本质。“不死”的确只是一种“盲目的希望”。陈中梅在谈到相关问题时举例说：萨尔裴冬乃宙斯与凡人子，连宙斯也不愿得罪众神，被迫放弃了打断让爱子死里逃生的念头；坦塔洛斯曾偷盗仙食送人，受到惩罚；名医阿斯克勒庇俄斯因救活死人而被宙斯击杀。<sup>⑦</sup>可见，死亡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因此而泾渭分明，不容破毁。因为人掌握了火，人的灵性便会近似于神；<sup>⑧</sup>若更盲目地以为自己不死，必定会招来诸神更大的怨恨，神会惩罚人的傲慢自大。<sup>⑨</sup>普罗米修斯“独步天下、目空一切”（第82行）的盗火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盲目，他又让人盲目地以为自己可以超越作为有死之人的本分，这势必造成人神格局的混乱。就连普罗米修斯自己，尽管“不认为因此该受这样的惩罚”（第270行），也只是不认可宙斯对自己惩罚的强烈程度，而无意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在神与人共同生活的世界中，死亡与不朽成为区分人与神的最后界限。<sup>⑩</sup>略去人因“不

<sup>①</sup>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修订版，第273页，注释[23]。

<sup>②</sup>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页。

<sup>③</sup>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

<sup>④</sup> Guthrie, *The Greeks and Their Gods*, Boston, 1955, p.115.

<sup>⑤</sup> John Raffan (trans.), *Greek Religion* (Burkert),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129-130.

<sup>⑥</sup>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页。

<sup>⑦</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注释[23]。

<sup>⑧</sup> 曹兴：《超越神话——古希腊人的哲学智慧》，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sup>⑨</sup> [美]托马斯·R·马丁著：《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61页。

<sup>⑩</sup> 杜丽燕：《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死”极有可能滋生的狂妄自大，普罗米修斯至少没有将人放在精神平等的位置上，让人失去了“认识你自己”的基础。韦尔南说：“人应该接受自身的局限性。”<sup>①</sup>普罗米修斯让人类盲目地预见不到死亡，实在不能说是出于对人类真正的关爱。可以佐证的是，普罗米修斯在更早的时候还曾大力襄助过凡人潜在的“敌人”，即宙斯。“（普）跟随母亲，自愿提供帮助，受到宙斯的欢迎。”（第 219-220 行）“天空的霸主/得利于我（普）的建议，受益匪浅”（第 223-224 行）。可见，普罗米修斯并非拥有坚定立场，并非一直是弱小人类的代言人。叶秀山在《永恒的活火》中讲到，普罗米修斯创造人族并赋予后者火、智慧，是因为普罗米修斯原本帮助宙斯打败提坦，宙斯却过河拆桥压制一切提坦族支。<sup>②</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就如是说到：“我痛恨所有的神明——一句话/——他们用邪恶回报我的帮援。”

（第 975-976 行）萨福朗斯基(Safranski)也说：“普罗米修斯拯救人类的行为，掺杂着他与宙斯，或者说泰坦神与奥林匹斯诸神的宿怨，因此，他对人类的拯救，很难与善行联系在一起。”<sup>③</sup>换言之，普罗米修斯是对宙斯上台后关于既得利益的分配有所不满（自己未能得到自己原本希望或者说本应取得的），为和宙斯作对（鉴于火的重要性）才转而帮助人族（因为宙斯想要在此时毁灭人族）。而人类世世代代以来对于普罗米修斯的崇拜，重要的或许已经不在于火为人类带来的实际利益，而在于普罗米修斯在盗火惠人的过程之中所彰显的精神感召。但遗憾的是，诸神不是注定要“爱”人的。人类即使可以从某些神祇那里得点恩惠，也不一定完全出自神对人之爱，而是诸神之间斗争的产物。<sup>④</sup>神并不爱人，除非有时在神话故事中拥有了地上的爱人而且生出了半人半神的孩子。<sup>⑤</sup>这个赤裸裸的解释，对于将普罗米修斯完全看成是人类利益代表者的读者来说，或许有些讽刺。但细读埃氏的剧本中，我们在感受普罗米修斯敢于为人类抗暴宙斯的伟大行动中，的确忽略不掉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某种不“爱”。

## 二、神界的“叛徒”

站在人类立场，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的行为尽管难以完全解释为出自对人类的关爱，但他敢于为弱小者抗拒人神之父宙斯的勇气，却是难能可贵、不容置疑。然而，埃斯库罗斯展现的是奥林波斯的神族世界，表达的主体是神族的内部成员。无论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的勇气多么可嘉，他都永远是神，永远属于神的世界（普罗米修斯从未产生过要脱离神界的想法），有作为神明所必须遵循的法则与不可僭越的权限。陈中梅在《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一文中指出，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他超越了权限，践踏了神应该遵循的对待凡人的行

<sup>①</sup>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46 页。

<sup>②</sup> 叶秀山：《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 页。

<sup>③</sup> [德]吕迪格尔·萨弗朗斯基著：《恶或者自由的戏剧》，卫茂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sup>④</sup> 叶秀山：《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8 页。

<sup>⑤</sup> [美]托马斯·R. 马丁著：《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60 页。

为规范。首先，用火是神的特权，不该由凡人拥享；其次，神界有处事的规则，神有自己的本分，有必须予以维护的利益。普罗米修斯在这两点上犯下大忌，因此招来了包括宙斯在内的众神的恨怨。<sup>①</sup>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以强权(Kratos)对普罗米修斯的指责开场。强权首个开口，叮嘱赫法伊斯托斯执行父亲宙斯将普罗米修斯钉上高加索绝壁的任务，随即开始数落“抢走神的特权”（第 82-83 行）的普罗米修斯：“他（普）偷盗你（赫）的专利，炽烈的火焰，那是你的花朵，催产所有的记忆，送给凡人，由此犯下错恶，必然受到众神惩戒，以便让他吸取教训，不再助爱凡人，仰服宙斯的威严。”（第 7-11 行）作为宙斯的忠实走狗，强权理所当然地代表神族利益，数落起普罗米修斯来可谓“义正言辞”。与强权的态度不同，赫法伊斯托斯出于与普罗米修斯亲情的力量，<sup>②</sup>对宙斯交与自己的这份差事有些于心不忍；但同时，他却十分清楚普罗米修斯的行为超越了凡人“理应接受的规限”（第 30 行），所受的惩罚罪有应得：“这是对你助援凡人的报应。”（第 28 行）即使是善良的、同情普罗米修斯的歌队（由俄开阿诺斯的女儿们组成），也“不忍”地责问到：“君不见你已做下错事？”（第 262 行）在歌队看来，普罗米修斯给予了凡人“过多的恩惠”（第 544 行），其行为“超越合宜的界限”（第 507 行），是“心智紊乱，踏入了误区”（第 472-73 行）的结果。站在神的角度，普罗米修斯理所当然地侵害了诸神的利益，践踏了神明本该遵循的对待凡人的行为规范。正如陈中梅指出：“强权的态度恣虐，着实可憎，但他站在神族的立场上讲话，斥责一个出卖神祇利益的‘叛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蛮横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sup>③</sup>不仅是强权，包括当事人即普罗米修斯在内的剧中所有人物<sup>④</sup>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连普罗米修斯自己都承认：“（我）知晓当时是在做越分的事情，不想否认，出于自愿。”（第 268 行）

普罗米修斯神话与火的起源密不可分，是最古老、最具世界性的神话之一。不仅是古希腊，火在印第安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神话中均占据重要位置。弗雷泽(Frazer)在《金枝》中讲述了整个欧洲自远古时代起就开始流行的各种篝火节的风俗。篝火节点燃的火是一种可以保证人和牲畜、五谷和果实都能得到充足阳光并且代表丰产的巫术。<sup>⑤</sup>由此可见，火在古代传说中具有普遍的神圣性，在最初的神话中代表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古希腊神话中，大地最初一片混沌，奥林波斯神族历经两代神明（乌拉诺斯和克罗诺斯）的奋斗，到宙斯才最终宣告完成了对于光亮的确立。<sup>⑥</sup>由宙斯掌控的“永生的火”，代表了神圣、力量和魔力。<sup>⑦</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强权指出“火”能够“催产所有的技艺”（第 7 行）。并且，由于火在食物烹饪过程中的不可或缺，它最开始还与古希腊神话中神仙的美食

<sup>①</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3 页。

<sup>②</sup> “我们的亲情有一种力量，神奇，我们是共处的伙伴。”《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第 39 行。

<sup>③</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3 页。

<sup>④</sup> 包括宙斯的坚定拥护者强权、较为中立的赫法伊斯托斯、以及较富同情心的俄开阿诺斯及其女儿们。

<sup>⑤</sup> [英]J.G.弗雷泽著：《金枝》（下），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 年，第 573、575、604 页。

<sup>⑥</sup> 叶秀山：《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7 页。

<sup>⑦</sup> [英]简·艾伦·赫丽生著：《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谢世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1 页。



表达了极为近似的含义。韦尔南在《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中引用到：“（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某些要素与印欧神话中盗取不朽的食品的主题是一致的。”<sup>①</sup>换言之，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的行为，也就带上了普罗米修斯企图帮助人类偷盗神灵仙食的动机。而神明正是凭靠此种美食以永葆不朽。<sup>②</sup>

火在神界的特殊属性确立了神区别于人的界限之一。火与古希腊神明的不朽相连，是宙斯秩序中不可侵犯的“神的特权”（第 82-83 行）。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也就因此而带上了冒犯神族利益的性质，它代表了对神界的背叛、对神界秩序的破坏及对神界规则的僭越。奥林波斯每个神明“各有特权，分享权利”（第 232 行），赫法伊斯托斯清楚“拥有这份手艺”的人应该“干他份定的活计”（第 48 行），表达了社会职能专门化的特点。从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以及柏拉图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普罗米修斯在分配中负有一定的职责。他在新上台的宙斯给亲信的神灵分配各种既得利益之时，能够想到可悲的凡人并通过实际行动加以救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对于平等分配的渴望（这也正是普罗米修斯何以被世人所赞叹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平等是一种等级制的平等，一种几何的平等，而不是算术的平等。<sup>③</sup>普罗米修斯为了表达作为个体的自己对弱小人族过分的关爱，<sup>④</sup>超越自己的本分（没有正确使用手中权力），破毁神界必须遵循的规则，极端地用对神界亲属利益的整体性背叛为代价。普罗米修斯招来了“所有神祇的恨怨”（第 120 行），必须领受“众神制导的灾难”（第 91-92 行），因为“众神恨他，恨在骨子里面”（第 37 行）。

## 第二节 普罗米修斯的骄横

在荷马与赫西俄德的时代，宙斯代表了公正与正义。到悲剧时代，埃斯库罗斯将宙斯公然地拉向衡量正义的天平。他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敢于用对人类的“正义”去纠正宙斯的“不义”（上台后对人类不公正的分配安排）。其不畏强权、不惧苦难，与宙斯誓死对抗的斗争激情是文学界和思想界乐于讴歌的主题。然而，剧中出现的所有角色（除开伊娥），都对普罗米修斯不加节制的激情进行过或反感、或善意的批评与评论。如前所述，在赞叹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光辉业绩的同时，不可忽略他对同类——神界亲属——整体利益的伤害。其次，让人惊奇的是，在与宙斯的抗争中，普罗米修斯还因对自以为正义激情的过度放纵与不加克制，

<sup>①</sup> [法]让-皮埃尔·维尔南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5 页。

<sup>②</sup>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968.

<sup>③</sup> [法]让-皮埃尔·维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79-80 页。

<sup>④</sup> 陈中梅在《普罗米修斯的骄横》一文中列举了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参看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4 页。

而几乎带上了宙斯身上所有令人憎恶的特质，诸如顽固、易怒、鲁莽和尖刻等等。<sup>①</sup>陈中梅在《普罗米修斯的骄横》一文中对普罗米修斯的骄横有深入详尽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剧作家重笔浓描了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但他也不时有所保留，或明或暗地对这位先知者的过分倨傲以及他的过激言行——具体表现为对激情的自以为有正当理由的放纵，体现为对 hubris（或 hybris，“许伯里斯”）的随意表露以及由此而必定造成的伤害缺乏必要的戒心——进行了有时似乎略带辛辣的批评。普罗米修斯对 hubris 的任意放纵与随意表露，不可忽略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先知，普罗米修斯拥有对预知结局洞察的能力，即普罗米修斯有对未来之事的先见之明；另一方面，作为神明，普罗米修斯不会死，没有死的命限。

## 一、骄横(Hubris)

Hubris，意义接近汉语的“凶莽”、“骄横”或“冒犯”等词，<sup>②</sup>其含义为“粗野地行使强蛮”<sup>③</sup>，意指一种严重的错误，有“过分”之意<sup>④</sup>。对于崇尚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古希腊人来说，任何出于狂妄自大、蓄意挑衅、通过言语或行动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受制或受怂恿于 hubris。<sup>⑤</sup>Hubris 不仅表示强者对弱者的伤害，也可由弱者对强者的违抗或不服从所致。当事人在没有足够理由证明己对人错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己见，抗命不从，即是 hubris 的体现。<sup>⑥</sup>Hubris 带有明确的贬义，亚里士多德在谈论该词时引入了“耻辱”、或“羞辱”的观念。<sup>⑦</sup>Hubris 与人性相连，乃个人英雄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的产物，是悲剧人物借以表现个人意志的理想“媒介”，是从本质上解析悲剧难以抗拒的艺术感染力的关键。<sup>⑧</sup>

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反抗表达了“英雄”的豪迈激情。但需注意的是，普罗米修斯所表达的“英雄”激情中，更多地带上了个人主义狂热的成分。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他听不进剧中其他任何角色的建议与批评，任凭 hubris 在自己身上的发作而不加节制，影响了自己原本可以更加高大的形象。陈中梅在《宙斯的天空》一书中引入了执政神与非执政神的两对概念，指出奥林波斯诸神通常指以宙斯为首的“执政神族”，以区别于以克罗诺斯为首的某些提坦们组成的“非执政神族”集团。<sup>⑨</sup>执政神有权在大事上取舍定夺，以避免非执政神之间互相扯皮带来拖沓的办事效率。新上台的宙斯重新分配人神利益，<sup>⑩</sup>作为非执政神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是提坦）表达了“抗拒的勇气”（第 237 行），公然挑衅宙斯行使利

<sup>①</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5.

<sup>②</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0 页。

<sup>③</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7 页。

<sup>④</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8 页。

<sup>⑤</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8 页。

<sup>⑥</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9 页。

<sup>⑦</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8 页。

<sup>⑧</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0、271 页。

<sup>⑨</sup> 陈中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 页。

<sup>⑩</sup> 宙斯在人神分配中的安排是否也具有一定合理性？相关问题在本文第四章阐述。

益分配的特权，并私盗天火赠与人类，破毁了神与人之间的天然界限，表达出一种渎神的 hubris。

因狂妄地僭越他者权利与伤害他者利益，普罗米修斯被缚高加索，但惩罚并未起到让当事者对自己的 hubris 加以反省的作用。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一直在用言语渲染自己的渎神行为（尽管基于人的立场，普罗米修斯在做好事）以及坚决不服从宙斯意志的决心。首次开口时，普罗米修斯便忍不住“豪迈地”讲说起他给凡人送去的“美好的礼物”（第 105-113 行），并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对凡人的种种馈赠一一讲述（第 442-468、476-506 行）。陈中梅指出：普罗米修斯滔滔不绝的自我标榜，只会加大宙斯和奥林波斯众神对他的恨怨，而无助于对抗的平息。<sup>①</sup>当普罗米修斯高呼“凡人拥掌的技艺无不得之于普罗米修斯的匠心”（第 506 行），读者在感受这位为人类作出如此贡献的先驱者豪情的同时，忽略了普罗米修斯在此表达的是最为令古希腊人痛恨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与激情。歌队到来，普罗米修斯又狂放地预言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第 168-179、189-195 行），以表明自己筹码在握、无所畏惧。剧作家通过同情普罗米修斯的歌队之口传达了对普的批判：“心志勇莽，不在乎剧痛的磨砺，/给舌头太多的自由，讲话过于随便”（第 180-181 行）；并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但愿我不说冒犯的话语：愿这条/规则须臾不离，常驻我的心灵。”（第 535-536 行）俄开阿诺斯一语中的：“普罗米修斯，你之受难就在于/这条舌头，高谈阔论，大肆吹擂。/你还没有学会恭谨，在凶灾面前弯下腰背，/倒是想在已有的愁灾之上增添艰辛。”（第 320-323 行）俄开阿诺斯离开后，歌队用显然含带贬义的口吻，列举了与普罗米修斯的脾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打仗不顾性命的科尔基斯姑娘（第 416 行）、在战场上表达粗劣勇气的阿拉伯兵勇（第 424 行）、以及永远走不出肩扛大地蓝天之苦难的阿特拉斯（Atlas），以类比普罗米修斯陷入 hubris 的不幸和悲难。在与赫尔墨斯相互的言语互攻中，普罗米修斯将骄横飙升到极致。作为宙斯的使者，赫尔墨斯的到来表明宙斯正在试图给普宙恩怨寻找解决之道。尽管赫尔墨斯同样表达了骄横，却掩饰不了执政神宙斯寻找和解契机的实质。陈中梅指出：普罗米修斯本来可以明智地避开与赫尔墨斯的对骂，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商议（当然包括讨价还价），寻找缓和的契机，但他却出于习惯性的冲动，因人废言，由于不能容忍使者的出言不逊而完全不屑一顾于他的规劝。<sup>②</sup>相比赫尔墨斯的 hubris，普罗米修斯过之而无不及，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赫尔墨斯至少能认识到骄横的弊端，他指出“倔傲的意志”是“万物中最懦弱的一员”（第 1012-1013 行），而普罗米修斯从未在此方面表达过相关认识；二、不比赫尔墨斯，普罗米修斯首先犯错又受制于人，他是否有同样骄横的资本？他继续磨耗的意义何在？当二者用“狂蛮者的方式，表述他们的狂蛮”（第 970 行），矛盾看似无以解决之时，歌队在此明确地传达出来剧作家的声音：

赫尔墨斯的话语，在我们听来，并非  
全无道理；他劝你丢弃顽倔，寻求

<sup>①</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8 页。

<sup>②</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0 页。

善好、明智的见解。接受他的劝说吧——

那是一场耻辱：一位聪灵的神明坚持错误，固执己见。

（第 1036-1039 行）

毕达哥拉斯曾经教导人们说，一个受到了他的城邦不公正待遇的人要像受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不公正待遇那样去坦然面对。<sup>①</sup>姑且不论普罗米修斯私盗天火带给诸神的伤害，在整个《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在受罚之时依然听不进多方的任何好言歹语，其 *hubris* 在表示宙斯妥协之前自己决不妥协<sup>②</sup>的主调中一路飙升，最终连累歌队（尽管歌队是出于自愿）一起在天翻地覆中坠入幽黑的泰塔罗斯。

## 二、“预见”与“不死”

针对普罗米修斯激情的 *hubris*，陈中梅在《普罗米修斯的骄横》一文中对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在承认己方有错和对手的报复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反抗者似乎没有必要（或只能）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方式。<sup>③</sup>那么，除开本身拥有的大无畏精神之外，普罗米修斯任意放纵与随意表露 *hubris* 是否存有其他原因？

作为“不死”的“先知”，普罗米修斯在与宙斯骄横的抗争中，拥有不同于凡人的明显优势。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其名字前半部分 *pro-* 为前缀，表示“在前”、“先于”；后半部分 *metheus* 意为“知识”或“知道”，合在一起表示“先知”之意。作为塞弥丝之子，普罗米修斯直接继承了大地对未来之事预知的能力。在宙斯与提坦诸神的权位之争中，普罗米修斯得利于母亲的预言，向宙斯提供帮助，使后者受益匪浅。同样，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被困高加索时，一方面他拥掌着威胁宙斯垮台的婚姻机密，另一方面他坚信母亲的告诫：凡间将产生一个强健的人杰，能使自己摆脱所受的苦难（第 871-874 行）。普罗米修斯掌握的婚姻秘密是这样的：如果宙斯与塞提斯结合，后者会生出一个比宙斯强大并会推翻宙斯统治的儿郎。陈中梅指出：普罗米修斯所洞察到的是一个不可逆转和无须科学证明的事实。对结局的了然如指掌，会从心理的最底层打消对强权的恐惧，而自信掌握了最高智慧的优势，也很容易使他产生抵消磨难的优越感。<sup>④</sup>换言之，对未来的预知，不仅可以赋予战斗中人正面的抗争勇气，也可以滋生负面的 *hubris*。

普罗米修斯首次开口便表达了对未来的预知、以及由此带来的能够在意识上抵消磨难的优越感。在与歌队的交谈中，普罗米修斯很快便将话题转移到宙斯终会来和自己联合的预言上，自己因此不必太过在意眼下的苦难。其次，普罗米修斯还向歌队讲述自己的预知能力在宙斯争夺统治权时起到的作用，向伊娥叙说他所预知的伊娥的未来。并且，在与这位可怜少女的同病相怜中，普罗米修斯几乎将会让宙斯饱尝苦果的婚姻秘密和盘托出（除了没有提及

<sup>①</sup> [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著：《希腊人与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107 页。

<sup>②</sup> 该内容在本章第四节中阐述。

<sup>③</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5 页。

<sup>④</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4 页。

那段可能发生的婚姻中的女性的名字)。伊娥下台, 普罗米修斯又再次狂怒地向歌队豪言只有自己掌握了宙斯婚姻秘密的全部细节。可以看出, 普罗米修斯非常乐于叙述和重复他所预见的结局, 因为此种“神知”助长了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斗争的勇气, 抚平了他在受难之时的低落心境。

对被绑高加索的普罗米修斯来说, 被绑只是过程, 被释才是结局。而被绑的过程, 对于“不死”的神明来说, 其可怕程度理应不可与凡人的感受同日而语。有死的凡人, 会随着肉体的极度损耗而走向生命的消亡; 而对于不死的神明, 肉体的不朽保证了他们能够经受住任何苦难与折磨。无论宙斯如何惩罚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不死的事实不会改变。当然, 这并不代表神明对肉体的苦难感知可忽略不计。当伊娥深感生命悲愁、想要一死了结之时, 普罗米修斯便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的痛楚你不会愿意听见, /我没有死的命限——死了倒能省去这些愁烦, 而我/我的劫难无有期限, 直到/宙斯倒台, 倒下权势的峰巅。”(第 752-756 行) 因为不会死, 宙斯就能够极尽凶残、永无休止地折磨普罗米修斯, 而普罗米修斯则必须全部“领受”。但也正因为不会死, 普罗米修斯在“领受”惩罚的同时, 无需担心是否能够“顶住”这些惩罚。因为不死的神明“有‘无限’的‘前途’, 暂时的‘失败’不会使他们‘气馁’”<sup>①</sup>。所以, 此时的普罗米修斯如果是受伊娥悲苦处境的负面影响还对自己“没有死的命限”透露出些许无奈的话, 那么在第 933 行中, 普罗米修斯则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怕什么? 死亡与我无缘。”这句台词喊在普罗米修斯宣告宙斯即将覆灭的预言之后。他敢于如此对抗宙斯, 敢于宣布宙斯统治的垮台, 是因为自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本质性的代价(即伤害生命); 是因为无论如何, “他(宙斯)可没有把我(普)处死的本领”(第 1043-1053 行)。陈中梅如是说: “对于一位永生的神明, 死的终极威胁, 那种使凡人难以摆脱的焦虑并不存在。不受死的控掌, 反抗者自然会拿出十倍的胆量, 百倍的勇气, 给施暴者以迎头痛击。”<sup>②</sup>当然, 普罗米修斯敢于抗争宙斯, 并非仅仅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死”<sup>③</sup>, 或者不能说“会死”的普罗米修斯就会失去对抗宙斯的勇气, 而是强调“不死”会在客观上推动、加强当事人的抗争激情。

生命是一次性的, 这是凡人挣脱不了的宿命。它象锁链一般, 自始至终给人的“骄横”以某种程度的限制。因为一旦“骄横”过头, 人就可能付出终极性的代价。然而, 诸神的生命是永久的, 他们可以有无限的时间和机会去修正自己的错误。正因为此, 诸神就需要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力量, 即命运的力量, 以调节、甚至说压制他们的“错误”行为。难得的是, 塞弥丝之子普罗米修斯, 这位“不死”的神明, 还同时拥有了对命运的“预知”! 准确的预见加上不死的属性, 难怪普罗米修斯有资本在抗衡宙斯之时不受理性的克制, 而将 hubris 发挥到极致。

<sup>①</sup> 叶秀山:《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51 页。

<sup>②</sup> 陈中梅:《言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85 页。

<sup>③</sup> 奥林波斯山上不死的神明比比皆是, 诸如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出现的强权、赫法伊斯托斯、俄开阿诺斯等, 但他们都没有“胆略”去“抗拒父亲的/命令”(第 40-41 行), 不愿“得罪新近登台的那位, 无所不能的神明”(第 391 行)。

### 第三节 “先知”的恐惧

#### 一、“不管什么，都会使我不安”

普罗米修斯出场便气势宏伟地呼唤宇宙的一切所属均来看视自己遭受的苦痛与羞辱(第 88-95 行)。刚被锁链捆绑于高加索的普罗米修斯能有此般豪情，除开埃斯库罗斯倾注在这个神话人物身上本有的勇敢品质之外，不可忽略普罗米修斯对未来的预知能力：将来的一切都在他的料想之内(第 100-104 行)。信念赋予苦难中人勇气。正如佛教宣扬转世轮回、基督教打造死后天堂，其目的都在于给尘世中苦苦挣扎的凡夫俗子某种信念，以消解对当下苦难的感知。然而就在此时，普罗米修斯却突然听到一阵“索索的声响”：

哦，听啊，这是什么声音，还有这股清香，  
眼睛不能看见，是神明，还是凡人的  
送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飘至我的身边？  
谁个来临此地，大地的边缘，想要  
看视我的痛苦，还是另有别的打算？

.....

啊，这是什么？索索的声响，  
是鸟儿飞临这边？伴随振摇的  
翅膀，似喃喃的话语通过气流传来，  
过往的行者，不管什么，都会使我不安。

(第 113-126 行)

剧作家在此至少传达出普罗米修斯以下两层“不安”：

第一，对“过往的行者”的不安。

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对谁个会来探视自己深感不安，以致他对自己无法确定的声音或是气味极为敏感。和荷马史诗中勇猛的战士一样，众神非常在乎自己的名誉是否受到轻视。<sup>①</sup>上文所说，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的行为给神界带去了伤害，普罗米修斯深知众神对自己充满了怨恨与不满。当俄开阿诺斯经过长途飞行来到高加索，希望能对普罗米修斯有所帮助之时，普罗米修斯认为对方是来“拿我的痛苦赏析”(第 301 行)、“欣赏我的凄苦”(第 304 行)，兴许会“另有别的打算”。毫无疑问，锁链的捆绑给普罗米修斯带去了切肤之痛。但对

<sup>①</sup> [美]托马斯·R.马丁著：《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61 页。

不死的神明，身体之痛或许不亚于领受此种惩罚带给当事者“人”格上的贬损。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不仅普罗米修斯本人，包括剧中其他人物，都在多处表现出被锁链捆绑在位于大地边缘的高加索乃是一种耻辱。赫法伊斯托斯不忍钉绑普罗米修斯，并非因为他赞成后者的盗火行为，而是出于同类对同类的怜悯：“一位神明，让他置身悬崖，在这寒冷的冬天。”（第 15 行）普罗米修斯呼唤晴空、大地等来看视自己，形容自己所受的苦痛是一种“羞辱”（第 93-94 行）。歌队初次探望普罗米修斯说：“我看见了，普罗米修斯，带着惊恐/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看着你蒙受耻辱，/伸展枯萎的躯干……”（第 144-147 行）普罗米修斯表示自己宁愿被扔进哀地斯的冥府，因为唯有如此，自己才能避免成为无论神祇、还是别的生灵的笑谈（第 151-159 行）；而自己现在却“被吊在这边，成为疾风玩耍的物件——/我的磨难，悦爽仇敌的心怀”（第 158-159 行）。在询问普罗米修斯何以被绑时，歌队又问：“宙斯为何把你抓住，他的理由何在/让你屈遭奇耻大辱，备受凶灾。”（第 197 行）赫尔墨斯规劝普罗米修斯说出宙斯的婚姻秘密，普罗米修斯的回答是：除非宙斯“解了这侮辱我的镣铐”<sup>①</sup>。普罗米修斯深知自己私盗取天火必然遭致了众神的恨怨（第 120 行），他对“过往的行者”可能到来产生的不安，他所害怕的别人的“另有打算”，正是自己眼下的处境会“悦爽仇敌的心怀”。被绑高加索给一位神明带来的耻辱，或许超出了凡人对此的想象。难怪普罗米修斯会对宙斯先行前来与自己妥协如此坚持！<sup>②</sup>

第二，对振摇翅膀的“鸟儿”的不安。

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结尾处，赫尔墨斯裹挟宙斯的意志而来：要普罗米修斯告说那场会令宙斯威风扫地的机密。在与普罗米修斯相互的言语攻击中，二者将矛盾推向高潮。作为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预言了普罗米修斯如要继续放任 hubris 将要面临的痛苦：首先是普罗米修斯将跌落哀地斯幽黑的深渊，经过漫长的苦苦挣扎方能重见地表的光线；接着，“宙斯长翅膀/的猎狗，粗蛮的飞鹰将赶赴不受禁止的/肉宴，每个白天，敞开深沟般的胃壑，/大口撕食你的肉片，饱餐你的/肝脏，把它啄得红里见黑”（第 1021-1025 行）。这是“飞鹰”在三联剧中的首次出现，不禁让人联想到《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开始，普罗米修斯听到“索索的声响”而产生的对“鸟儿”的不安之感来。在第 123-126 行中，当普罗米修斯明确刚刚那声音是“索索的声响”，即到来的并非其他神明或是凡人之时，他忧虑的对象转移到了所到之物是否是“振摇翅膀”的“鸟儿”上来。我们没有直接的文本根据去证明普罗米修斯早就预见到了自己将会受鹰啄之苦，但从普罗米修斯用“这已不是新闻，此君喋喋不休地说罢/这些”（第 1040-1041 行）回答赫尔墨斯预告的关于飞鹰将饱餐自己的片段，我们或许可作如下推论：作为先知的普罗米修斯兴许早就预见到了飞鹰将会啄食自己的苦难，而他对“鸟儿”表达出的不安，恰恰来源于此。上文所言，普罗米修斯呼唤宙斯更为猛烈的打击，

<sup>①</sup> 此处取罗念生译文。陈中梅译文是：“在这些个残虐的桎梏被除去”（第 991 行）。英文译文——“However shameful, nor no shift of malice/Whereby Zeus shall persuade me to unlock/My lips until these shackles be cast loose.”——中普罗米修斯确有“被侮辱”之意。

<sup>②</sup> 此点在下节阐述。

是因为他“知道”无论什么打击都弄不死自己。但问题是，对于“当下”还并不会发生的“未来的苦难”，当事者即使知道也极易产生“置身事外”之感。如同死亡是每个凡人最终的归宿，但因死亡存在于不可预期的未来而显得并不那么可怕。并且，对普宙“必然”和解的预知，很大程度上也消解了现实的痛苦，并可能使当事者无法客观认识自己到底能否承受预言中“未来的苦难”。换言之，对某种事物是否真正惧怕，只有等到真正经历之时。而正在经历的苦难没有让当事者惧怕，是因为正在经历的苦难未能超出当事者忍耐的极限。因此，即使普罗米修斯预见到了未来的飞鹰，但因为飞鹰存在于“未来”而不是“当下”，所以“未来”的飞鹰在“眼下”也就显得未必那么可怕。而一旦普罗米修斯听到“索索的声响”，以为飞鹰真的“已经来到”之时，他对此的“草木皆兵”正好流露出他在思想深处（或许连当事者自己都未能清楚认知）对此的深深恐惧。普罗米修斯并非全无所惧。

## 二、“你们曾被预告，并非秘而不宣，并非突然袭击”

面对飞蛾扑火般的普罗米修斯以及誓死与其一同受难的歌队（第 1067-1079 行），无奈的赫尔墨斯说出了下面的一段话：

好吧，那就记住我的警告，事先  
的通牒，当你们遭受酷难的摧残，  
不要抱怨命运。不要说宙斯  
让你们受难，不曾预见，  
不要讲说这些，而应怪罪你等  
自己——你们曾被预告，并非  
秘而不宣，亦非突然袭击，  
只因你们的愚蠢，坠入毁灭  
的网间，无可解救，不能逃逸。（第 1071-1079 行）

赫尔墨斯的这段台词带有总结性意味。从表面看，这段话是赫尔墨斯说给歌队的，但明显也极为恰和普罗米修斯的处境。不管普罗米修斯本人是否预知到自己将来所要经受的具体痛苦，但经过赫尔墨斯的告说，未来的一切都再为明确不过。赫尔墨斯是宙斯的信使，尽管因带有与普罗米修斯同样的骄横而没能更好地尽到信使的职责<sup>①</sup>，但从根本上讲，他应该不会误传宙斯的旨意。换言之，不管是通过自己的先知能力，还是赫尔墨斯的告说，普罗米修斯是肯定明确知晓未来的苦难的。并且，从普罗米修斯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总体传达出的无畏表明：至少是在意识层面，普罗米修斯不惧怕苦难的未来。但是，三联剧的残篇<sup>②</sup>和最后结局却表明：经历高加索之绑，到哀地斯幽黑的冥府，再重到地表每隔两日被

<sup>①</sup> 同普罗米修斯因骄横而失去了一次与宙斯讨价还价的机会一样，赫尔墨斯同样可以认真思虑普罗米修斯所开出的条件，并将其传达给宙斯。尽管宙斯做何打算则是另外一回事。

<sup>②</sup> 具体参看本章第四节引用的三联剧残篇 6。



老鹰饱食一顿肝脏，普罗米修斯逐渐对苦难变得不堪忍受。他不再是无所畏惧的“先知英雄”，他只想结束痛苦，他的全部所想就是“死”。这与前面分析的普罗米修斯对“鸟儿”产生的不安似有相同之处。普罗米修斯对存在于预见之中的“未来”的“飞鹰”“不害怕”，而一旦在“眼下”听到类似于飞鹰的“鸟儿”的振摇翅膀的“索索的声响”，普罗米修斯“不安”了；“未来的苦难”并非“秘而不宣”、并非“突然袭击”，普罗米修斯对存在于预见之中的“未来的苦难”也“不害怕”，而一旦亲身经历之后便萌生了想要屈服的意愿。<sup>①</sup>作为“先知”的普罗米修斯在对于未来自信的同时，表达出了对“突然来到当下”的鸟儿的不安，以及对“走向现实”的苦难（残篇6）的难以忍耐。

普罗米修斯对未来“必然”（普宙最终和解）的预知来源于其母塞弥丝或者赫尔墨斯的告说。然而，这种预知仅仅停留在“知晓”的层面，并非是通过逻辑假设与科学推断而达成的“充分认知”。Richmond Lattimore 指出普罗米修斯的预见能力其实是有限的。<sup>②</sup>这种“有限性”正表现在他因缺乏对未来的深刻认识而得不出对事态发展具体过程的真正认知，因而将自己无休止的抗争、甚至是歌队的利益，全都押赴在那个“必然”发生的预言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指“人必须先考察自己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sup>③</sup>。而普罗米修斯恰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预见的“有限性”而盲目地骄横；并且，也正是其预见的有限性，阻碍了当事者对通往“必然”的漫长岁月中自己能否忍受身体的极致痛苦与意志的长期折磨的真正认知。

正因为掌握了“必然”发生的未来，普罗米修斯表达出了与对立面英勇顽强甚至是骄横的抗争；也正因自以为掌握了必然发生的未来，普罗米修斯忽略了自己预见的“有限性”，不理智地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无法承受的苦难之中。当然，普罗米修斯的勇敢不能因此而被全部抹杀，他为人类抗拒宙斯强权的勇气绝对可嘉。但是，勇敢并非等于无惧。作为“先知”，普罗米修斯的预见能力带有“有限性”，拥有的只是卜释意义上的预知。此种性质的预知只能赋予当事者对抗苦难的一时豪情，却难以成为信念与信仰的“理性”支撑。

## 第四节 “妥协派”

埃斯库罗斯没有延续赫西俄德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爱耍聪明的小丑形象，而是为世人塑造了一个敢于与强权抗争的“英雄”典范。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那一路飙升的愤怒情绪、一次胜过一次的火爆话语，以及在与宙斯使者赫尔墨斯的争锋相对中不可遏制地将自己推向泰塔罗斯的豪情，都表明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

<sup>①</sup> 参看本文第四章第二节。

<sup>②</sup> Richmond Lattimore. *The poetry of Greek Traged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7.

<sup>③</sup>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录》，第4卷第2章第25节。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2），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活、鱼死网破的殊死对抗。在雪莱、拜伦和歌德等人笔下，普罗米修斯更是被打造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抗者形象。

然而，根据《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残篇，我们却得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普罗米修斯并非彻底抗争的“英雄”，三联剧最终以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和解告终。<sup>①</sup>三万年过去，普罗米修斯对痛苦的忍耐已达极限。经由提坦组成的歌队<sup>②</sup>和地母<sup>③</sup>的劝解，普罗米修斯逐渐开始放弃固执和倔强，萌生了愿意屈服的心态，并最终得益于宙斯——也即普罗米修斯曾经的对手——之子的解救，走下了高加索，并将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主动告知了对方。<sup>④</sup>

至此，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是否与《普罗米修斯》三联剧构成了矛盾？埃氏着力展现的到底是一个抗争到底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一个终究妥协的普罗米修斯？更或者说是一个一直都在寻找妥协机会的普罗米修斯？在细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的剧情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除开本章第二节所分析的支撑普罗米修斯骄横的两个保障——对未来的预知和作为神明的不死性，普罗米修斯愤怒与火爆的抗争激情，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剧中逐次登场的其他角色——歌队、俄开阿诺斯、伊娥和赫尔墨斯等——的影响。面对充分同情普罗米修斯的歌队（当然，歌队对普罗米修斯的同情中也包含对后者放任 hubris 的批评）、到明显偏向宙斯立场的俄开阿诺斯、到与普罗米修斯同为宙斯受害者的伊娥、到宙斯神指气使的使者赫尔墨斯，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愤怒与反抗情绪一路飙升，最终被宙斯粗蛮的炸雷扔下乌黑的泰塔罗斯。然而，在日渐升级的愤怒抗争之下，剧作家一以贯之的重点却是：普罗米修斯凭靠自己所掌握的宙斯的婚姻秘密，一直在等待宙斯的先行妥协，他从未想过要与宙斯抗争到底。《普》剧中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和解，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早就做好了铺垫。

## 一、与歌队及俄开阿诺斯

剧本之初，普罗米修斯尽管刚被钉绑在高加索之巉壁，却对未来充满了乐观自信。赫法伊斯托斯与强权和暴力下，普罗米修斯独自一人。他呼唤晴空、风儿、河流、太阳以及大地母亲均来看视自己的灾难与苦痛（第 88-95 行），大有英雄受难的壮烈之感。面对眼下的痛苦，他高呼“苦哇，磨难”，却立即被自己知晓的一个“必然”事实——“命运使我度过难关”——所鼓舞，表示未来一切均在自己掌握之中，不会对宙斯施加的苦难大惊小怪（第

<sup>①</sup> 普罗米修斯最终被释，见残篇 1。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Aeschylus), p102。

<sup>②</sup> 歌队在第二出剧中由被释放出泰塔罗斯的提坦组成，见残篇 4、5。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03,104。

<sup>③</sup> 有些奇怪的是，残篇 3 列举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人物表中包括地母(Earth)和赫拉克勒斯。然而事实上，二者并未出现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从赫拉克勒斯出现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残篇 11、12、14）可以推测，地母应该同样也出现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trans.), *Prometheus Bound*(Aeschylus), p103。

<sup>④</sup> 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0, p.334. 另结合残篇 1、2。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trans.), *Prometheus Bound*(Aeschylus), p.102。

100-104 行)。此时普罗米修斯所传达的还只是对未来必胜的坚定信念，而未来的胜利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实现还不得而知。

歌队到来，眼见普罗米修斯被锁链捆绑的惨烈画面，她们指责宙斯的统治“无法无天”（第 150 行）。刚因不知何物的“索索的声响”而不安的普罗米修斯，再次高呼“苦哇，悲难”（第 136 行），悲观地表示希望宙斯将自己扔进哀地斯的冥府，而不致沦为众神的笑谈（第 152-155 行）。普罗米修斯近乎崩溃的情绪，争得了歌队的同情，她们进一步表示宙斯此般酷虐的统治只有在其王权被夺之时才会停止（第 160-167 行）。歌队对宙斯的这一评判吻合了普罗米修斯所掌握的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这让普罗米修斯先前的乐观自信得以复苏，豪迈激情也随之而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定胜孤家寡人般作战。尽管遭受着磨难，但信心满怀的普罗米修斯开始触及预言中的部分实质内容：我掌握了威胁宙斯统治垮台的秘密，在宙斯松开自己绑圈之前绝不屈服<sup>①</sup>（第 168-179 行）。接下来他便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他（宙斯）会酥软意志，总有一天/  
被我（普）知晓的方式镇得服服帖帖，  
罢息难消的怒气，  
急匆匆地赶来，和我一样急切，  
要求联合，建立友好的关系。（第 191-195 行）

请注意，普罗米修斯在表达自己所掌握的“知晓方式”必定可以制胜宙斯的同时，也首次透露出了他在普宙之争中所持的根本立场：在宙斯妥协之前，普罗米修斯绝不可能妥协。但只要宙斯妥协，便会带来普罗米修斯相应的妥协。普罗米修斯在心底一直急切盼望双方和解，他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就是宙斯的先行让步，而他自认他所掌握的“知晓方式”可以逼迫宙斯就范。因此，普罗米修斯并非要与宙斯誓死抵抗，他根本从未想过宙斯的真正垮台。他也并未因盗火致送凡人而希望与神界决裂，尽管他盗取天火的行为受到了众神的怨恨。他盼望的结局是自己能重回奥林波斯，并与其最高统治者宙斯联手。

俄开阿诺斯到来，规劝普罗米修斯要“根据事实”（第 339 行），“找一条摆脱困苦的途径”（第 318 行），处处表达出要尊服宙斯的立场（第 309-331 行），这在普罗米修斯看来，俄开阿诺斯缺少歌队的真诚（第 300-304 行），尽管他表示要替普罗米修斯向宙斯求情。面对俄开阿诺斯，普罗米修斯不再像对歌队那样居功地追述自己对宙斯、对凡人过往的功绩。他引用正在受苦的阿特拉斯及图丰之例，告诫俄开阿诺斯“明哲保身”，同时也表示自己将对愤怒忍受到底：

我将咽下这颗苦果，每一滴残汁，  
直到宙斯罢息怒气的那天。（第 377-378 行）

<sup>①</sup> 与第一次的独自言语（第 100-104 行）比较。

这与普罗米修斯对歌队传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即自己会在宙斯罢息怒气之时停止反抗。换言之，只要宙斯妥协，普罗米修斯就会妥协。他对未来局势的期待——在宙斯先行妥协的基础之上达成双方的妥协——没有改变。

## 二、与伊娥

因为宙斯的情欲与赫拉的嫉妒，伊娥从一位美丽的少女变成了一头小母牛，终日被牛虻和阿耳古斯追赶，狼狈而痛苦地奔波在一片片荒原。并且，在普罗米修斯的预言中，她还需要经历“痛苦的大海，激浪般的祸灾”（第 746 行）。伊娥的到来让普罗米修斯不再如从前般自信乐观，因同病相怜而更多添了一丝愤怒。在伊娥悲叹生命无益、不如一死了结之时（第 747-751 行），普罗米修斯忍不住顾他人之影而自怜之：伊娥可以一死了之，而自己只能等到宙斯垮台的那天：

我的痛楚你不会愿意听见，  
我没有死的命限——死了  
倒能省去这些愁烦，而我，  
我的劫难无有期限，直到，  
宙斯倒台，倒下权势的峰巅。（第 752-756 行）

可以得见，普罗米修斯骄横的支撑之一——作为神明的不死性——在此却成为了普罗米修斯哀叹自己苦难无有期限的原因之一。普罗米修斯对伊娥悲苦处境的感同身受，由此可见一斑。与歌队和俄开阿诺斯的表述——直到宙斯罢息怒气的那天——不同，普罗米修斯在哀叹的同时，开始诅咒起宙斯的统治来：只有宙斯的统治被推翻，自己方能获得解放。愤恨与凄苦交加的普罗米修斯忘记了之前的预言。他似乎不再等待宙斯给自己松绑、不再等待宙斯先行妥协。他那呼之欲出的抗争形象在看似与宙斯的势不两立中得以加强。

随后，普罗米修斯在与伊娥你言我语的大段台词中，第一次实质性地提到了那场将会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来——“他会受损，得之于将来的婚姻”（第 764 行），并被这场婚姻中所生的孩子所推翻（第 768 行）。然而，当伊娥追问可有解救的办法时，普罗米修斯回答说：

没有，绝对没有，除非把我解下锁链。（第 770 行）

普罗米修斯表达的意思是：只要宙斯愿意将自己解下锁链，宙斯就可以躲避统治被推翻的凶灾。普罗米修斯在此再次表达了面对歌队和俄开阿诺斯所表述过的相同立场：宙斯一旦给普罗米修斯松绑，后者就将会婚姻秘密告诉前者。<sup>①</sup>

接下来，在对伊娥过去苦难和将来浪迹的叙说过程中（第 790-869 行），在眼见歌队因伊娥处境而自怜之时（第 886-907 行），普罗米修斯的愤怒再次飙升。需强调的是，普罗米

<sup>①</sup> 对伊娥和盘托出，除了因为与伊娥相似的处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伊娥的第十三代男孙（赫拉克勒斯）将会解除普罗米修斯的苦难。

修斯对宙斯的评判，对自己与宙斯之间关系走向，以及自己如何在此种关系中调适自我心态与行为，<sup>①</sup>都强烈地受到了剧中其他角色的影响。他又似革命者般宣告宙斯的覆灭、预言中的婚姻会让宙斯的强权和王位销声匿迹、不留残余（第 907-912 行），看似对客观存在于神界的“必然”命运进行着一种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的述说。然而，

众神不知逃避祸灾的机密，只有我，  
是的，只有我知晓过程的细节：我  
全知此事，它会如何实现。所以，  
让他端坐王位，踌躇满志，自信于  
震撼天庭的响雷，挥舞手中暴虐的闪电。

这些全都无济于事，救不了他的跌毁。（第 913-918 行）

愤怒的普罗米修斯在诅咒宙斯统治终将毁灭的同时，强调了自己关乎宙斯统治能否长存的绝对重要性。普罗米修斯在此没有表达希望宙斯罢息怒气的愿望，更没有表达自己想与宙斯和解的心愿。但是，他着重表达了一个用最简单的逻辑也能推导出的结论：宙斯要想统治长久，必须且只能与普罗米修斯和解！

### 三、与赫尔墨斯

宙斯的使者赫尔墨斯裹挟骄横而来，将剧中矛盾推向了至高点。赫尔墨斯带着父亲宙斯的任务，一出场便态度蛮横地命令普罗米修斯告说那场会威胁宙斯独权的婚姻。傲慢的赫尔墨斯让普罗米修斯愤怒得无以复加，他高傲地表示自己绝不会屈服，将活着见证宙斯的覆灭（第 958-959 行）。骄横与骄横的冲撞可怕而无意义。然而，为了压制宙斯仆役的嚣张，普罗米修斯让自己陷入了更为暴烈的情绪之中，与赫尔墨斯开始了一场于事态解决毫无意义的冷嘲热讽，并将愤怒的苗头指向所有的神明。普罗米修斯的暴烈让观众感觉事态已无回旋余地。但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在与赫尔墨斯同出一辙的狂傲中，依然表达了他对于解决普宙矛盾的一贯立场：

没有哪种折磨，或是什么机械，  
可帮宙斯实现目的，诱使我说出机密，  
在这些个残虐的桎梏被解除之前。（第 989-991 行）

.....

不要以为，由于宙斯的暴烈，  
我会转向女人的求祈，高举上摊的手心，  
效学妇道的模样，请求我所痛恨的那位  
松解我的锁链。这不是我，决非我的作为！（第 1003-1006 行）

---

<sup>①</sup> 确切说是调适自我心态。因为普罗米修斯的身体受宙斯掌控，难以动弹。

普罗米修斯用愤懑的态度再次清楚地表明，自己愿意说出威胁宙斯的机密，也愿意帮助宙斯避免跌落的命运。只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一贯原则：宙斯必须先将自己身上这残虐的桎梏解除，自己决不在此之前先行妥协。尽管因为走进了狂怒的泥沼，普罗米修斯说出了许许多多诅咒宙斯垮台的话语，但他对自己与宙斯之间关系走向的真正期待从未因愤怒而改变。只是在对伊娥悲苦处境的感同身受中，在宙斯使者赫尔墨斯的极端傲慢和言语威胁中，普罗米修斯深刻地感受到，要宙斯主动来与自己和解是多么困难，自己一直坚持的宙斯的先行妥协难以实现。这更深化了普罗米修斯的暴虐情绪。他高呼专属宙斯的闪电和炸雷，挑衅宙斯将自己“高高举起，扔下乌黑的泰塔罗斯”（第 1050-1051 行），并终遂其“愿”。

#### 四、三万年后

如果普罗米修斯因此而永陷囹圄，人们很有可能会忽略上文的分析：只要宙斯先行妥协，普罗米修斯便会妥协。普罗米修斯或许还可以被粗心的评论者称之为坚定的反抗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普》剧的残篇 6，记述了普罗米修斯在经历三万年的锁链之绑与鹰啄之痛中，对于苦难的忍耐已达崩溃的边缘<sup>①</sup>。他呼唤提坦兄弟看视自己的苦难<sup>②</sup>：

“提坦诸神，  
我的骨肉兄弟，  
苍穹之子，  
且看我！  
拘系在此，锁镣银铛，  
身缚在这巉岩之间！  
俯望海岸，正黄昏时候，  
航行者战战兢兢，  
穿越砰訇波涛，  
冀望人船平安。  
此地域，彼宙斯，  
克罗诺斯之子，  
借赫法伊斯托斯之手，  
将我绑缚，  
终遂其愿。  
赫法伊斯托斯，  
采用严酷的方式，  
楔子钉头，

<sup>①</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99.

<sup>②</sup> 与《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呼唤晴空等看视自己苦难相比较。

敲打不息，  
钻入身躯，  
我被撕裂，被刺透。  
恩德无疆，  
俾我在此复仇女神堡垒间，  
矗立眺望，呻吟哀叹！

每隔两天，白日犹夜，  
宙斯所饲苍鹰，  
振羽而至，  
如钩的鹰爪，  
在我身上剝掘索食，  
饱食我的肝脏，  
直至满足它的肠胃。  
然后厉叫一声，  
再度振翼而去，  
盘旋天际……  
尾翼犹滴血不止，  
源自我的身体。

残破不堪的肝脏，  
复又重新愈合，  
嗜血的苍鹰，重又来到。  
如此这般，  
我喂养这位看守者：  
它所回报的，  
是无休止的仇恨，  
以及对我身躯不停歇的折磨——  
且看！宙斯用他的锁链  
将我紧锁，  
我无力自保，  
俾肝脏不为苍鹰啄食。  
如今，只好剖开胸膛，  
取出痛苦所在的肝脏，

好歹求得一死，结束苦难。

但宙斯，却别有企图，  
要使我求死不能。  
叫人战栗的世纪过去，  
新的世纪来到，  
而苦难却是一样，  
身体里钉楔依然。

流出之血

融化在高加索的烈日之下

永无止境地滴沥在岩石之上。”<sup>①</sup>

剧作家在此描述的灾难让人触目惊心，有人称这是古希腊悲剧中最为令人惊悚的片段。<sup>②</sup>普罗米修斯不再重提他的预言，更不见自信满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极致折磨和深切悲苦的无奈。曾经豪言在宙斯妥协之前绝不妥协的誓言，不再出现；曾经自信的“不死”的神性，已成为结束苦难之方源（只求一死）的阻碍。见赫拉克勒斯在此时射杀大鹰，普罗米修斯便主动告知对方自己曾在其父宙斯与克罗诺斯的争斗中帮助宙斯打败了敌手，以请求赫拉克勒斯去掉自己身上的锁链，主动为自己与宙斯的和解铺平道路。

从普罗米修斯刚出场时的意气风发，到受伊娥处境与赫尔墨斯傲慢的影响而愤怒飙升，到最终因对苦难的不堪忍受而与宙斯走向和解，普罗米修斯对普宙之间关系的预期，经历了从自信、到悲愤、到最后无奈地主动寻求和解的过程。然而，即使是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逐渐升级的愤怒都只是一种表象，尽管严重地受到了自己对痛苦——身体之痛与颜面之辱——的体感的影响，但从来都没真正影响到他盼望能与宙斯和解的真实愿望。他与宙斯、与众神之间的矛盾，都只是奥林波斯神系的内部矛盾。普罗米修斯从始至终就不是要与神界、与宙斯决裂的反抗者，他是一位真正的奥林波斯成员。《普》剧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宙斯想要真正铲除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更是从来从未真正想过要脱离奥林波斯。普罗米修斯抗争的对象，正是其深知最终要和解的对象。与其争执《普》剧中普罗米修斯到底是“抗争派”还是“妥协派”，倒不如去探究到底是宙斯先行妥协还是普罗米修斯先行妥协。因为影响普宙关系的根本之处并非在于“是否妥协”，而仅仅在于“谁先妥协”。

---

<sup>①</sup> 残篇 6，中文系笔者翻译。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p.104-105.

<sup>②</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99.



## 小 结

走笔至此，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试图还原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复杂形象，并非意在瓦解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利益代表者的一面，也并非要解构大众评论赞褒的普罗米修斯对宙斯强权难能可贵的抗争。笔者所要表达的中心观点是：普罗米修斯并非是一位“十全十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原型形象。<sup>①</sup>说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的行为中不能排除借此与宙斯抗衡的动机，并非完全否定普罗米修斯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毕竟，在宙斯想要毁灭人族之际，只有普罗米修斯具备抗拒的勇气，并为此身陷囹圄。指出普罗米修斯盗火侵害了神族利益，扰乱了神界秩序，并非是要完全否定其盗火行为。没有普罗米修斯对神界规则的僭越，哪来人类后来的发展？批评普罗米修斯在与宙斯的抗争过程中犯了骄横的错误，并不是说普罗米修斯不该与强权的压迫决然抗争，而是意在表明在己方也有错的前提之下，当事人是否有必要进行如此彻底的抗争？揭开“英雄”恐惧的“伤疤”，不是说普罗米修斯不是“英雄”。英雄也可以害怕，英雄也可以表达恐惧。点明普罗米修斯是“妥协派”，是要为下个章节做出铺垫，为指示剧作家复杂、高明的创作原意做好准备。

问题的陈述似乎由于缺乏统一价值观的支撑而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然而，世间各种力量的斗争本来就不只是“对错之争”。埃斯库罗斯所要展现的，正是一个带有缺点的、犯了错误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展现“理性”在角色上升空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个完美的形象是静止的，他属于“天上”；而一个带有缺点的形象是要走向进步的，他属于“人间”，并在走向进步的过程中向他人及自己展现“智慧”的重要性。<sup>②</sup>正如陈中梅所言：《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属于 19 世纪的无产者，而作为一个整体的《普罗米西亚》则不同，它的“视野”远为开阔，似乎更具历时的人文魅力和通连现代的复杂思想。<sup>③</sup>

<sup>①</sup> 在某种程度上，读者很难从《普》剧中获得一种道义上与政治上的确定性，剧中每一个角色的本性都让人难以捉摸。伊娥，是发疯的小母牛，还是英雄赫拉克勒斯的母亲？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的受苦者还是神圣的先知，是人类利益的捍卫者还是神族集团的不满分子？宙斯，是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还是仁慈的父亲？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5。

<sup>②</sup> 《徒然草》是日本歌人吉田兼好的作品，与《枕草子》并称为“双璧”，其中一句话如是：“保留某种不完善会使事物显得有趣，并使人感觉到还有一点发展的空间。”

<sup>③</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8 页。

## 第四章 走近原型（二）——普宙和解

公元前 8-7 世纪，古希腊城邦出现，社会 and 人际关系开始呈现新的形态。争锋相对的讨论、争论和辩论，逐渐代替以前宗教仪式中的警句格言，取代原先只属于国王和贵族的话语权。与对问题的公开论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然而，民主的进程依然曲折。在雅典，尽管梭伦(Solon)极力调解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贫民的不满情绪，但内部矛盾依然不断。上台后深受贫民拥护的庇西特拉图(Peistratus)于公元前 546 年成为了雅典第一位僭主。他去世后，其子希庇阿斯(Hippias)继位。希庇阿斯掌权期间，均任用其亲朋好友担任要职。公元前 508 年，克莱赛尼兹(Cleisthenes)承诺加大民主改革力度，由民众授权开始着手实施民主政制建设。至埃斯库罗斯生活的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民主的发展臻达顶峰，马拉松、萨拉米等战役证明了希腊民主政体的极致辉煌。雅典由此走向其“黄金时代”。但是，事物总是难逃辩证的两面。在公民的政治权利最大化的同时，人们却又开始认识到极端民主的弊端。希波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不是雅典人的团结奋斗，而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和法律内讧以及各种愈演愈烈的内部纠纷。人之本性中生就的对权利的欲望和对财富的追逐，阻碍着理性主义的阔步向前。<sup>①</sup>变革与传统相互抗争所产生的紧张局面，在带来创造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腐蚀性。如何保证公民正确使用手中权力成为了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问题。人们需要找到一种超越政治体制中所有人权利的最高制衡，那就是城邦的整体利益以及由文字记载的城邦法律。城邦的重要性绝对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城邦法律变成了公共财产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普遍规则。城邦与法律相结合，挣脱了过去君王的绝对权力，表现为一种新的神圣秩序，任何个体都必须遵循平衡的法则和平等的规范处于这一崭新秩序之中。与此对应的是，斯巴达人列队作战中整体式的重装步兵，取代了荷马史诗中驾驭战车的充满战斗狂热的个体精英。<sup>②</sup>如同每一位公民都必须绝对遵从法律一样，每一名步兵都处于整体队列之间，服从统一的纪律，抑制一切可能扰乱阵营整体秩序的本能冲动。任何企图表达个人战争狂热以及在战争中寻求纯粹个人荣誉的行为，都是“不节制”的表现，都被当作“狂妄自大”(hubris)而受到指责。人们崇尚的理想是节制、谨慎和朴素。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为了追寻个人的沙场荣光，而让母亲塞提斯求助宙斯的经典场景，不再属于这个时代的颂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视作扰乱城邦秩序的表现。只有当内部每个因素都限制在其自身不应超出的范围之时，才能建立起均衡的、受法律支配的城邦，才有平衡与和谐的宇宙。<sup>③</sup>

<sup>①</sup> 参看：《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②</sup> 在荷马史诗中，人们乘车到战场，然后下车步行。战车仅为运输工具。

<sup>③</sup> 参考：《希腊思想的起源》，第 37-54 页；《古希腊节制思想》，第 138-141 页；《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第 106-108、125 页；《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 第一节 敌对与和解

和谐与安宁是民主政制建设的必要保证。然而，对任何社会来说，秩序的建立并非一马平川。斗争与冲突并未因城邦的理想而绝对消失。在雅典剧院中，达奈俄斯的女儿们正面临埃古普托斯儿郎蛮横而疯狂的追婚；厄忒俄克勒斯听不进歌队的劝阻，被迷茫的心智掌控，狂怒地出战兄弟波鲁尼科斯而最终两败俱伤；奥瑞斯忒斯险些就因弑母之罪而走不出几近疯魔的痛苦……在奥林波斯山上，普罗米修斯——这个在赫西俄德的神话中表现为爱耍小聪明的形象——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一跃而成为了一名英勇的“抗暴英雄”，其力量正凭借他所掌握的威胁最高统治者统治的机密而逐步升级。<sup>①</sup>伴随力量升级而来的是骄横、恣蛮（即 hubris）的冲动、发作与不可遏制。<sup>②</sup>普罗米修斯敢于为弱小的人类与宙斯抗衡的勇气让人激动不已，而他表达个体 hubris 的狂妄却是“不节制”的典型表现。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说：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sup>③</sup>陈中梅说：hubris 是导致身败名裂的前奏，最终将把人（神）引向毁灭。<sup>④</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结尾，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然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破坏性灾难。宙斯的暴虐不可原谅，而普罗米修斯同样也逃脱不了带给奥林波斯不安、扰乱宇宙秩序的罪责。

普宙对立，普罗米修斯的身体不被解绑，宙斯的心灵不得安宁。然而，这却是当事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谁也逃脱不了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悲难”来源于双方所犯的“错误”。宙斯的愤怒（也是一种 hubris）表现了统治阶级难以摆脱的顽疾，而普罗米修斯对于自己 hubris 的丝毫不加节制同样是一种可怕的病态。双方的斗争让奥林波斯神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扰乱了刚刚取代克罗诺斯所代表的蛮力时代的“新”的人神格局。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地母在提坦劝解普罗米修斯无效之后亲自出马，因为宙斯此时正在追逐塞提斯的爱情。情势处于高度戏剧化之中。只要普罗米修斯再坚持不说出婚姻秘密多一点点时间，宙斯的统治就即将垮台。传说中，地母最为古老，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古希腊神明中最为令人敬畏的威严之神。万事万物均借由她得以起源，复又回归原来的状态。她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赋予神界与人界全部的预言者以灵感。地母请求普罗米修斯趁宙斯还未追求到塞提斯之前赶紧与宙斯和解，不仅是为了普罗米修斯的被释，更是为了阻止宙斯统治的垮台以及奥林波斯神族整体的覆灭。<sup>⑤</sup>

<sup>①</sup> 一般认为，普罗米修斯知晓有关塞提斯（以后生子阿基琉斯）将生养一个比父亲力大和豪勇的儿郎的“机密”（而走私和波塞冬却正在争夺塞提斯的爱情），这一细节的铺设很可能是出自埃斯库罗斯的“首创”。参看[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9 页。

<sup>②</sup> 参看：本文第三章第二节。

<sup>③</sup>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希腊的回声》，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sup>④</sup> 参看：《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⑤</sup> 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p.332-333.

然而，就在双方的持续抗衡给各自、对方以及整个奥林波斯神族带去负面效应的同时，我们发现，二者又都具备“善”的一面，都有可为自己辩说的理由。普罗米修斯，这位同情弱小人类并敢于因此而与强权抗争而身陷囹圄的人类利益的代表者（某种程度上）自不待言；即使是宙斯，这位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俨然的僭主形象，也同样具有“善好”的一面。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处于执政神位置的宙斯的统治“残酷无情”（第187行），这位“新掌权的王贵”（第96行）“把乌拉诺斯的/生养镇管得抬不起头来”（第164-165行）；敲打青铜锁链捆绑普罗米修斯的声响给歌队带去“恐惧”（第134行）和“惊恐”（第144行）；折磨得伊娥“只想跳下峥嵘的石岩，头撞地面”（第748行）。正义不再永随宙斯的宝座，<sup>①</sup>这位“暴虐的主儿”心肠硬如“磐石一般”（第34-35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看待宙斯的天空，奥林波斯神族无疑具有某种必然为历史淘汰的落后性。<sup>②</sup>但是，宙斯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相比“蔑视谋略的精密，/以为凭恃他们的粗蛮，雄心勃勃，/便可武力夺取霸权，不费吹灰之力”（第208-210行）的提坦一族，“新”<sup>③</sup>的统治者更加乐于接受“工于心计的规划”（第215行），最终战胜了代表蛮力的克罗诺斯及提坦，取得了天空霸主的地位，表现出一种因为更优秀而有权统治宇宙的智慧。<sup>④</sup>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中说到：“公正的尺度应该协调各种本质上不相等的力量，保证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适度的优势。”<sup>⑤</sup>如果说对强权的“反抗”是作为非执政神的普罗米修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弱小阶级诉诸自身要求的一种手段，那么对于非执政神的反抗行为的“镇压”，则体现了作为执政神的宙斯在统治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以大局为重的决断与气度。宙斯对普罗米修斯扰乱规则与持续骄横的打击与惩治具有不得不为之的必要性。韦尔南在讲述富人与平民之间关系的一段引文，似乎为宙斯解决普宙之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案：“不公正导致了对民众的奴役，而奴役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动；所以，恢复秩序的合理措施应该是，在消除富人傲慢的同时，停止对平民的奴役，但又不因此而迁就任何破坏活动。”普罗米修斯先前帮助宙斯打败克罗诺斯，后又帮助人类与宙斯抗衡。不可想象，这位在“抗拒的勇气”（第237行）上表现最为突出的“反抗英雄”如果登上了宙斯的位置，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尽

<sup>①</sup>《阿伽门农》第1563行：“正义永随宙斯的宝座。”埃斯库罗斯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对宙斯的褒贬已明显不同于荷马和赫西俄德时代，甚至也区别于剧作家留存于世的其他几部悲剧作品。在《祈援女》中，宙斯是“助佑者”（《祈》第1行）、“解救者”（《祈》第26行）、“善好人们的护卫”（《祈》第27行），他“以公正的态度审视”（《祈》第403行），“谁也不能坐位他的上头，拥有使他惊服的力量”（《祈》第597行）。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在德行与力量方面都明显滑坡，并且还遇到了一个不求助于他者便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普罗米修斯掌握了会令他统治垮台的机密。

<sup>②</sup>“大神宙斯和以他为首的奥林波斯诸神（以及整个希腊神族）最终溃败于另一个‘逻各斯’，那就是注重并逐渐学会借用包括哲学在内的古典知识，为宗教得之于先天的秘索思取向和内在神秘本质提供理性解释与论证方法的基督教神学。”陈中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sup>③</sup>当然，“新上台的权贵没有一个不是暴虐的主儿”（《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第35行）。但是，宙斯的“新”不仅表现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也表现在统治的进步性上。

<sup>④</sup>奥林波斯神系调和了力量的优势和名誉的恰当分配，秩序和权力在他的统治中得到结合，并成为一种稳固而又持恒的状态。参看：[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3、306页。

<sup>⑤</sup>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2页。

管普罗米修斯并未想要真正推翻宙斯)！陈中梅在《宙斯的天空》一书中着重阐述了“独裁”在特定时代的进步意义。陈先生指出：独裁曾经是人们整体和自愿的选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代表先进。“合理”的独裁或许比最坏的无政府状态要好，也比长时期的大规模争斗和流血牺牲更能体现稳定的可贵。<sup>①</sup>掌握了威胁最高统治者统治机密的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无休止的抗争所带来的破坏，力证了宙斯在某些方面的“暴力镇压”及“独裁”的必要性：一个从体制上厌恨并进而反对独裁的时代，显然还没有超越时空，提前到来。<sup>②</sup>同样，面对“没有头脑、缺少智慧”（第 443 行），像梦中的幻影般浑浑噩噩虚度漫长岁月（第 449-450 行）的“可悲的凡人”（第 233 行），作为宇宙最高统治者的宙斯有权利去“协调”日益滑坡的“人神格局”。<sup>③</sup>虽然他所采取的方式手段的确偏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宙斯对人类也逐渐友善起来。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放弃了毁灭人类的打算，并派遣自己最为卓越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去到人间帮助人类。<sup>④</sup>赫拉克勒斯在宙斯的指导下，执行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任务”<sup>⑤</sup>，清除了阻止人类进步的障碍。也正是宙斯这位最为卓越的儿子，最终释放了普罗米修斯，为普宙关系从对抗到和解的转折铺平了道路。除此，宙斯在对待剧中其他人物（角色）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善好”的一面，他逐渐学会了用“宽容”调节自己的统治。<sup>⑥</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是僭主；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俨然成为了救世主。<sup>⑦</sup>他对克罗诺斯及提坦一族残暴，却又将其释放出乌黑的泰塔罗斯；他因自身情欲而让伊娥受难，但最终还是充满怜悯地停止了对后者的追求。在伊娥故事的结尾，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与《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完全不同的情感：宙斯对这个可怜的少女表达出了一种难得的温情。

应该予以说明的是，《普》剧中出现的所有角色都是“神”，<sup>⑧</sup>“人”并不是该剧的重点。埃斯库罗斯表现的重点不是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人”与宙斯所代表的“神”之间的对抗。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的利益。但是，盗火致送凡人只是普罗米修斯一个并非真正完全从人类利益角度出发而做出的行为——神并非真正“爱”人，无法因此而将普罗米修斯实质性地对等人类利益的代表者。况且，普罗米修斯一直在等待宙

<sup>①</sup> 陈中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 页。

<sup>②</sup> 陈中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 页。

<sup>③</sup> 按照赫西俄德的神话，人类经历黄金、白银、青铜和英雄种族，一代不如一代，最终进入到“堕落到极点”的黑铁种族。这些罪恶遍身的人不知道畏惧神灵，信奉力量就是正义，赞美和崇拜作恶者及其蛮横行为。羞耻和敬畏两女神决定抛弃人类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参看[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6-7 页。

<sup>④</sup> 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332.

<sup>⑤</sup> 宙斯对人类表达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善意。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5.

<sup>⑥</sup> 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p.331-332. 另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5.

<sup>⑦</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7. 其中还指出：宙斯身上表现出的与普罗米修斯相似的“救世主”的特征，让普宙二者的和解具有了某种基础。

<sup>⑧</sup> 伊娥是阿耳吉维地区的一条名叫伊那科斯的河流。参看[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2 页。

斯的先行妥协以待重回奥林波斯。人类的确因为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而被卷入到普宙之争的矛盾之中，成为被牵扯进去的获利者（火）或者说受害者（潘多拉）。但是，弱小的人类与宇宙的统治者宙斯并不构成悲剧矛盾的两极，读者切勿因《普》剧中“人”的被动介入以及自身身为凡人的立场就将“人”作为矛盾的主体对立以宙斯为首的神的世界，将“人”夸大性地居于人神矛盾的一端，而将愤怒的矛头直指宙斯。《普》剧的发生场地是高加索、泰塔罗斯和奥林波斯。高加索是“人迹不到的地界”（第2行），泰塔罗斯和奥林波斯更是绝对受神明控掌的世界。从悲剧发生的地理位置看，这也是一出完全以“神”为主角的戏剧，表达的是神明世界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之的处理模式。作为一种公共文化形式和城邦精神的体现，古希腊悲剧与现实城邦紧密相连，具有极强的政治教育性。它借用神话和英雄故事，探讨和当时社会密切相关的严肃的道德问题，探究城邦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中各自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其“全部目的在于教育公民为建构以城邦为中心的新的道德体系服务，并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诠释古希腊人最为重视的节制思想”。<sup>①</sup>《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上演于公元前480年以后<sup>②</sup>（一说前469年或前465年<sup>③</sup>），正值希腊城邦联盟在希波战争中取得让人震惊的胜利之后、雅典民主政治迅猛发展之时。这一时期雅典城邦的主要任务从之前的抵抗波斯转化为城邦内部的民主政制建设，这是自僭主希庇阿斯被推翻之后雅典一直以来的中心任务。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将奥林波斯的神族世界隐喻性地完全对等雅典的现实城邦，但《普》剧中所展现的奥林波斯内部执政神与非执政神之间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所产生的分歧，一定影射了剧作家寄托于城邦社会如何解决争端问题的思考。陈中梅在《普罗米修斯的骄横》一文中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创作肯定带有喻指现实的弦外之音，反映他个人的政治倾向，颇有深度地展现他对某些热门政治‘话题’的思考。”<sup>④</sup>换言之，埃斯库罗斯着力要表达的是神明世界内部的对立冲突及矛盾的解决，而不是站在人类立场反对与人完全对立的曾经试图扼杀人类的宙斯。因为从发展的观点看，一旦将矛盾的双方定义为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人”和以宙斯为代表的“神”，就变成了一种先进与落后（在今天看来甚至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抗争，而《普》剧的精深之处恰恰不在于此。

普罗米修斯并非“十全十美”，宙斯也并非“十恶不赦”。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发出了弱小势力抗争强权的呼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宙斯对其暴虐统治必须加以改善的迫切性；而宙斯对普罗米修斯僭越规则和偏激的骄横的报复，也不可排除他作为执政神的不得已而为之。况且，普罗米修斯——神界的“叛徒”——招致神界整体怨恨的行为表明，他正在宣泄的是令古希腊人极为反感的“个人主义狂热”。如何在发生剧烈冲突的普宙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成为了失去安宁的奥林波斯亟待解决的问题。<sup>⑤</sup>埃斯库罗斯的高明之处，或者说他的思想复

<sup>①</sup> 参考：[美]托马斯·R.马丁著：《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9、167页；祝宏俊：《古希腊节制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58页。

<sup>②</sup>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sup>③</sup> 祝宏俊：《古希腊节制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古希腊节制思想》，第160页。

<sup>④</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sup>⑤</sup> 如何从“多”中产生出“一”？这也正是古希腊思辨哲学产生的方式。

杂之处在于：在找到一条有效制约宙斯的途径之上，又表达了对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主义加以遏制的必要。普罗米修斯正在逐步“逼宫”宙斯，以其掌握的婚姻机密理直气壮地与对方抗衡。宙斯在对王权的不安与忐忑之中认识到自己的统治正在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与挑战，随时可能“翻船”。所以，在采取一些“暴力性”措施以避免异己力量产生与壮大的同时，宙斯面临的更大问题，则是有必要改善自己的统治，为真正的“和平”打下基础。<sup>①</sup>而普罗米修斯，这位让人遥生敬意的了不起的“先知英雄”，则需要意识到自己行为给同类带去伤害的同时，罢弃难以止息的 hubris，为自己重回奥林波斯神族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如果说关乎正义与否的斗争势必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那么对于普罗米修斯这样两个同样极其复杂的形象而言，双方在与敌对方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自身弱点并能对此加以修正、最终实现“双赢”才是重点。陈中梅指出：“对”与“错”（同样，“公正”与“邪恶”）并不是孤立和封闭的概念，因为“对”中往往包含“错”的基因，而“错”也往往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对”的理由。<sup>②</sup>既然矛盾的双方都犯了某种“错误”，又都具有“善好”，或者说有意向“善好”方向发展的一面，且也都对对方存有“善好”的期待，<sup>③</sup>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正视各自的“错误”，从错误中找出可资借鉴的教训，以期达成一种有张力的和谐。

城邦毕竟需要安定和谐的环境，熟悉毕达戈拉斯宇宙论思想的埃斯库罗斯似乎不会把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坚持的斗争哲学无条件地推向极限。<sup>④</sup>在其唯一完整存世的三联剧《奥瑞斯提亚》中，两股对立冲突的强大势力最终达成协议，言归于好，联手造福雅典市民。根据詹姆斯·斯卡利（James Scully）和 C. J. 赫林顿（C. J. Herington）的研究，《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也是一个非常连贯的整体，是一部行为与思想连贯发展的为数不多的三联剧。<sup>⑤</sup>三联剧残篇 15 如是：“埃斯库罗斯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明确写到，正是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我们头戴花环，以报答普罗米修斯曾经经受的锁链。”残篇 16、17 指出：宙斯解除折磨普罗米修斯的锁链之后，后者自愿弥补自己的“过错”，佩戴花环以代替锁链；不久，人类也开始佩戴花环，以感激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这表明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已经自发地达成了相互友好的局面。<sup>⑥</sup>因此，与《奥》剧相似，《普》三联剧表达的中心不是无休止的斗争与冲突，而是在斗争冲突中最终达成的和解：双方通过主动妥协，各自捐弃前嫌，联手共同

<sup>①</sup> 第一出剧中，“制导的命运”（《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第 511-516 行）强于宙斯的意愿。普罗米修斯肆无忌惮地向宙斯的使者赫尔墨斯高呼：“爱做什么，做吧：他可没有把我处死的本领！”（第 1053 行）而如今，他哀叹自己在宙斯的掌控下却不得一死了之。这表明在过去的三万年间，宙斯的意愿开始逐渐与命运相一致，宙斯的力量正在升级。因为逐渐走向善好的他会更多地与真正的正义具有相通之处。参看：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331。

<sup>②</sup> 《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③</sup> 酷虐的宙斯冀望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 终有止息，骄横的普罗米修斯企盼宙斯能将自己的锁链打开。

<sup>④</sup> 参看：《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利用神话故事展现对立双方的相互让步与妥协，是埃斯库罗斯惯常表现的主题。参看：David Grene. *Aeschylus II*, (trans. a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133。

<sup>⑤</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p.15-16.

<sup>⑥</sup> 残篇 15、16、17。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p.100,109。

造福奥林波斯神族。<sup>①</sup>

## 第二节 “节制”体现的“智慧”

宙斯的统治逐渐变得善好，普罗米修斯应该也不会一成不变。并且，在古希腊的神话世界，预言“必然”发生。然而，正如剧作家可能信奉的厄琉西斯秘教<sup>②</sup>的核心部分之一——人的灵魂要想被引领进明亮灯光的至福中，必须经历穿越充满恐怖景象的阴曹地府的漫漫黑暗<sup>③</sup>——所揭示的，在通往《普》剧“必然”（Moirai）的胜利之途中（事态发展的最终结局——双方的友好局面——早就存在于命运的预言之中），当事者必须经历至深的痛苦与折磨，“智慧来自痛苦的煎熬”（《阿伽门农》，第177行）。普罗米修斯，这位勇敢叛逆的盗火“英雄”，正是（部分地）因为洞见了一个“必然”将会发生的事实，而放任自己陷入到难以罢息的 hubris 的痛苦泥沼之中。直至三万年后，受尽折磨的普罗米修斯终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他请求提坦兄弟们见证自己的痛苦：被残忍的锁链穿透身体，被赫尔墨斯预言的老鹰撕食，他感觉生不如死。关于他曾向伊娥豪迈预言的自己的解救者（赫拉克勒斯）以及他所掌握的宙斯的婚姻秘密，此刻他一字不提。他的全部所想就是“死”。<sup>④</sup>在提坦与地母的劝说之下，普罗米修斯最终萌生了想要屈服的心态。<sup>⑤</sup>赫拉克勒斯的出现给普宙关系带去了实质性的转机，将先前多方的言语劝说推向事态可得以真正解决的高度。赫拉克勒斯射杀大鹰，普罗米修斯告知他未来之事。得之于前者的帮助，普罗米修斯走下高加索，将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主动告知后者并与之达成和解。<sup>⑥</sup>“必然”最终实现了，但其实现的“途径”是经受了难以忍受之痛苦与折磨的普罗米修斯的最终“妥协”，以及宙斯的主动向“善好”靠近。继续的敌对不合给双方都带不来任何好处，此时只有妥协才能展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陈中梅说：“公正是一个在冲突中依靠妥协逐步得以实现的过程。”<sup>⑦</sup>宙斯与普罗米修斯遇到的，从

<sup>①</sup> 埃斯库罗斯极为重视城邦的利益，曾亲自参加希波战争，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等地均留下了他战斗的身影。他在战争中看到城邦全体公民，甚至是各个城邦之间有效合作的必要性。希腊军队中不仅有富裕的男子和重装步兵，而且还包括成千上万的穷人，大家齐心合力共同抗敌。为城邦和国家利益而战的经历对埃斯库罗斯影响重大，他在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只字不提毕生辉煌的悲剧创作，而只是记录了他为国征战的功绩：“这里躺着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昂之子，在格拉的麦地；/马拉松神圣的园林会颂说他的勇气，/长发的波斯人已在那里知悉。”（《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如此重视城邦利益的剧作家着力表达的中心不可能是抗争，而只能是如何在抗争中吸取反面教训，使抗争中的双方（或各方）最终走向和平。

<sup>②</sup> 《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sup>③</sup> 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sup>④</sup> 普罗米修斯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的首次开口幸存于西塞罗(Cicero)的拉丁语翻译中，见 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331。另参看：残篇6。

<sup>⑤</sup> 提坦的劝解没有起到直接效果。参看：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p.332, 334。

<sup>⑥</sup> 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334。

<sup>⑦</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一开始就是一个对双方而言都具有主观选择性的命题。怎样选择，何去何从，二者都掌握着极大的主动权。身体与心理的痛苦与折磨对于宙斯和普罗米修斯来说，本可借“主动妥协”加以改变。然而，在漫长的三万年中，双方都将促使糟糕事态得以改观的法宝，赌押在了“对方”的“首先妥协”之上。<sup>①</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坚决“不予合作”的非理性态度表明，他不可能在宙斯妥协之前作出任何让步，主动放弃了寻找“必然”发生的途径。漫长岁月里遭受的极致痛苦，让普罗米修斯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sup>②</sup>，明白了“坐等”不来“必然”的发生。即使在宙斯的意志之上，还有“三种形态的命运”以及“复仇”；即使象普罗米修斯这样了不起的“先知”，在掌握了“必然”的前提之下，也还需要主动寻找“必然”发生的“途径”。“必然”必然发生，却需要现实的基点。埃斯库罗斯在树立这位英勇顽强的“抗暴英雄”形象的同时，不时地铺陈了“英雄”的缺点并指出了对缺点加以“改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普罗米修斯最终认识到：hubris 的继续放任对事态的改观毫无帮助（事实上只起到相反作用），“必然”只能依靠适时的“妥协”，依靠“节制”自己的坏脾气，去找寻“现实”与“必然”的通联之处。

“凡事勿过度”和“认识你自己”这两句话<sup>③</sup>，铭刻于德尔斐神庙墙上，是希腊人表达“节制”的理性思想的至理名言。与“节制”的品质相对应的是一种“秩序”，它强迫敌对力量保持平衡，竞争对手建立协约。<sup>④</sup>在《奥瑞斯提亚》中，剧作家借助理性的法律手段，由代表和平的雅典娜及众位判官投票表决，最终软硬兼施地抚慰及“招安”了愤怒的复仇女神。在《普罗米西亚》中，普罗米修斯最终罢息了无休止的 hubris，对多方善好、明智的劝解采取了“理性接受”的态度。当然，这其中还有赫拉克勒斯的实际行动以及宙斯的“谅解”<sup>⑤</sup>。奥林波斯在每个“个体”的“节制”中终于迎来了“全体”的欢庆场面，艰难地实现了《普罗米西亚》整体表达的从混乱与折磨到和平与欢乐的全面进步。<sup>⑥</sup>在《悲剧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一文中，陈中梅指出：埃斯库罗斯似乎倾向于认为，如果说彻底铲除“必然”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那么人们就必须用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生活，学会运用法律程序处理人际（神际）关系，在意识和行为的终极点上寻找理性与“必然”合作的契机。理性应该照顾“必然”的“面子”，它之最终战胜后者最佳手段不是诉诸暴力，而是通过谅解和劝说。<sup>⑦</sup>通过残篇我们发现，不仅是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甚至是伊娥与宙斯、伊娥与赫拉、

<sup>①</sup> 参考：本文第三章第四节。

<sup>②</sup> Simone Weil.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Greeks*, p.57.

<sup>③</sup> 这两句格言是当时希腊人认为由最有智慧的“七贤”共同铭刻下来的，教人要有自知之明，而且不要过分，也就是自制；所以“认识你自己”也就是“不要过分”（即“凡事勿过度”），也就是“自制”，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参看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2），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9 页。

<sup>④</sup>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73 页。

<sup>⑤</sup> 据说赫拉克勒斯用橄榄枝（暗指雅典娜在 the Academy in Athens 种植的橄榄树）捆绑了自己，因为宙斯可能对他未经自己允许就私自释放普罗米修斯有些生气。赫拉克勒斯这一行为的动机看起来是想让宙斯转移对普罗米修斯的气愤。参看：George Th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335。James Scully 和 C. J. Herington 提出：普罗米修斯身上带有宙斯的诸多特性，那么宙斯身上是否也带有普罗米修斯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剧本之初可怕的势不两立是否逐渐消退，普宙双方通过对对方良好品性的吸取而最终走到一起？参看：Simone Weil.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Greeks*, p.15。

<sup>⑥</sup> Simone Weil.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Greeks*, p.17.

<sup>⑦</sup> 《悲剧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

赫拉与宙斯、赫拉与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与奥林波斯诸神之间，最终都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sup>①</sup>在阿普利亚地区发现的一个红色的古希腊瓷花瓶上的图案中，大胡子的普罗米修斯居中，脚上还未卸去锁链。他的左边，站着手持弓箭的赫拉克勒斯。一只老鹰摇摇欲坠，显然已受到致命的一击，跌向画面的最底部（象征哀地斯的冥府）。普罗米修斯的右边站立着一位高贵的女性，应该就是塞弥丝。再右边是阿波罗，赫拉克勒斯在射杀大鹰之时曾向他祈祷。<sup>②</sup>在画面的最左方，代表和平的雅典娜头戴钢盔，手持盾矛，安静地站立，左手握着树叶编织的花环。毫无疑问，这幅画面一定与《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后半场的剧情有着某些联系。<sup>③</sup>在《奥瑞斯提亚》中，雅典娜最终帮助了“请愿者”。也正是这位“具有崇尚见好就收以及有意阻止冤冤相报局面扩大的睿智”<sup>④</sup>的雅典城邦的守护女神，最终将象征和平的花环授予了普罗米修斯。<sup>⑤</sup>

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①</sup> 由于三联剧中两联的佚失，大众的眼光一般只停留在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矛盾上。事实上，除了普宙之争，《普》剧还展现了宙斯与伊娥、赫拉与伊娥、赫拉克勒斯与诸神之间从对立冲突到和解的过程。每一对矛盾的双方都必然要经过一番争斗，以达成最终的和解。伊娥的苦恼部分来源于赫拉的嫉妒，她的子孙后代也因此而颇为受苦（赫拉克勒斯长期不被奥林波斯接纳）。然而最终，赫拉克勒斯被奥林波斯接纳，他与赫拉和解并与赫拉的女儿赫柏成婚。如果他们的婚姻代表了赫拉与伊娥的和解，其实也就象征了赫拉与宙斯的和解。赫拉对伊娥和赫拉克勒斯的敌意来源于爱情中的嫉妒心，而宙斯才是其中真正罪恶的根源。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狠心地追逐一个无辜的姑娘；在《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中，他又在追逐塞提斯。但在《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中，当他与赫拉联合祝福自己儿女的婚姻时，他们一起成为了神圣婚姻的捍卫者，这标志着人性的一大进步。详见：George Thomson. *Aeschylus and Athens*, p.337.

<sup>②</sup> 残存片段 13。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08.

<sup>③</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00.

<sup>④</sup> 陈中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5 页。

<sup>⑤</sup>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101.

## 第五章 国人的误读

普罗米修斯原型并非“十全十美”，埃斯库罗斯借助该神话人物表达的核心思想也并非彻底的抗争。然而，通观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表现，笔者发现，不仅是普罗米修斯的近代革命者形象，也包括普罗米修斯原型，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被更多地理解和阐释成为了绝对正面的“抗暴者”形象。在众多的中国评论者以及大众看来，普罗米修斯身上最为优秀、最为令人感动的特质，在于他不畏强权的“抗暴”精神。与之相应的是，不仅是国人对西方普罗米修斯诸多形象的分析，就连所有关于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再创造，都单一地表现为了普罗米修斯的近代形象。当然，在誓要抵抗外辱、推翻鞑靼的历史背景之下，反映你死我活、鱼死网破般剧烈对抗的战斗者形象，更能彰显中华儿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心声。只是，对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的绝对重视，或者说对普罗米修斯诸多形象囫圇吞枣、不求甚解式的粗糙认知，阻碍了人们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真正认识。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固化，显然已经阻碍、混淆了我们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尽管普罗米修斯原型不仅对中国人、甚至对西方人来说都确实更难把握）。普罗米修斯原型的真实概貌，几乎完全被遮挡在了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所形成的主流之中；或者说两种形象（甚至是西方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多种形象）混合成为了一种形象，而以普罗米修斯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的面目示人。普罗米修斯的原型和近代形象，这两个里程碑式的形象进入中国，因为其中一个形象的过分展现而失去了二者本应受到制约的平衡。人们说到普罗米修斯，并不区分是哪一个普罗米修斯，而只关注他所代表的革命者、反抗者和胜利者的崇高意义，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普罗米修斯原型遭到了实实在在的误读。就连一生数次提到普罗米修斯的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未曾注意到国人对普罗米修斯形象接受上的偏差。

当然，笔者并非因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误读，而意在否定以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为主流形象的普罗米修斯给中国革命进程带去的“理想革命者”的意义。在那样一个尝尽辛酸、饱含屈辱的特殊年代，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甚至是被掩盖在这一主流形象之下的普罗米修斯原型（以及其他诸多形象），深切契合了当时中国革命语境的需要，表达了国人对压迫势力的极端仇视以及对胜利的向往之情。只是，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人们受压的心灵只能关注那个“十全十美”的、绝对高尚的、作为彻底反抗者的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那么在经历过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之后，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回头、去审视一下那位进入中国也已将近百年的普罗米修斯原型？西方古典学者从未放弃对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执着研究，他们试图多方位解读“悲剧之父”的这部经典剧作，国内至今却鲜有相关做法，更无系统研究。东西地域虽相隔，学术精神却不应分高下。

尤其是作为研究人员,审慎的研究态度不可或缺。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单纯地表达反抗之彻底性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的依旧“兴盛”而不能得以纠正,也潜伏着在思想上容易走向“单一”与“极端”的危险。中世纪总体性的沉闷压抑,必然引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人性”的呼唤;正如“启蒙主义”一味强调“理性”,必然受到“现代主义”的拨正一般。在一个层面的过于极端化,只会塑造出另外一个新的“神话”。同样,如果普罗米修斯原型明明表达了与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截然相反的反“极端”与重“克制”,而我们却还一味纠结在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所表达的反抗的彻底性之上,是否也隐含着我们一直以来在思想理念上也存有“极端化”苗头的相似偏颇?尽管本文所重点纠正的,只是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误读情况;但从根本上说,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只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表达了人们关于外来形象理解上的囫囵吞枣与不求甚解。并且,超越于此种“纠正”之上的,是人们需要通过对此种偏颇的“纠正”,去审视、正视我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单一”与“极端”。

需要说明的是,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在中国的“光大”并不表明我们完全正确理解了雪莱、拜伦等人塑造的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的真实用意。异国形象在他国的接受,原本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鉴于本文的主旨,笔者在此对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在中国的具体研究情况不做深入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人至少是正确解读了这一形象的主旨意义。而与我们的接受大相径庭的却是,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原型,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位抗争到底的反抗者。通过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细致分析,结合普罗米修斯原型进入中国的概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被误读了,不仅其复杂、多面的形象“缩水”成为了“单一”的反抗者形象,更由于对其彻底反抗性的强调而忽略了剧作家最根本的创作本意,即“节制”精神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发现,普罗米修斯原型在当今提倡“和谐”的社会中,带有更多可资借鉴的优秀品质。一直蒙蔽真相的幕帘,是该被扯下的时候了!笔者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将从普罗米修斯进入中国至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段中,重点选取几篇对普罗米修斯原型产生“误读”的典型作品为例,细致分析其中的“误读”情况。

在关于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多篇评论文章中,笔者发现评论者多以“英雄”二字对等普罗米修斯。例如灵珠在《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一文和华林在《希腊悲剧的研究》一文中所做的那样。华林形容普罗米修斯的词语是“富于英雄精神的”<sup>①</sup>,而灵珠则直接将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主人公称作“英雄”。除开本文前面提出的普罗米修斯是否可被称为“英雄”一词值得商榷之外,“英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更多偏向的是价值上的绝对肯定与赞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英雄”一词有以下三层含义:才能勇武过人的人;具有英雄品质的人;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令人敬佩的人。

<sup>①</sup>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1926年《民铎》第7卷第3期,第8页。

三种解释无不洋溢着赞褒之意。而事实上，古希腊悲剧作家却是致力于通过和一般人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悲剧主人公的“犯错”，去表现具有“普遍性质”之事。这样的悲剧主人公显然不能如中国文化中“英雄”一词般获得价值评判上的满分。因此，从以灵珠、华林等为代表的用“英雄”一词取代“悲剧主人公”的做法中，我们便可大致看出他们对普罗米修斯形象（更是对所有古希腊悲剧人物形象）基本的价值评定取向。华林在《希腊悲剧的研究》一文中说：“他（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边的仙神和英雄，都是英雄时代的真正后裔。他们的主要品性，就是超人的能力和勇敢，不可稍变的意志和铁石一样的忍耐力。他们绝对没有人类的弱点。武力不能吓到他们，花言巧语也不能引诱他们。伯罗米修士就是个好例。他情愿受苦三千年，不肯顺从薛乌斯（宙斯）的意思；同他来议和的，他一概拒绝；后来毕竟把薛乌斯屈服了。”<sup>①</sup>华林的解析，典型地代表了国人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理解，普罗米修斯原型在此成为了“绝对没有人类的弱点”的“十全十美”的“英雄”形象。就像灵珠所歌颂的：

“Prometheus 为了爱人类而盗取天国的火，因此被缚，受尽千辛万苦……‘一切为了人类的福利，一切为了人类的痛苦。’泊洛米修士的壮烈的战歌，说尽了聪明的希腊人向光明，向民主的憧憬；这位先知自己的聪明象征着人类集体的智力，唯有他才能战胜命运，——野蛮与独裁。泊洛米修士的苦难是一切先知先觉者的苦难，他永远卓立在人类的记忆里一个光明，自由，艺术的象征！”<sup>②</sup>

## 第一节 误将 hubris 当革命激情

表达“反克制”的hubris，在表象上与“革命激情”存有极大的相似性。将普罗米修斯原型身上被剧作家着力批判的hubris，看作是绝对正面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激情”并为此种不可抑制之激情而欢欣鼓舞、热血沸腾，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及评论界对普罗米修斯原型最为普遍的误读。通过前文分析，我们了解到埃斯库罗斯极力证明的是已然犯错的普罗米修斯在与宙斯的抗暴过程中走向过度的hubris的“无效性”。Hubris与理性背道而驰，不仅不能推动、反而阻碍着存在于预言中的“必然”的发生。《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被铺陈、渲染的普罗米修斯的hubris，表面上表现为与对立面宙斯的殊死抗争，本质上却是作为一种“反面教材”。其目的恰恰在于否定当事者彻底抗争的有效性。“抗暴”固然令人心情振奋，但超越“理性”范畴之外的“抗暴”，却带上了可怕的“局限”。

<sup>①</sup>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1926年《民铎》第7卷第3期，第13页。

<sup>②</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7页。

## 一、杨晦的《普罗密修士》

1932年8月，由杨晦于1926年11月通过英译本转译的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书出版，题为《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在这本被喻为“我们生活的教科书”<sup>①</sup>的最后，附有杨晦创作于1926年12月的《普罗密修士》一文。杨晦的翻译以及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解读，为中国对古希腊悲剧的引进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然而尽管如此，杨晦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理解没有能够逃脱特殊年代人们对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局限。

杨晦在《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一书的“小引”中，讲到 he 翻译古希腊悲剧的目的：“我们这些人类的子孙对于这因为救我们而被幽囚者的故事‘至少’有知道一些梗概的必要。”<sup>②</sup>杨晦接下来这样概括该剧的故事梗概：“普罗密修士因为救人类触了大神宙斯的怒，被钉囚在高加索的山野了。但是他却知道一个秘密，这是关于宙斯的运命的，能以使他颠覆。而且他坚韧地忍受着一切的苦难和折磨，不肯宣布。”<sup>③</sup>从杨晦对《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翻译目的以及他对剧情的总体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基本理解。他着重表达了普罗米修斯“有山一样的沉默，坚强和傲岸”<sup>④</sup>，“骨子里是坚强的意志”<sup>⑤</sup>。杨晦还用波涛海潮与包围其四周的岸石之间的斗争来比喻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抗衡：“岸石是那样地冷酷，在包并着，屏藩着自由奔放的波涛。凭你怎样地气恼，怎样地倾注全力，它却一动不动地将你范围着。然而海潮又何其顽强，何其泼辣，冲锋陷阵般地一齐攻来！积千万年如一日，不稍疏懈，不稍衰竭。”<sup>⑥</sup>

《普罗密修士》一文，是杨晦借助普罗米修斯原型对自身所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与情感表达。“伟大的精神灭没了！高洁的心情死亡了”，世界“为黑暗所弥漫包并”。<sup>⑦</sup>在这恶劣的现状中，让人安慰的是幸而还有“山一样的沉默，坚强和傲岸”与“海一般的愤激，呼号和冲撞”<sup>⑧</sup>的普罗米修斯。他一扫沉默的奴性，对最高统治者发出毫不掩饰的抗辩与诅咒。他（普）宣泄着愤怒，倾吐着不平和怨恨，尽管“明知”这“足以招来更甚的凌虐和折磨”。<sup>⑨</sup>然而唯有如此，他才能获得“灵魂上的轻松”。<sup>⑩</sup>“外来的苦恼和迫害”，对作为“真正的强者和勇者”的普罗米修斯来说，只能使其“欢畅和陶醉”：“冒着风雪，爬上高山，迎风而立，跳跃狂呼，才觉得踌躇满志，手足的冰冻，浑身的雪泥，这十足供他事后回想时的微笑。”<sup>⑪</sup>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抗争激情，杨晦在此着重表达了“抗争”给当事人精神上带去的极度愉

<sup>①</sup> 冯至：《从癸亥年到癸亥年》，摘自《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代序”第5页。

<sup>②</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sup>③</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sup>④</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sup>⑤</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sup>⑥</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sup>⑦</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sup>⑧</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sup>⑨</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sup>⑩</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sup>⑪</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悦的感受。然而，杨晦对普罗米修斯藐视一切的傲岸情怀的赞赏，与埃斯库罗斯对普罗米修斯抗暴行为的评判有着本质的区别。埃斯库罗斯关注的是神族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的对立的双方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他渲染普罗米修斯之于宙斯的骄横抗暴，恰恰是将此作为“反面教材”以证明过度骄横的无效性。然而，对身处外来压迫与对内倒戈中的、以杨晦为代表的中华儿女来说，“抗暴”行为本身则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与焦点。他们很自然地从小米修斯对宙斯的抗暴中，关照到自我对抗的强烈诉求并为之而欢欣鼓舞。换言之，以杨晦为代表的评论者关注的是普罗米修斯的抗暴行为本身，将埃斯库罗斯剧中的“反面材料”当成了“正面”讴歌的对象，而忽略了此种有助于快感释放的抗暴行为对于普宙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反”作用。埃斯库罗斯笔下因为会产生恶劣后果而必须加以克制的 *hubris*，变成了杨晦笔下充满战斗气息的革命激情。站在时代的立场，杨晦赞扬反强权的抗争精神并没有错。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让人心生敬意。杨晦的“错误”，只在于他对埃斯库罗斯文本的解读上。他没有读懂埃斯库罗斯渲染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 的真正用意。

从杨晦对歌队部分台词的解读中，也同样清楚地表达了他未能读懂 *hubris* 的“反面性”。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歌队对普罗米修斯充满同情，但也因多次劝说后者不加遏制的 *hubris* 均未起到作用而深感无奈。歌队不满宙斯的专制统治，但并不表示她们绝对认可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剧作家正是这样微妙地传达了普宙矛盾双方的“错”与“错”的对抗（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与“对”的对抗）。而杨晦却将普罗米修斯置于完全正义的一端，对歌队之于普罗米修斯的规劝做出了这样的解读：“她们（歌队）于普罗米修士的言语放肆，在强者的高压下不肯屈服地抗辩，更为之忧伤，为之叹息——为之无可奈何！”<sup>①</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歌队“忧伤”、“叹息”和“无可奈何”的对象，是普罗米修斯“在强者的高压下不肯屈服地抗辩”：*hubris* 亦可由不合情理的违抗和不服从所致。<sup>②</sup>然而，从杨晦接下来的解读中，我们发现杨晦表达的歌队“忧伤”、“叹息”和“无可奈何”的对象并非是普罗米修斯“不肯屈服地抗辩”，而是作为“弱者”的普罗米修斯尽管在言语上可以放肆、可以“不肯屈服地抗辩”，却必须要忍受“强者”宙斯的制裁。这才是杨晦表达的“无奈”：“这是宇宙间普遍的‘无可奈何’的悲吟，借着海洋女儿们的口中歌出一种深柔的、忧郁的悲哀，蒙罩住她们的心情……这大概对于宇宙间的某种现象，以及隐约的感到不愉快的反感，然而为传统习惯等的硬壳重重地包裹住，于是这种反感只是微微地在里边跳荡，既不能冲破壳皮放浪地奔脱，也不易便而赶散了一片一片的雨后浮云……”<sup>③</sup>在杨晦的解读中，这种“强”必胜于“弱”的“宇宙间普遍的‘无可奈何’”不仅属于普罗米修斯，也属于歌队，更属于人类。他将普罗米修斯与人类做类比，二者都算不得什么，都属于宇宙间普遍的“无可奈何”的“弱”。因此，杨晦在此表达的歌队“忧伤”、“叹息”和“无可奈何”的对象是“为传统习惯等的硬壳重重地包裹住”的以“强”凌“弱”的悲凉现状。这与埃斯库罗斯的原意已是

<sup>①</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 页。

<sup>②</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9 页。

<sup>③</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 页。

差之千里。为埃氏所批判的普罗米修斯的“不肯屈服地抗辩”（即 *hubris*），在杨晦笔下成为了尽管让人“无可奈何”、然而却显然是正义的事情。

类似的误读还体现在杨晦关于普罗米修斯与赫尔墨斯之间言语大战的分析中。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尽管赫尔墨斯未能促成普罗米修斯的妥协，但其主观意愿是普宙的最终“和解”。埃斯库罗斯在此将普罗米修斯的*hubris*飙升至极点，反面表达了暴烈的*hubris*于事态解决只起相反作用的观点。而杨晦却依然将普罗米修斯的*hubris*习惯性地理解为正面的“傲然”。在他看来，普罗米修斯似乎唯有凭借“儿戏”和“玩弄”才足以表达一位抗暴者对宙斯的蔑视：“他要像火山口一般喷吐他的怨恨和愤怒。他儿戏着自己的灾难，他玩弄着宙斯的覆灭，他更看不起赫密芝（赫尔墨斯）的卑劣……于是他傲然。”<sup>①</sup>

杨晦的《普罗密修士》一文，是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普罗米修斯原型最为细致详实的解读文章，为国人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杨晦对普罗米修斯的阐释与评论，参与了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建构过程，为当时的革命中人带来了难能可贵的抗争勇气。然而，站在真正的文本角度，普罗米修斯原型在杨晦的文章中丢掉了剧作家的真实意图，与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一样几无差别地仅仅表达了（后来）人们最为熟悉的普罗米修斯的抗暴精神。

## 二、灵珠的《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

灵珠在《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一文中，将普罗米修斯原型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一条红线，评价古希腊“悲剧英雄”的主要特征是“不屈不挠”，并为此种“不屈不挠”之意志而鼓舞。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自文中选取的某些评论片断并非灵珠直接针对普罗米修斯而言，但由于该篇文章是以普罗米修斯原型为例对古希腊悲剧所作的一种整体性分析，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作者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整体性评判也应属于普罗米修斯。<sup>②</sup>

灵珠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将“悲剧”的发生定位在“新”与“旧”荣枯交替的时代。“悲剧英雄”代表了新兴的力量。他们虽遭磨难，但终将战胜旧势力：“在旧的黑暗势力还未到败亡的时候，光明的授予者定必受到无限的磨折，这是黑暗战胜光明的时代；可是黑暗不会永远胜利，世界要经过一个悠长的苦难的时间，直到终有一天，暴君必遭受倾覆，独裁者自己一手造成的罪恶，定必一步一步的推他自己到灭亡的路上。光明虽受一度的委屈终必

<sup>①</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 页。

<sup>②</sup> 《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一文以《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的多处台词为例、并多次引用该剧片段，表达了灵珠对古希腊悲剧的认识。其中每一部分都以引用普罗米修斯题材为开始，所引用的台词有：“凡在力与正义结合的地方，这两者的同盟可以战胜一切。”“我受苦？是为了人类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泊洛米：一切人间的技艺皆是由泊洛米修士得来的。/歌咏队：可惜现在他并没有机会为人间服务了。他忘掉了自己在不幸之中。我也怀抱一个热望。但愿他有一天摆脱了枷锁，再得自由，那时候他比宙斯更强，更好。/泊洛米：但是，命运，那是最高的权威，并不这样做，还有千层磨折，命定了我要遭受，这之后，我才能够摆脱枷锁，获得自由，到底‘技艺’不会弱于‘必然’的力量啊！/歌咏队：请你说，支配着‘必然’的究竟是谁？/泊洛米：复仇女神，和命运女神三姊妹。/歌咏队：那么，照你说，难道宙斯也受她们支配？/泊洛米：是天命的，即使‘他’也不能够逃避。”



战胜黑暗。”<sup>①</sup>“悲剧英雄”的“意义”也正体现在这“新”必胜于“旧”的“理想”之中：“悲剧的英雄往往遭受目前的失败，但事业的成败不以英雄的生死而定论，而在于他的理想是否终归实现；而悲剧的伟大的教训，是透过英雄的身死，暗示出他的理想的成功。‘理想’体现在英雄的身上。”<sup>②</sup>代表“理想”的“悲剧英雄”令人敬仰：“悲剧的英雄往往受到无限的苦难，磨折，创伤，甚至于灭亡。但他们的可歌可泣的遭遇，便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哀感。”观众面对此种“受苦”的“英雄”，会油然而生“悲壮的哀感”，并产生一种“扬举”的精神状态：因为伟大的悲剧“把积极性的斗争表现到白热化的程度”，“着重伟大的斗争和透过斗争所显现的巨大的力量”。灵珠在此着重强调了位于正义（新势力）一方的“悲剧英雄”在苦难中还能坚持理想，并决心通过“积极性的斗争”以实现理想的可贵。这正是“悲剧英雄”所表达的中心意义之所在：悲剧英雄的人格，往往是某些理想或信念体现在坚强的“性格”上面。

接下来的论述中，灵珠直接以普罗米修斯为例：“在这新旧交替的当中，作为光明的授予者的泊洛米修士就有着一个不容旁替的责任——把自己的苦难来换取人类前途的幸福，通过斗争以达到更好的日子。”<sup>③</sup>他还列举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这两个古希腊悲剧中的典型形象，以表达“斗争”在“新”战胜“旧”的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命运往往把英雄用作表现它的威力的工具，以万钧的力量压向英雄的身上，阻挡他的去路，甚或把它摧毁。但我们的英雄，并不因此而退缩。他明知命运之不可抵抗，但为了一念所驱，他起来反抗，明知其不可为而为，挣扎奋励，直至把自己引向死亡的路上，譬如 Prometheus 为了爱人类而盗取天国的火，因此被缚，受尽千辛万苦。”<sup>④</sup>灵珠在此表达了与上文同样的思想，即“悲剧英雄”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命运”尽管严峻，“悲剧英雄”在“主观”上却拥有誓要冲破这严峻“命运”的勇气和斗志：“为未来的世代拓荒的人们，便不免受到目前的苦难，但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引导着我们的英雄跨过阻力踏向最后的胜利”，“他留给我们的，不是悲观的沉哀，而是乐观的扬举！”<sup>⑤</sup>

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命运”为“先知”普罗米修斯所预见，正是他敢于违逆宙斯并与之骄横抗争的重要原因。从某种角度上讲，普罗米修斯之所以敢于表达与放任 hubris，之所以敢于如灵珠所说般“受尽千辛万苦”也“不退缩”，也要“挣扎奋力”，是因为他拥有对“命运”的预见以及作为神明的“不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知其可为而为之”的主观思想的表现。也正是此种“知其可为而为之”的心态，让普罗米修斯对于宙斯的抗争带上了具有“挑衅”意味的 hubris，而这与“不退缩”、“挣扎奋力”的真正的革命激情显然截然不同。灵珠所说的在黑暗时代仅凭“一念之驱，即爱人类的信念，而挣扎奋励”的“正面”革命激情，以及为了理想明天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正面”抗争意志，的确难

<sup>①</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6页。

<sup>②</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9页。

<sup>③</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6页。

<sup>④</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4页。

<sup>⑤</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7页。

能可贵。只是，这种难能可贵的革命激情与抗争意志，属于为了革命理想而视死如归的先烈战士，却并不属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

和杨晦一样，灵珠也将普罗米修“负面”的骄横，错误地理解成为了“正面”的革命斗志。造成此种误读的原因在于二者都先入为主地将普罗米修斯原型与宙斯的根本立场相对立。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自设一个解读的基点，即宙斯代表反叛的“旧”势力，而普罗米修斯则是从反叛的“旧”势力中成长起来的“新”势力。李健吾也说：普罗米修斯是“被压迫阶级的荣誉的形象”，是“人类最英勇的战士”。<sup>①</sup>诚如前文分析，普罗米修斯并非是神族集团的真正反叛者。他从未想过要真正推翻宙斯，更从未想过要脱离神界。此外，他之所以帮助人类也不排除借此报复宙斯的动机。然而，国内太多的评论者却从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将普罗米修斯看做是弱小势力（人族）的代言人，并将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利益与立场根本对立成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普宙之争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与旧的对立阶级之间势必争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顺延此种逻辑，普罗米修斯的确需要抗争到底。因此，在将普罗米修斯“负面”的骄横恣蛮理解成为“正面”的革命激情的背后，是人们对普罗米修斯根本立场的误读。

### 三、其他文本

除开灵珠和杨晦，将普罗米修斯原型身上负面的 *hubris* 理解成为正面的革命激情的评论者还大有人在。在郑振铎笔下，普罗米修斯坚持 *hubris* 而不愿找寻事情的根本解决方案的倔强，被巧妙地转换成为了“骄傲的沉默”<sup>②</sup>。修饰语“骄傲”一词所传达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一切之上，弹奏出永远的反抗的调子的，乃是预知者柏洛米修士的故事……那伟大的为人类而牺牲的柏洛米修士，便是一切殉道者的象征。”<sup>③</sup>郑振铎等人生活的年代，正是亟需普罗米修斯式“弹奏出永远的反抗的调子”的年代：“在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空气，若烟雾腾腾，黑地昏天似的弥漫于一切之时，能不有感于这！”<sup>④</sup>

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译者之一李健吾认为埃斯库罗斯作品中“最崇高的品德”、甚至是“人类最高的品德”是“英雄主义”，而这种“英雄主义”正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体现。普罗米修斯是“斗争到底”的楷模，他相信“幸福是靠斗争得来的”、“意志坚强是战胜敌人的不二法门”。<sup>⑤</sup>普罗米修斯的“不认输”以及“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成了人类的榜样。<sup>⑥</sup>有类似表达的还有洪深的《希腊的悲剧》一文，其中提到普罗米修斯的“不肯屈服”。

<sup>①</sup> [古希腊]艾斯吉勒斯著：《浦罗米修斯被绑》，李健吾译，平民出版社 1951 年 10 月版，“后记”，第 85、86 页。

<sup>②</sup> 郑振铎：《文学大纲（七）》，1924 年《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7 期，《文学大纲（七）》第 6 页。

<sup>③</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IV 页。

<sup>④</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IV 页。

<sup>⑤</sup> [古希腊]艾斯吉勒斯著：《浦罗米修斯被绑》，李健吾译，平民出版社 1951 年 10 月版，“后记”，第 86 页。

<sup>⑥</sup> [古希腊]艾斯吉勒斯著：《浦罗米修斯被绑》，李健吾译，平民出版社 1951 年 10 月版，“后记”，第 85 页。

“Hubris 以它的貌视强大证实了人的弱小，以它在勃发时的不可一世证明了人的智能与体力的局限。”<sup>①</sup>埃斯库罗斯借用 hubris，正是借用它的“负面性”以此警醒人们注意其危害。然而，悲剧作家力图表现的此种具有“负面效应”的 hubris，却被国内评论者误读成为了与“坚强”、“坚韧”、“不屈不挠”等具有“正面效应”的一系列词汇相一致的美德。<sup>②</sup>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意在否定“坚强意志”等美德的重要价值，而是旨在纠正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所遭受的误读。撇开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解读，我们不能否定以上引用文章在当时特殊时期给受压迫的中华儿女带去的激励与鼓舞。作为彻底抗争者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人们面对恶劣处境的精神气概。然而，正如古希腊箴言所说：“凡事勿过度。”激情的宣泄也应有“度”的限制，不能以对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扰乱为代价，尤其是在进入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之后。埃斯库罗斯在《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中表达的核心智慧，即“节制”的思想，更是一直为国人所忽略。

## 第二节 忽略“普宙和解”之深义

《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中最为核心的“普宙和解”情节，由于剧本的佚失以及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的兴盛，少为国人所知。正如上节所述，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同样单一地表现为充满斗争激情的革命者形象。然而，资料显示，普罗米修斯最终的妥协以及与宙斯最终的和解，并非无人所知，而是令人遗憾地被长期忽略掉了。

郑振铎在 1924 年首次介绍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时，便提到了“普宙和解”的情节：“已散逸的第三篇《柏洛美沙士的释囚》中，则叙柏洛美沙士与修士复相和好而得了释放的事。”<sup>③</sup>尽管郑振铎对普罗米修斯原型赞赏有加——“我们读之（《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却是怎样的感动！”<sup>④</sup>——然而他却进一步表示：“英诗人雪莱的‘Prometheus Unbound’却更敲谈一个别调：表示出永不屈服的人的精神来。”<sup>⑤</sup>1934 年，在郑振铎改编自普罗米修斯神话题材创作的《取火者的逮捕》一书“序”中，郑振铎再次提到“普宙和解”：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其第三部曲‘Prometheus Unbound’也已佚；但据古典学者们

<sup>①</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1 页。

<sup>②</sup> 也有一些不甚明显的“例外”。在发表于《青年月刊》（1937 年第 4 卷第 6 期）上的《希腊戏剧及其作者》（胡韵华）一文中，作者亚斯切勒（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都是关于宗教或神传的东西：“自然他采取这个方法的宗旨是劝导一切有罪恶或骄傲的人们改过，因为神是不可侵犯的，犯了罪就是间接地侵犯了神的权威，神发了怒就要惩罚失规的人们。”（第 38 页）尽管作者的此种解读有点偏激，陷入了赫西俄德式的思想，也并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原型为例（而是以《阿伽门农》为例一笔带过），但是他对悲剧的此种解释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解释多少有些接近，在当时的特殊年代中也算难能可贵。

<sup>③</sup> 郑振铎：《文学大纲（七）》，1924 年《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7 期，《文学大纲（七）》第 7 页。

<sup>④</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IV 页。

<sup>⑤</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IV 页。

的推测，剧中所叙的宙士和柏洛米修士的复归和好，大约是由于希拉克理士（赫拉克勒斯）的出场，于是柏洛米修士被释放了，而他也便说出其久守的秘密，阻止宙士和海中女神底美丝（塞提斯）的恋爱，因此维持了宙士的统治的运命。”<sup>①</sup>郑振铎因此得出结论：“所以，就这三部曲的全剧看来，其情节还不是反叛的；人和神是终于得到一条和解之路。”<sup>②</sup>他因此而更加青睐雪莱所写的“以为反叛者的柏洛米修士和暴主宙斯之间是没有重归和好之可能”的‘*Prometheus Unbound*’。与雪莱所表达的主题相一致，《取火者的逮捕》一书不止一次地重现了神（宙斯）的灭亡的必然的结局。<sup>③</sup>显然，埃斯库罗斯所深刻寄寓的“普宙和解”，尽管为郑振铎所知，却并未引起其注意。他略带贬义地评论《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情节“不是反叛的”，并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止步于此。

郭沫若在《雪莱年谱》中对“普宙和解”也是一笔带过。他说雪莱为埃斯库罗斯的 *Prometheus Bound* “翻案”，原因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似与至上神宙斯妥协为主旨。“翻案”一词颇有意味，传达了郭老对“妥协”这一情节安排的价值评定。与郑振铎一样，郭沫若知道普罗米修斯的最终妥协，也并未对此深入研究。从二者对“妥协”和“不是反叛的”的评价来看，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到剧作家的本意。华林讲到在《伯罗米修士的被缚》中“已暗示伯罗米修士将来终有被释放的一日了”，并且对薛乌斯在这部剧中表现出与伊士奇（埃斯库罗斯）其他悲剧作品显然相异的“凶恶残忍无法无天的暴君”特质感到“不易解释”，但他也终究未能超越郑振铎、郭沫若等人的理解，仅得出以下较为粗浅的结论：“大概伊士奇因为伯罗米修士的故事，存心谋人类的幸福，不顾自己的死活，不怕威权恫吓，甘心受罚，始终不悔，是极好的悲剧材料，所以倾全力去描写富于英雄精神的伯罗米修士，把薛乌斯写得凶恶残忍，使伯罗米修士的人格，更为显明，也顾不得他自己前后的矛盾了。”<sup>④</sup>并且，同灵珠等人一样，华林也先入为主地将普罗米修斯界定为“英雄”，并认为描写此般“十全十美”的英雄题材是绝佳的悲剧题材，并因此武断地将普宙双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而忽略了普罗米修斯“被释放”这一情节所包含的深义。“伊士奇以为戏剧作家的责任，在以动人的手腕，表现神圣的故事，使观众看了英雄世界的情形，自然而然的就把心志提高起来。这是他对于悲剧性质的观念，他的表现人物的目的，在使观众看到有理想的能力和庄严的虚构人物。”<sup>⑤</sup>由此看来，华林所认为的观众的“心志”得以提高的途径是看到“英雄”的世界，而非剧作家原本着意的“心志”：“节制”。

罗念生先生是为中国与古希腊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桥梁的大师。他深谙古希腊人的中庸之道：“希腊人善于把个人与政府、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调和起来，善于把两个极端连接起来。他们的文学里从没有叛逆运动，正因为他们的理智与情感是融洽的，形式与内容

<sup>①</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VII 页。

<sup>②</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VII 页。

<sup>③</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序”第 IX 页。

<sup>④</sup>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1926 年《民铎》第 7 卷第 3 期，第 8 页。

<sup>⑤</sup>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1926 年《民铎》第 7 卷第 3 期，第 13 页。

是和谐的。”<sup>①</sup>然而，遗憾的是，罗老似乎并不知道普宙和解的情节。周健强在《罗老念生之最后辰光》一文中写到：“他（罗念生）在讲课授业的同时，也讲古希腊英雄抗暴的故事，激励青年学子抗日救国的热情。他自己也以过人的热情和精力，积极参与各类爱国救亡的活动，与卞之琳、朱光潜、何其芳等许多爱国进步文人一起创编《工作》、《笔陈》、《半月文艺》等抗日救亡刊物，以笔带枪向反动势力开火。”周健强描述的“古希腊英雄抗暴的故事”，应该（或至少应该）包括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罗老在好友朱湘早年的英文诗“*To Aeschylus*”<sup>②</sup>一文的注释中写到：“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巨神，曾经盗取天上的火种送给人类，为此被大神宙斯缚在高加索山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是写这位恩神在高加索受难的故事。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坚决反抗宙斯的压迫。”<sup>③</sup>该注释作于1982年，是在罗念生翻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947年）一剧的三十五年后。还可佐证的是，萧赛在《“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记古希腊戏剧翻译家罗念生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正逢希腊国家剧院到北京首次访问演出”之时，他有幸“与罗老座位联号”观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情形。萧赛自称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好看”，罗老告诉他说：“你看看希腊悲剧雄伟的气魄嘛”，“你仔细看看合唱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希腊的雕塑呀”。罗念生对该剧的评价固然无错，但是，作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译者，他表达的并非是隐藏在该剧中最为精到的思想。一经罗老的点拨，萧赛描述了自己的感受：“果然那被缚着的普罗米修斯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很有点感动我，难怪马克思要称赞这部戏：‘希腊的众神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剧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死去！’”<sup>④</sup>

着力赞扬普罗米修斯抗争精神的灵珠，自然也忽略了“普宙和解”的情节。灵珠将“悲剧英雄”不屈不挠的斗争，看做是达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正是此种“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使“新生代向旧制度所提出的要求”不是“‘幻想的梦’，而是实行者不断的追求，是‘力与正义的结合’，理想与实践的溶合。”<sup>⑤</sup>斗争确实是通往理想的方式途径，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有错的是，对于普罗米修斯来说，他与宙斯之间长期的斗争反而阻碍了通往“必然”之路。普罗米修斯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预见的“有限性”。普罗米修斯正是因此而未能找到一条贴近事实的理性解决方案。他的“理想”是“和解”，却因 hubris 的长期作祟而在“实践”上走向了更为暴烈的“对抗”，通过三万年

<sup>①</sup> 罗念生：《从芙蓉城到希腊》（《罗念生全集》第九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sup>②</sup> 朱湘在这首诗中写到：“有如闪电的飞矢穿过阴云，/射向下方的大海，汹涌的波涛，/你清明的思想照彻阿里代的命运，/像湖边绵延不断的长堤一道；/你描述这骇人的题材的庄严诗歌，/是这样无限无垠地深沉，无比地凝重，/像普罗米修斯被缚在荒凉的高加索，/倾吐出他那可怕的白日噩梦……”参看罗念生：《从芙蓉城到希腊》（《罗念生全集》第九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sup>③</sup> 罗念生：《从芙蓉城到希腊》（《罗念生全集》第九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sup>④</sup> 罗念生：《书信、自撰档案摘录及附录》（《罗念生全集》第十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sup>⑤</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第44页。

之久的痛苦煎熬才最终达成了灵珠所言的“理想与实践的溶合”。对于普罗米修斯来说，不是“斗争”、而是“妥协”才是理想与现实溶合的方式。

埃斯库罗斯剧作的感人之处当然在于我们所十分熟悉的“抗暴”。但是，它的最精妙之处，它的受到当代思想家关注的“亮点”，却是我们以往习惯于从负面角度出发予以定性的“局限”。<sup>①</sup>诚如前文论证，普罗米修斯其实是一位彻底的妥协派，这不仅表现在三联剧残篇中描述的普宙的最终和解上，也隐含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诸多台词中。剧作家所表现的正是从妥协的“意愿”走向妥协的“实际行动”的艰难过程。而在杨晦（以及众多国内评论者）看来，“并不屈服的忍受”<sup>②</sup>才是重点。杨晦描述对于专暴的宙斯的屈服，“是痛苦中的无上痛苦，耻辱中的无上耻辱”：“他（普）的幽囚，他当前的灾难，固然是痛苦是耻辱；然而屈服，对于专暴的宙斯的屈服，这在海洋在赫密芝就是在海洋女儿们的眼中，虽然看作当然，而在普罗密修士却认为是痛苦中的无上痛苦，耻辱中的无上耻辱——因为这是灵魂问题。”<sup>③</sup>

节制骄横，走向和谐，这种在埃斯库罗斯笔下需要历经长久的磨难才能深谙的“智慧”，在杨晦的解读中成为了关乎“灵魂问题”的“耻辱”与“痛苦”。而要摆脱此种“耻辱”与“痛苦”的途径，则是要继续坚持 hubris（当然，在杨晦笔下，“负面”的 hubris 顺理成章地变身为了“正面”的“无所畏避”与“昂起头来”）：“真正的智慧教你容忍而且担当，教你以沉默的反抗！给你以勇气，给你以大胆——大胆地走上运命的大路，勇敢地肩起那为你备办的磨难和灾祸，这是普罗密修士的真正精神，这是普罗密修士的真正甘苦！”<sup>④</sup>普罗米修斯成为了“铁打的硬汉”，他“百炼纯钢，不怕折磨”，“不怕威吓，不受诱惑”，<sup>⑤</sup>其“功德成就在你的牺牲！圆满在你的坚忍！”<sup>⑥</sup>一个凛然正气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杨晦的文本中跃然纸上。如此的解读固然让人热血沸腾，却忽略了剧作家创作的真正意图。与杨晦的理解恰恰相反，埃斯库罗斯所表达的“灵魂问题”不是“抗暴”（尽管“抗暴”的确让人振奋），而是“妥协”。普罗米修斯所真正坚持的，不是不要妥协，而只是自己不能先行妥协。埃氏正是在表达普罗米修斯坚持不要先行妥协的过程中，衬托出了普罗米修斯走向“无节制”的过分抗争的无效性。杨晦与埃斯库罗斯对于普罗米修斯在“妥协”问题上的表述，其基点与立场几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相比误将负面的 hubris 当做正面的革命激情这一点，国内关于“普宙和解”这一情节的评论资料明显单薄许多。人们习惯于将普罗米修斯看做是“十全十美”，习惯于把他置于绝对正面的立场；而对于与我们习惯认知相反的、会被理解成为“负面”的“普宙和解”情节，人们要么武断否定、要么避而不谈。<sup>⑦</sup>与敌对方的妥协与和

<sup>①</sup>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9 页。

<sup>②</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 页。

<sup>③</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 页。

<sup>④</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28 页。

<sup>⑤</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 页。

<sup>⑥</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 页。

<sup>⑦</sup> 从矛盾的表述中，他似乎并不知道和解一事。

解，在深受压迫、需要奋起抗争的年代，其罪状的深重可想而知！那个年代人们关注的，只可能停留在普罗米修斯原型身上作为“负面”表象的彻底抗争精神之上。杨晦（以及众多解读普罗米修斯原型的中国评论者）误读的关键在于：他将埃斯库罗斯借以表现其“主旨”（从“节制”到“妥协”）的“负面”的“表象”（即 *hubris*），误读成了剧作家全力表达的“正面”的“主旨”（抗争）；而误认为剧作家力图表达的真正“主旨”（从“节制”到“妥协”）值得批判。换言之，人们完全相反地理解了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我们将剧作家“认可”的核心价值加以“批判”，而将剧作家着力“批判”的加以“赞扬”。

### 第三节 其他误读

#### 一、简单解读普罗米修斯在宙斯与克罗诺斯之间王权争夺战中的立场

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原来帮助以克罗诺斯为首的提坦一族，遭到拒绝才接受母亲塞弥丝的忠告，转而帮助宙斯（第 201-224 行）。这中间尽管不可排除普罗米修斯对塞弥丝提供的“智慧”（“工于心计的规划”，第 215 行）的从善如流，但同样也隐含了普罗米修斯并不十分坚定的“政治立场”。类似问题在普罗米修斯与人类的关系中也有表现。本文第三章指出，普罗米修斯曾大力襄助过的宙斯，正是后来他所帮助的凡人的潜在的“敌人”（正是宙斯上台后意欲毁灭人类）。而杨晦仅简单地以普罗米修斯“燃起他智慧的灵光”、“承受运命的指挥”<sup>①</sup>去解读普罗米修斯对宙斯夺取王权过程中的帮助，忽略了普罗米修斯在立场问题上的根本复杂性。这也正是人们将普罗米修斯简单划归为弱小阶级代言人，并将其看做是“十全十美”典型的表现。

#### 二、简单解读普罗米修斯被绑高加索之原因

在讲到伊娥（哀阿）受苦时，杨晦用普罗米修斯与伊娥做对比，“普罗密修士犹可说也，他虽然只因是为救了人类，纵还算有了救人类的‘因为’，哀阿却为的什么，要她这样”<sup>②</sup>。“救人类的‘因为’”，正是本文第三章第一节中所讲述的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与僭越规则、侵犯神界利益的关系。也正基于此，埃斯库罗斯为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打击报复奠定了一个最为根本的基础，即普罗米修斯犯错在先。杨晦可贵地看到了普罗米修斯的受罚有他“救人类的‘因为’”，但遗憾的是，杨晦的此种“看到”只是一种表象。在他提及关于普罗米修斯

<sup>①</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 页。

<sup>②</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 页。

的被罚时他讲到的只是：在普罗米修斯帮助宙斯统治了老克罗诺斯的王朝之后，宙斯“只为疑忌的沾染，使普罗米修斯竟接受了这样过甚的凄苦的报酬”。<sup>①</sup>普罗米修斯在杨晦笔下又完全成为了一个无辜受害者。

### 三、误读普罗米修斯给予人类的“盲目的希望”

对于凡人来讲，“不死”只是一种“盲目的希望”，改变不了人“短命”的本质。抱着“不死”希望的凡人因认识不到自己“会死”的本质，而不能做到“认识你自己”。<sup>②</sup>以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普罗文学为例，其描写的革命是一场虚拟的革命，其本质是以政治先锋为表征的个人主义激情，是革命知识分子个人化的革命文学想象，急需受到理性的规训。<sup>③</sup>“希望”固然能够引领革命志士奋进，但“盲目的希望”却只会带来不恰当的“激情”，致使事态发展走向与原本初衷不相符合的轨道。而杨晦却赞扬：正是普罗米修斯给予人类的“盲目的希望”为人类“解除了死的期待”，才使人类不致沦落。<sup>④</sup>他的此种解读，明显忽略了“盲目”二字背后隐藏的可怕危机。正如陈婧凌所说：“大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就可以想见，这几个字（‘盲目的希望’）对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们，那会是触目惊心！这竟概括了他们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在他们有关启蒙的经验里，对此实在有着切身的痛感。”<sup>⑤</sup>对“盲目”二字的忽略，来源于人们习惯于从绝对正面的角度去解读普罗米修斯与人类的关系，来源于将普罗米修斯的盗取天火致送凡人理解成为一种绝对的“爱人类”的表现，更来源于那个年代的革命志士多多少少都难以摆脱的思想上的“极端”与“盲目”！

### 四、误解歌队在悲剧中的作用

灵珠认为“往往是悲剧中英雄的话更能代表作者的思想”。<sup>⑥</sup>在谈到歌队关于普罗米修斯 hubris 的劝诫之言时，灵珠认为歌队有时“是怯懦的，守旧的，顺从命运的，譬如那群海女就劝 Prometheus 向宙斯屈首，说这是由于他们还未觉悟到独裁者的专横。一旦受了那些先知先觉的英雄的人格所感化，便翻然觉悟，由同情而爱戴，由爱戴而积极拥护。”<sup>⑦</sup>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歌队由俄开阿诺斯的女儿们组成。他们一方面同情普罗米修斯，但另一方面却不时用言语表达了对普罗米修斯某些行为的不满与劝诫（参看《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第 180-185 行，第 262 行，第 472-475 行，第 507-510 行，第 535-536 行，第 1036-1039

<sup>①</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 页。

<sup>②</sup> 参看：本文第三章第一节。

<sup>③</sup> 刘东玲：《革命话语：政治先锋下的个人主义激情——20 世纪 20 年代末普罗文学现象及其命运》，《学术月刊》，2010 年 6 月第 42 卷 6 月号，第 109 页。

<sup>④</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 页。

<sup>⑤</sup> 陈婧凌：《普罗米修斯的历险——一个古希腊形象的中国流传与挖掘》，《文艺争鸣·史论》，2007 年第 7 期，第 92 页。

<sup>⑥</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1947 年《大学月刊》第 6 卷第 5 期，第 46 页。

<sup>⑦</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1947 年《大学月刊》第 6 卷第 5 期，第 48 页。



行)。并且,结合本文第三、四两章的分析,歌队对普罗米修斯的规劝之语,多次传达出了剧作家的真实心声,表达了剧作家对 hubris 的批判与对“节制”思想的追寻。尽管灵珠认为歌队所代表的阶层潜伏着伟大的革命力量,英雄的努力的成败与他们是否拥护也有关系,但他还是明显地贬低了歌队的作用:“歌咏队——人民——往往代表一种半觉悟的,没有鲜明的政治目的的被统治阶层。”<sup>①</sup>事实上,歌队(choros)是悲剧的原始成分;在早期的作品里合唱占相当大的比重。歌队可以局中人的身份介入剧情的发展,亦可代表观众对人物或事态进行评论,有时还可以城邦利益阐述者的身份出现。<sup>②</sup>

## 小 结

纵观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种种误读,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基点在于国内评论者先入为主地将“英雄”,确切说是“完美英雄”的概念,强加在了普罗米修斯身上,并将这样的“完美英雄”看做革命者的代言人。按照此种观念,人们单纯、单一地理解与“修正”普罗米修斯原型,使其契合人们心目中对“理想革命者”形象的定位与向往。需要加以区别的是,这样的悲剧主人公已经完全不能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定义。亚里士多德以古希腊悲剧为例,强调悲剧主人公之“不幸”源于自身“犯了某种错误”。这与灵珠等人强调的“悲剧英雄”在“客观”的新旧时代之交的“受苦”,以及在“受苦”中表现出“坚强的性格”,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主人公“犯了某种错误”,只能被当做某种“反面教材”以说明“超越”于此种“反面教材”(现象)之上的“正面观点”(本质)。而以杨晦、灵珠等人为代表的评论者所展现的“悲剧英雄”,在“主观上”排除了各种人性上的“负面因素”,自始至终均以正面积极的形象示人。然而,普罗米修斯被绑高加索,是因为他僭越了权限,损害了诸神的利益,犯了 hubris 的大错;他被绑高加索而不得释放,是因为他继续 hubris 而难以罢息。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受苦”,并非仅仅来源于“客观”矛盾(当然,宙斯的暴虐也是其受苦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其受苦的主要原因,起因于埃斯库罗斯予以“负面”评价的当事人“主观”上的 hubris。Hubris 才是“受苦”的“真正缘由”。因此,国内评论者的误读,在于将剧作家作为“批判对象”的“悲剧英雄”的 hubris,相反地理解成为了貌似 hubris 的“正面”的“坚强”、“不屈不挠”以及“表现到白热化程度的积极斗争”等,从而理所当然地赋予其道德层面上的绝对积极意义。按照这种逻辑,作为“完美英雄”的普罗米修斯自然不可能与其“恶劣”的对立面宙斯和解。剧作家深刻寄寓的“普宙和解”情节,只能被人们批判或“视而不见”。

<sup>①</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1947年《大学月刊》第6卷第5期,第49页。

<sup>②</sup> 《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收入[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极其复杂。<sup>①</sup>他助佑弱小的人族，却又不可排除借此与宙斯抗衡的动机；他不惧“圣”颜，却走向了偏离事实解决轨道的骄横；他预知未来，却又因预见的有限而时感恐惧；他看似在与宙斯殊死抵抗，实则却一直期待与后者的和解……这般复杂的普罗米修斯原型，在进入中国后却变成了彻底的抗争者形象，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单面人”。关于普罗米修斯，字字充盈着革命者的激情诉求。自然，在20世纪初叶这样一个缺乏“伟大的精神界战士”的年代，我们不可否定普罗米修斯形象起到过巨大的正面作用。<sup>②</sup>然而，正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激进革命的反思所得，一味的“革命”隐含着走向偏激的危险，尽管完全否定革命更加可怕。当普罗米修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发挥正面效益的同时，我们发现，与这种接受上的彻底性、绝对性、完美性和单一性相关联的，不仅有革命过程之中革命中人所犯下的某种偏激，还包括革命成功之后此种偏激性的可怕延续。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讲的“单向度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是“肯定性思维方式”胜利的表现和产物。<sup>③</sup>而此种“肯定”只是对自身所认可的“唯一价值”的肯定，它代表了对其他一切异己思想的排斥与抛弃。普罗米修斯复杂原型在中国的绝对正面的解读，压倒了隐含在该形象中的一切“否定性”意义。这里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只有赞扬，没有批判。关于普罗米修斯形象的诸多介绍、评论以及再创造，实则都只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未曾超越。中华儿女于“立意在反抗”的主旨下，失掉了接受与该主旨存有任何抵牾思想的兴趣。人们关注的只有“反抗”、“革命”，而对“反抗”与“革命”失去了否定、批判与超越的能力。普罗米修斯原型的中国式理解，“缩水”成为了一个

<sup>①</sup> 从柳无忌对欧里庇得斯悲剧作品的分析与评论中，反衬出他对埃斯库罗斯及其作品的不了解。柳无忌在《希腊悲剧中的人生观》一文的第六部分，即“和平与战争”的章节中，以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为例，谈论借助理性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与埃斯库罗斯在多部悲剧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有极为相通之处，但让人遗憾的是，柳无忌在此处并未提到埃斯库罗斯。他首先指出古希腊三位悲剧作家都是爱“国”（雅典城邦）主义者。在谈到埃斯库罗斯时，他指出埃氏在《阿伽门农》一剧中严厉地痛斥挑起战争的海伦，说她是“罪恶的新妇，城市的毁灭者，人类的杀害者”；而欧里庇得斯认为“民族间或城市间的争执，可以谈判或议会的方式解决，不必乞助于屠杀生灵的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个最不合理的方法，他一再说着：愚笨的国家，他们可把谈判结束/仇隙，却在流血的战场上决一雌雄……倘使流血能仲裁和平，人类的争执将永不能获得解决”。因此“海伦所引起的间隙，满可以在一个会议中用温和的言语得到弥补”。柳无忌表达了欧里庇得斯对“投票表决”方式的赞赏，并称赞后者是古代文学中“第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还谈到了“侵略战”与“反侵略战”之间的差别，表示避免战争是最聪明的做法，但保家卫国的战争决不能退缩。柳无忌在此表达了反抗是必要的，但无谓的牺牲却应该避免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埃斯库罗斯早就有对相关问题的表达与看法。无论是《奥瑞斯提亚》，还是《普罗米西亚》，最终都表达了和谈、协商在事态解决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使是《祈祷女》、《波斯人》、《七勇攻忒拜》，也都从反面证明了一味骄横，不重视事态实际解决的恶果。因此，如果我们要说西方古代文学史上留名的“第一个和平主义者”，那便应该是埃斯库罗斯。从柳无忌对埃斯库罗斯的忽略中，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误读大致可管窥一斑。参看柳无忌：《希腊悲剧中的人生观》，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第112-116页。

<sup>②</sup> 在年轻的鲁迅看来，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写成）的中国缺乏的正是“精神界战士”。参看[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sup>③</sup>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译者的话”第2、4页。

绝对正义的“单面”的“神话”。在单纯的革命语境中，在受压受辱的年代中，“抗暴”无疑是最崇高的行为。然而，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形成的“神话”，也表达了上个世纪极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与评判尺度。对作为“单面人”的“反抗者”普罗米修斯的接受，看似人们战斗精神的体现，实则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是，人们在一种意气风发的战斗豪情中，丢失了对“真理”警醒的觉悟。“反右”、“文革”、“红卫兵”，种种让人痛心的历史事件表明，人们几乎快要完全丧失抽身当前去思考另一种局面的能力。看似的热血沸腾因失掉了思想的根基而转化成为了一种肤浅的鲁莽。“普罗米修斯神话”在中国变成了彻底的战士，这里不允许有任何对立面的本质存在，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派别的声音（即使存在，多数也只是“恶”的声音）。一切的对立因素都从根本消除，反对的声音不复存在。

思想的极端只会导致野蛮。过分地强调某种单一性，只能塑造新的“神话”。当“激进”超越了革命时期还要继续极端发展，给社会带去的会是更为严重的不安与动荡。本拉登、萨达姆、宗教极端分子、甚至是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无耻争夺，等等等等已然扰乱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研究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接受这一问题的魅力，就在于这个复杂的西方经典文学形象恰恰分别展示了“单面”与“多面”的两极，以及“节制”思想在这两极转化中的重要性。这是任何社会、任何人都避不开的一个永恒话题，而我们随时，也都可能正在犯着普罗米修斯接受问题上的相似错误。

## 第六章 误读之缘由

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德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说：一部作品，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听众新的反响，使其从物质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姚斯在此着重肯定了读者的阅读与阐释对一部作品的意义。他认为正是在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作品中静态的文字得以被唤醒而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普罗米修斯形象在历经近 3000 年的“奥德修斯之旅”中，成为许多时代均可借以表达自我的一种象征，可谓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同时，这也表明了该形象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广博。按照姚斯的说法，后世读者对普罗米修斯原型不断阅读和重新阐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剧作家的创作原意。此种观点自有道理。然而，对于对古希腊文学以及包容于其中的古希腊理性思想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对于试图从本国读者对外来文学形象的不同阐释中找寻背后深刻原因的人来说，我们无法仅仅满足于让作品在读者的不断阐释中“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普罗米西亚》，这样一部能够不断“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的悲剧作品，在中国的读者和阐释者那里，让人深感遗憾地丢掉了最为核心的思想精华。原本被剧作家当做批判对象的 hubris，竟被“误读”成了正面的抗争激情，而与剧本中心表达的“节制”思想南辕北辙。这样的误读自 20 世纪初叶伊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不可否认，不仅是在中国，也包括西方评论界，众多的文学评论者都将普罗米修斯看做是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双方中绝对正义的一方，看做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这种评论定势在 20 世纪末期的西方世界依然兴盛。<sup>①</sup>然而，西方古典学者没有放弃对《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执着研究，并试图从多方位解读“悲剧之父”的这部经典剧作，中国至今却鲜有相关做法，更无系统研究。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中梅发表的《普罗米修斯的 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文之外，国内目前尚未有人从古希腊理性思想角度出发去系统澄清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误读”情况。误读的原因多样而复杂。最为显然的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极端恶劣的时代背景让饱受欺凌的中华儿女心中升腾起对抗暴英雄不可遏制的强烈心理需求。<sup>②</sup>但除此之外，不可排除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相对于普罗米修斯原型的早先进入（早十七年），为人们对普罗米修斯形象注入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换言之，中国人接受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直接源于雪莱、拜伦等人的塑造，<sup>③</sup>而雪莱、拜伦等人又是根据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需要，主观性地截取、发挥了普罗米修斯原型

<sup>①</sup> 参看：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12。

<sup>②</sup> 参看：本文第二章。

<sup>③</sup> 参看：本文第二章。

中符合自我需求的部分。作为国人心目中“十全十美”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早已二度背离了普罗米修斯原型，这也是后者在中国长期处于“形象”与“意义”均未被充分挖掘的“缺失”状态的原因之一。而《普罗米西亚》三联剧中两出剧本的佚失更为人们正确理解普罗米修斯原型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三联剧得以幸存的唯一一出剧（《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恰恰是埃斯库罗斯借以表达“反面教材”（即过分的抗暴激情）的一出剧；而三联剧所丢失的内容，却又正好是剧作家表达的中心，即 hubris 的反面——“节制”——的重要性。

鉴于前文已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语境进行过重点叙述，在本章中，笔者将着重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文化性的角度去挖掘、分析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被“误读”的根本原因。国人对普罗米修斯原型接受上所犯的错误不仅只是时代造成的偏差，更是隐含的民族性与文化性的根本体现。

## 第一节 艰难处境下的实用主义态度

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无需赘言。<sup>①</sup>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勾结卖国求荣，孙中山等人好不容易取得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清朝末期与民国时期的中国，民不聊生，危机四伏。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人们最为需要的正是普罗米修斯彻底抗争的昂扬斗志，以宣泄他们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主义的极端憎恶与愤懑之情，表达他们誓要抵抗外辱、推翻强权的决心和勇气。“妥协”二字，在敌我矛盾剑拔弩张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关乎正义与否的革命斗争中，与“投降”毫无区别，是最为令人不齿的叛徒行径。秋瑾、江姐、殷夫等先烈，为了革命信念舍生取义，用他们的鲜血彰显了誓不妥协、彻底抗争的可贵意义。此情此景之下，人们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具备精力）去探寻一个外来文学形象所携带的真正人文价值。况且，这个外来形象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绝对正面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正是普罗米修斯形象中所彰显的“抗暴激情”，我们也因此非常乐于“拿来”具有此种“抗暴激情”的普罗米修斯。“妥协”二字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不是意味着通过“节制”以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依靠“投降”将民族荣辱放置他人脚下任其践踏。

然而，艰难处境之下人们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误读”，在极为显性的“历史决定论”中，却隐含着人们身上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即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心态。雪莱在谈到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时，表达了他对“普宙和解”情节的难以容忍：“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普罗米修斯那许多痛苦，说过了那许多激烈的言辞，如果我们认为他竟然会自食其言，向他那耀武扬威、作恶造孽的仇人低头，那么，这部寓言的道德意义可能完全丧失……（普罗米修斯）非但勇敢、庄严、

<sup>①</sup> 参看：本文第二章。

对于万能的威力作着坚韧的抵抗……”<sup>①</sup>我们知道，在雪莱生活时期，英国社会黑暗腐朽。雪莱从小便带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与批判意识。他在谈到英国近代文学时说：“我们文学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这许多伟大作家，我们应当去感谢群众心灵的觉醒；它把基督教的古老和严酷的形式捣成泥土。”<sup>②</sup>雪莱、拜伦、歌德等人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重塑”，表达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唤醒了）世界上生活在腐败政治与黑暗法律下的所有人们对于“反抗”与“革命”的向往。在这种背景之下，他树立起一个“十全十美”的作为彻底抗争者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以区别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犯错在先、需要通过“节制”才能走向与对立面和解的普罗米修斯原型。对于以雪莱为代表的深受压迫的人们来说，不推翻现有秩序便难以生存，以昂扬的斗志打碎现实的牢笼才是重点。与雪莱所处的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当时中华儿女对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青睐有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雪莱对《普罗米西亚》三联剧最终结局（即和解）的强烈不满，与中国评论者在该问题上的反应存有微妙差别。郑振铎在首次介绍《普罗米西亚》三联剧结局时仅有一句客观陈述：最终，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复相和好而得了释放。<sup>③</sup>十年后（1934年），他在《取火者的逮捕》一书“序”中，提到“（《普罗米西亚》三联剧）情节还不是反叛的；人和神是终于得到一条和解之路。”他也因此而更加青睐雪莱所写的“以为反叛者的柏洛米修士和暴主宙斯之间是没有重归和好之可能”的‘*Prometheus Unbound*’。郑振铎对埃斯库罗斯表达的“普宙和解”的反应，与雪莱相比，少有主观情感的流露。郑振铎说过：“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他对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以及“普罗米修斯式人物”拜伦等人不可掩饰的喜爱，与他对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普宙和解”情节较为漠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之所以要提《普罗米西亚》三联剧的情节还不是反叛的，是因为他要表达他对“立意在反抗”的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的喜爱。雪莱反对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妥协”，于是揭竿而起，对之强烈批判。而郑振铎的反应，却反映出他对这一情节的冷漠。正如“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然”，雪莱与郑振铎二者正典型代表了对普罗米修斯原型最终走向妥协的“恨”与“漠然”。郑振铎对普罗米修斯走向妥协这一情节的“漠然”，正表达了他对三联剧、对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漠然”。这种“漠然”，有可能成为阻止学术研究取得进步的重大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讲究“用处”，在本性上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实用性。人们评价事物或对象有价值与否的标准，通常就是看其是否具有实用性。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到中国人重视经验与实践，“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sup>④</sup>。“中国简直可说只有实践哲学，而没有纯粹哲学。”<sup>⑤</sup>这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倾向，渗透弥漫在人们对人对事的诸多倾向中，也包括西学接受。在对待西学（其中当然也包括作为西方经典文学形象的普罗米修斯）的态度上，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引入的对象是否能够为我所用。如中国

<sup>①</sup> [英]雪莱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邵洵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原序”第 2 页。

<sup>②</sup> [英]雪莱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邵洵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原序”第 3 页。

<sup>③</sup> 郑振铎：《文学大纲（七）》，《小说月报》1924 年第 15 卷第 7 期，《文学大纲（七）》第 7 页。

<sup>④</sup> 袁贵仁、梁家峰：《中西法律价值观比较的哲学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第 89 页。

<sup>⑤</sup> 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7 页。

当时掀起的“拜伦热”，其实在一开始就存在着偏差。沈雁冰（茅盾）在《拜伦百年纪念》中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但愿盲目的‘拜伦热’的时代已经过去。”<sup>①</sup>“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从根本上振兴中国的科学技术，而是为了“制夷”。近代以来，从人们对西方军事科技的仰慕、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学习、到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整个过程都是“学以致用”思想的体现。传统文化中这种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革命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化。“一切为了革命”的实用主义心态，渗透到了近代西学接受的方方面面。<sup>②</sup>在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接受上，不仅是郑振铎，郭沫若、华林等人都对“普宙和解”表现出了相似的“漠然”。郭沫若在《雪莱年谱》中对“普宙和解”的一笔带过，<sup>③</sup>华林对“伯罗米修士将来终有被释放的一日”不求甚解，<sup>④</sup>这些都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拥有关注“斗争”之外的事情的视角。

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段屈辱的历史中，表现出对普罗米修斯身上“抗暴”一面的青睐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对普宙最终和解情节的“漠然”，有历史的必然因素。普罗米修斯对于宙斯的抗暴，无疑为受压迫的人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这种在激烈的政治矛盾中显现的强烈的政治指向性，本是无可异议。但是，实用主义可以解决一时之需，却会阻碍全面正确的西学接受，使国人在接受的过程中急功近利。

## 第二节 对“隐忍”民族性的反叛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被冲击的过程中，中西文化之间最明显的一点差异显示出来：那就是西方文化主进步，中国文化主保守。<sup>⑤</sup>中国的封建统治在“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sup>⑥</sup>的过程中绵延数千年，中国文明好似一个平静的大湖，停滞不动。<sup>⑦</sup>在这个万物宽裕而且悠久的大湖中，“隐忍”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倡导的重要美德之一。司马迁为著《史记》，自请宫刑，隐忍苟活；王昌龄以隐忍求宽宥，以变通求转机；<sup>⑧</sup>陶渊明怀

<sup>①</sup> 沈雁冰：《拜伦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拜伦百年纪念》第2页。

<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革命”不仅仅是指武力上的革命，也指其他多个方面的革命。中国人民在遭受外来势力坚船利炮的轰击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了本国科技、军事、政治、甚至是文化上的落后性。因而希望通过对自身“全盘”（当然，即使是胡适的“全盘”西化的观点，事实上也只是“半盘”西化。参看陈中梅：《秘索思》，收于《言诗》，陈中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的“革命”以达到对他国学习的目的。

<sup>③</sup> 参看：本文第五章。

<sup>④</sup> 参看：本文第五章。

<sup>⑤</sup> 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34页。

<sup>⑥</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页。

<sup>⑦</sup> 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sup>⑧</sup> 李树志：《世俗的牵绊与心灵的安顿——谈王昌龄的心隐身仕之路》，《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02期，第23页。

“大济苍生”之理想，终至绝望，归隐田园。在个体与封建统治之间发生矛盾之时，人们往往借助“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生哲学。有人指出：“在政治体制高压时代或遭受不公正的政治打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从‘大济苍生’大步后撤为‘独善其身’，以便将其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能的‘国家理想’隐忍不发，并试图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活命哲学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壮士情怀之间取得一种精神平衡，因此，他们常常将其政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寄托在游山玩水、纵情声色或古籍整理之中，譬如魏晋之际的阮籍与嵇康的纵情声色、现代文圣鲁迅的抄写古碑等等。”<sup>①</sup>

“隐忍”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而存在数千年，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因为个体一般可以通过“隐忍”继续“存活”于社会。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安稳的社会外部环境。<sup>②</sup>尽管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封建专制钳制了人性中本能的反抗性的一面。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种治人的文化；而这对广大人民来说，则是一种缺少生命力的奴性的文化。<sup>③</sup>“隐忍”在作为一种传统美德的同时，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缺乏彻底的反抗性、缺乏奔放不羁的冒险的活跃和独创的发展的可悲。<sup>④</sup>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步步逼近，让泱泱大国的宁静与安逸难以继续。“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外来势力的进攻之下措手无策，拱手卖国。华夏子孙在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中受尽欺凌，饱尝屈辱。在封建专制统治中，人们还可以通过“大隐于市”以保全自身，而此时的人们却是无路可退。困于围墙高筑之铁笼中的呆滞眼神与麻木灵魂，必有惊醒的一刻。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终会升腾起中华儿女心中不可遏制的反抗烈焰。这就是“物极必反”，也是“似暴风雨般的躁烈”<sup>⑤</sup>的拜伦在中国“兴盛”的原因之一。然而，人们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深恶痛绝中，却“见识”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政治体制的优势，发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语出魏源的《海国图志》）的必要，并逐渐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偏激性的反感与反叛。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新文学”一扫民初文学的媚世复古与沉闷污浊，肩负起解决时代与文学之对抗性矛盾的历史使命。<sup>⑥</sup>然而，正如余英时所说：“人们也老实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位置，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之。”<sup>⑦</sup>“创新”成为了20世纪多数中国人的“心之所同好”。<sup>⑧</sup>文化上主保守的中国人在面对激进的西方文化时，走向了对自身保守文化的极端反叛。“革命”的旗帜不仅对准外来势力，也对准了中国的“孔家店”。

<sup>①</sup> 傅守祥：《大众文化审美化：从纯审美到泛审美的范式转换》，《天府新论》2006年第6期，第129页。

<sup>②</sup>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千多年的历史呈现出超稳定性。”王琮：《儒道互补的中国人性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结构》，《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18卷第2期，第4页。

<sup>③</sup> 王琮：《儒道互补的中国人性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结构》，《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8卷第2期，第7页。

<sup>④</sup> 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sup>⑤</sup> R.H Bowles 著：《拜伦的个性》，顾彭年译，《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第8页。

<sup>⑥</sup> 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之《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sup>⑦</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sup>⑧</sup> 所以我们才有这六七十年来的不断“革命”。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基于上述的“反叛”心理，自20世纪初叶伊始，经由鲁迅、郭沫若、郑振铎、杨晦、茅盾以及文研社与创造社等诸多成员的介绍与翻译，普罗米修斯原型及近代形象均被作为一个彻底的反抗者与革命者的象征进入中国并引起激烈反响。经由中国学人的理解与阐释，普罗米修斯完全成为了“革命者”的代言人。这个形象极大地吻合了当时人们对抗争英雄典范的实际诉求，带给“立意在反抗”的仁人志士以前所未有的昂扬斗志。<sup>①</sup>人们需要的正是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般革命斗志的、彻底反抗的普罗米修斯。

我们从《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的第一位译者杨晦身上，可典型地感受到当时人们对“彻底反抗性”的强烈诉求。出生于东北贫苦农民家庭的杨晦，从小便忧虑于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在外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欺凌，内受军阀残酷统治的时代背景中，杨晦认识到在这充满了“战斗”、“流血”和“死亡”<sup>②</sup>的“污秽卑劣”<sup>③</sup>的社会中，进行毫不退缩的战斗的必要性。他善意地批评好友冯至，说后者作诗时（对于政治）的冷漠态度让人感觉很不舒服，<sup>④</sup>并表达了他自己的希望：“你（冯至）要愤激，你要愤激地反抗一切。要于百炼之后如同精金一般；要于疮痛之余不肯低头；这才显出真正强者的本色。”<sup>⑤</sup>20世纪30年代中期，杨晦担任历史课程老师。他经常在课堂上旗帜鲜明、毫不含混地针砭时弊、宣传抗日、反对法西斯主义，并因此遭到恶势力的迫害。<sup>⑥</sup>这样的杨晦，显然是能与具有战斗激情的普罗米修斯产生强烈共鸣的杨晦。他将普罗米修斯原型身上那放荡不羁的 hubris “误读”成正面的抗争激情也属情理之中。社会一片黑暗，暴君支配一切。而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却能在如此恶浊的现世环境中，培植出难能可贵的伟大的人格。<sup>⑦</sup>这是杨晦对自己、对冯至、甚至是对全体中华儿女一种深刻的期许。他呼唤普罗米修斯的提坦精神在这“尘浊卑微的人间”“复活”，<sup>⑧</sup>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普罗米修斯式救世英雄的渴求。普罗米修斯俨然成了杨晦时代的革命先驱：“且燃起你那伟大高洁的圣灵之光，作我们黑暗中的导引！复活你那坚韧的反抗和为人类牺牲的精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好同黑暗中的一切抗战！——”<sup>⑨</sup>

郑振铎在表达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之所以“不朽”的原因时说：剧作家是一个“勇敢而感动人的先驱者”，其剧作充满了“恐怖、震栗的权威”和“激动的热情”。他这样介绍自己根据普罗米修斯神话题材所作的《取火者的逮捕》一书：“（该书）描写‘神’的统治的横暴与歌颂‘人’的最后胜利。虽然写的是古代的希腊神话，说的却是当时当地的事。‘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有大不得已的苦衷的。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在中国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残酷无比的统治者和喽罗们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们和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没有一天不在张牙舞爪地择肥而噬。恐怖的空气笼罩在大地之上。却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在

<sup>①</sup> 参看：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sup>②</sup> 《从癸亥年到癸亥年》，第6页，收入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③</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sup>④</sup> 《从癸亥年到癸亥年》，第6页，收入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⑤</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sup>⑥</sup> 《从癸亥年到癸亥年》，第2-7页，收入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⑦</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sup>⑧</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sup>⑨</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任何的压迫和横暴，坚贞地从事于革命事业，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我写这部东西的当儿，是从萧杀的秋天，经过狂风虎虎的冬天，到繁花怒放的春天的。满腔的悲愤，一肚子的牢骚。却也就在这最黑漆漆的夜里看到了将要到来的黎明时的红色曙光。”<sup>①</sup>社会黑暗恐怖，在这黑暗恐怖的社会中奋起抗争是人心所向。郑振铎将自己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改编视为一部实实在在的“预言”之作，他坚信此番“预言”最后定会实现。<sup>②</sup>在郑振铎笔下，普罗米修斯完全成了“人”的代言人：“‘人’是终于光辉地得到最后的胜利了！那是人类发展的规律。被注定了要灭亡的横暴的统治阶级，是任怎样也不可能挽救其悲惨的命运。”<sup>③</sup>

灵珠也对“受压”与“反抗”之间的关系有过相关论述。他说“一切伟大的悲剧皆起于两种对立的势力的斗争：一方面是执着的生命力之反叛，突击，挣扎，他方面是环境的阻力之磨折，压迫，摧残，而至加以毁灭。”<sup>④</sup>特殊的时代背景，让深受压迫、隐忍已久的中国人深深明白了“抗争”的意义之所在。也只有以“抗争”为主题的文学，才足以表达人们对摆脱亡国危险、重塑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迫切愿望。作为“抗暴者”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兴盛也正在于此。<sup>⑤</sup>当时的中国，必须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赶走外来侵略，正如人们所认为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人民利益”的普罗米修斯必须要将代表强权的宙斯拉下神坛一样。比起普罗米修斯形象中所包含的誓要与强权斗争到底的精神，埃斯库罗斯在该形象中寄寓的城邦社会如何解决争端、平息内乱的理性精神，对近代以来受尽欺凌的中华儿女来说，确实比较遥远。

面对外来势力的欺压与凌辱，彻底的反叛性表达了人民保家卫国的凛然正义。然而，正如上章指出的，当民族矛盾得以解决之后，当致力于从多年的斗争中恢复元气以建设新中国之时，是否还有必要将斗争推向极端？“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依然令人痛心。中共中央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步骤。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同样也是正确的。然而，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一大批忠贞之士的身心带去了可怕的伤害。《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一诗的作者林昭便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员。在那黑暗、恐怖、荒唐的政治高压中，林昭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她所感受到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用彻底的抗争——“死”——象征了正义的不灭，宣示了思想的高扬。一个年轻美好的生命也因此走向了灭亡。然而，“百度百科”上关于林昭如下的评论却令人警醒和深思：“根据越来越清晰可靠的材料，林昭本来并不激烈，厄运本来是可以逃过的……她的一些抗争看上去毫无意义，考察林昭的行为，正如她的难友们所说，的确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林昭偏要以自己这颗鸡蛋的微薄之力去碰石头。她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

<sup>①</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新序”第 I 页。

<sup>②</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新序”第 II 页。

<sup>③</sup>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新序”第 II 页。

<sup>④</sup>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 年第 6 卷第 5 期，第 44 页。

<sup>⑤</sup> 在《青年与文艺作品》一文中，杨晦指出由于现实生活不能满足青年的要求，不足供青年的驰骋，青年们便只能将感情与理想投射到文艺作品中去。这也正是普罗米修斯近代题材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

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这话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将军或政治领袖们在做战前动员时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林昭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用自己的生命真实地表达了普罗米修斯彻底抗争的精神。然而，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却让人终感一丝遗憾。<sup>①</sup>季羨林被关牛棚，不忘翻译“印度史诗”。抱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志赴死是一种气度，用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战胜敌人的迫害可能不仅需要气度，更需要广博的胸怀和理性的思想。

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一书中指出 20 世纪的中国人价值取向上的极端化：西方人有一种“容忍”的观念。在西方人眼光中，“创新”与“保守”毋宁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互倚关系，无论是个人或整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个别的思想家也许称之为“革命”的或“保守”的，然而细加分析则“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者的思想中也未尝没有“革命”的因子。<sup>②</sup>而现代中国人将“创新”和“保守”两种价值极端对立化，价值取向的主流偏向在“创新”一边。其中原因复杂，但政治所负的责任应该要比思想、学术来得大。<sup>③</sup>中国人因为处于特殊的革命时期，而抛弃了儒家文明中的中庸思想，反而变得更为偏激。“创新”是二十世纪多数中国人的“心之所同好”，所以我们才有这六七十年的不断“革命”。<sup>④</sup>

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革命文学当道的事实，文学作品丧失了文学性，剩下的只有政治意义；正如左翼文学的主要作用是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再是履行文学或审美的功能。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便是为了猛烈地批判旧传统、旧文化，批判封建意识形态。

《摩罗诗力说》中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与中国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必然导致人们将普罗米修斯简单地定性为一名“抗暴英雄”，而忽略普罗米修斯原型中隐含的人文价值。20 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去到日本留学，而最终对整个留日学界构成主流影响的是“排满革命”的追求<sup>⑤</sup>。他们以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为主要任务，以求民族独立

<sup>①</sup> 普罗米修斯原型与近代形象的根本区别在于：普罗米修斯原型在表达“抗暴”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的是实际事态的解决。鲁迅早年曾羡慕撒旦的翅膀、普罗米修斯的提坦精神和耶利米的语言之声。通过对于反个人的和限制人的原则的根本克服，通过树立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摆脱传统教条的、趋向于在各个领域之内进行自由表现的个性，创造性个性的传统发展过程在鲁迅哪里臻于极致。然而，这样的个性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将“自我”绝对化的个性。作为一切新的价值之本质的“真狂”从未成为一个更深刻的概念。因为在这个概念中存在着他的个性主义的弱点：强于破坏，弱于建设。鲁迅最终明白：即使是最有力量的人，当他无可避免地命定要躺在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近旁时，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参看：[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 页）甘乃光在《拜伦的浪漫性》一文中对拜伦的评价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拜伦的）反抗性是一种静的反抗性，是一种诗人的反抗性，或更可说是一种无抵抗的反抗性……这种实在是伟大的情感，并且是很英雄的气概，但并不是合适的品格。”（甘乃光：《拜伦的浪漫性》，《小说月报》1924 年第 15 卷第 4 期，第 4、6 页）徐祖正在《英国浪漫派三诗人》中也说：“他们（撒旦派诗人）全然不知道什么利害打算，赤手空拳的同旧社会接触。实在都是纯洁无垢的小孩子，一直到死是个天成的小孩子。在饱尝世故的人看来，他们真是空想的实行家，大都做些好笑的事。”（徐祖正：《英国浪漫派三诗人》，1923 年《创造季刊》第 4 期，第 16 页）

<sup>②</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4 页。

<sup>③</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5 页。

<sup>④</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8 页。

<sup>⑤</sup> 陶东风主编：《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与人民解放。革命成了唯一的“救亡”之道。<sup>①</sup>有统计显示，20 世纪的 100 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动荡的 100 年，“革命”是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sup>②</sup>正如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推翻宙斯的统治一般，人们希望彻底推翻清政府以及依附于清政府的洋人统治。毛泽东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做了如下肯定：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自有中国革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sup>③</sup>五四运动的彻底性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必要的，作为抗暴者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恰好是表达此种彻底性的标榜。然而，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彻底性”的趋同与认可中，普罗米修斯原型身上的深刻理性精神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sup>④</sup>

“伟大的精神灭亡了！高洁的心情死亡了！甚至凶恶的魔性都失掉了；只剩下小鬼们的出没游离……”<sup>⑤</sup>此种现状之下，的确需要复活坚忍的反抗精神以同一切黑暗势力相对峙。此时即使撒旦现身，想必也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在“秩序”已然建立的新时代，我们更为需要的不是斗争，而是如何维护、巩固通过斗争得来的稳定局面，以遏制、消除不利于和平的种种潜在危险。余英时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政治意识的过分突出是一个长期而普遍的现象。正由于这一意识的泛滥，才会有大陆‘文革’时代那一类荒谬绝伦的想法……”<sup>⑥</sup>革命后的问题，还要转移到建立一个较为理想的政治秩序究竟需要何种文化条件的问题。革命不只是指其激烈的变动过程，而是指其全新的结果。<sup>⑦</sup>而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正是致力于表达经历“激烈的变动过程”之后如何维护、发展“全新的结果”的问题，正是要探讨如何现存的政治秩序中如何解决内部矛盾的问题。

## 小 结

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中国的接受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误读”，背后隐含了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性与民族性。除开上文所述，一个“十全十美”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还表达了人们对伦理道德完满性的要求。梁漱溟说：“以

<sup>①</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 页。

<sup>②</sup> 陶东风主编：《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导论”第 1 页。

<sup>③</sup> 陶东风主编：《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sup>④</sup> 尽管鲁迅没有对普罗米修斯的两个里程碑形象之间的区别做出过相关论述，但作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鲁迅看待问题具有极强的辩证性。他在《火》（一）一文中说到燧人氏发明火带给人类的益处，然而他同时也讲到：“‘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时起来的便是火灾了，甚而有人故意放起火来……”（鲁迅：《火》（一），1934 年《清华周刊》第 41 卷第 3/4 期，第 1 页）鲁迅在此其实巧合地指出了中国对普罗米修斯形象接受偏差的原因及后果。

<sup>⑤</sup>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 页。

<sup>⑥</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 页。

<sup>⑦</sup>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3 页。

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sup>①</sup>西洋之所尚，在伟人；中国之所尚，在圣贤。<sup>②</sup>在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因一己受辱而拒绝出战，但这并不影响他依然拥有“希腊第一勇士”的称号。骁勇善战的他毫不逊色于因保家卫国而丢失生命的赫克托耳。西方对“力量”的认可可见一斑。而对中国人来说，“圣贤”是指“圣人和贤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圣人”的解释之一是“旧时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左丘明在《左传》中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指树立道德，即提高道德修养，给人们树立道德方面的榜样。曹操一世枭雄，也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中国人以道德代宗教，<sup>③</sup>内心对道德保有一种仰视态度。由其仰视，而将道德视为神圣完美之物，正如西方人奉耶稣为救世主一般。因此，中国人崇拜的英雄一般都具有道德上完满性。也正源于此，人们才会对“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的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如此青睐，以致他的光芒盖住了普罗米修斯形象演变过程中的其他诸多形象。如华林对普罗米修斯的赞美是：“绝对没有人类的弱点”。<sup>④</sup>只有具备彻底抗争性的，而不是最终妥协的“十全十美”的普罗米修斯，才能成为中国人道德上的楷模。<sup>⑤</sup>

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遭到的“误读”，还体现了中西方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不同态度。西方人始终在团体和个人的两端，此高彼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不已。<sup>⑥</sup>表达城邦整体利益的普罗米修斯原型的创作者埃斯库罗斯，可与莎士比亚并肩；表达个体反抗性的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被尊为“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而在中国，梁漱溟在谈到中国人的集体生活这一点时说：“（中国人）或者受人支配做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sup>⑦</sup>这也正是“拜伦式英雄”在中国兴盛的原因之一，华林在1928年便指出“他（拜伦）完全是一个‘反抗社会的个人主义’的人”。<sup>⑧</sup>而埃斯库罗斯通过普罗米修斯原型表达的是神族内部的冲突，重点说明的是个体的节制以及双方的协商与谈判的重要性。普罗米修斯在表达了他对于宙斯暴虐统治的不满之后，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本应有的位置。而在“一乱一治”的中国封建时代，有能力便推翻当权的“宙斯”，没能力便做顺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平共处”，都建立在武力的征服与被征服上，而不是各方各退一步协谈商量，以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sup>①</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sup>②</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sup>③</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sup>④</sup>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1926年《民铎》第7卷第3期，第13页。

<sup>⑤</sup> 在此问题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美德”的定义与看法或许会为我们提供另一种可贵的视角。苏、柏二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是：“美德即知识。”（参看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页。）换言之，道德（或美德）的观念并非绝对，而是可被商讨，需接受“知识”的检验。《圣经》文化所推崇的某些美德（如信仰、谦卑、慈爱等）在古希腊文化里并不占有“美德”的地位。按照苏、柏二人的观点，一味的高尚含有走向反面的危险，诚如太过理性走向“反理性”一般。鲁迅就表达过“仁”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不仁”的思想。被定位成毫无缺点的、十全十美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中同样隐含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sup>⑥</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sup>⑦</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sup>⑧</sup> 华林：《拜伦的浪漫主义》，1928年《贡献》第2卷第8期，第46页。

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误读”，直接来源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然而，普罗米修斯不仅是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更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文化的某些根本性特征。

## 结 语

普罗米修斯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普罗米修斯的两个里程碑形象——古希腊原型和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在进入中国后，因其中一个形象（近代形象）的过分展现而失去了二者原本应该受到制约的平衡。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普罗米修斯原型。这并非只是一个一味抗争的“单向度的人”的形象，而是一个与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有着显著差异的复杂形象。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该形象身上寄寓了深厚的理性精神，是古希腊思想的精华。然而遗憾的是，受限于诸多原因，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长期被“误读”，与普罗米修斯近代形象一起参与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对“革命英雄”形象的期待与建构。革命胜利之后，随着对革命的反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人们的价值观也开始逐渐得以转变。普罗米修斯原型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对抗强权的斗争者形象，其更重要的魅力在于它远为开阔、丰富与复杂的视野。希腊当代著名导演奥多罗·特尔左普罗斯指出：“古希腊悲剧所提供的文本是永恒的诗，它的内涵远远超越于那个时代，指向全人类终极的普遍哲理。”<sup>①</sup>埃斯库罗斯为人们展现了矛盾双方在经历惨烈的斗争之后如何艰难地走向建设性的和平之路的过程。斗争只为解决一时的矛盾，和平才是人类永恒的期待。揭开一直遮盖普罗米修斯原型真相的幕帘吧，我们需要对这个形象进行概念上的澄清、形象上的还原和意义上的挖掘。

本论文第一章指出普罗米修斯形象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奥德修斯之旅”。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今人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和“普罗米修斯式人文主义”等术语的指代。在漫长的形象变迁中，埃斯库罗斯塑造的古希腊原型和以雪莱等人为代表塑造的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成为了普罗米修斯形象史上的两座丰碑。第二章介绍普罗米修斯形象进入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普罗米修斯原型，还是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甚至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都更多地被理解和阐释成为了绝对正面的革命者形象，“单向度”地变成了彻底的反抗者、革命者的化身。即使偶尔有人提及原型身上相异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式理解的成分，基本上也只是隔靴搔痒。人们说到普罗米修斯，并不区分是哪一个普罗米修斯，而只关注他所代表的革命与抗争的崇高意义，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第三章指出普罗米修斯原型并非是一位“十全十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形象。普罗米修斯盗火致送凡人的行为中不能排除他借此与宙斯抗衡，从而带有一定“挑衅性”的动机。并且，站在神界立场，普罗米修斯私盗天火的行为侵害了神族利益，扰乱了神界秩序；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打击报复并非全无道理。而在受罚过程中（被绑高加索），作为“预见之神”的普罗米修斯却因为拥有对预知结局洞察的能力以及作为神明的“不死”的属性，在与宙斯的抗争过程中走向了

<sup>①</sup> 贾舒颖：《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与独树一帜的“身体戏剧”》，《艺术评论》2008年第8期，第72页。

过度的骄横。也正因为此，普罗米修斯并非全无所惧。因为他的预见能力带有“有限性”，拥有的只是卜释意义上的预知。此种性质的预知只能赋予当事者对抗苦难的一时豪情，却难以成为信念与信仰上的“理性”支撑。因此，普罗米修斯最终与宙斯的妥协也属“顺理成章”，普罗米修斯最终成为了一个“投降者”。第四章指出埃斯库罗斯寄寓在悲剧中深刻的理性精神。剧作家正是通过塑造同样具有缺点，但同时又具备某种优点的两个复杂形象，以说明“节制”这一古希腊文化中的大智慧在从“斗争”走向“和解”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五章指出普罗米修斯在中国遭到“误读”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国内评论者先入为主地将“英雄”，确切说是“完美英雄”的概念，强加在了普罗米修斯身上，并将这样的“完美英雄”看做革命者的代言人。按照此种观念，人们单纯、单一地理解与“修正”普罗米修斯原型，使其契合人们心目中对“理想革命者”形象的定位与向往。关于普罗米修斯形象的诸多介绍、评论以及再创造，都只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中华儿女于“立意在反抗”的主旨下，失掉了接受与该主旨存有任何抵牾思想的兴趣。人们关注的只有“反抗”、“革命”，而对“反抗”与“革命”失去了反思、批判与超越的能力。普罗米修斯原型的中国式理解，“缩水”成为了一个绝对正义的“单面”的“神话”。第六章分析普罗米修斯原型在中国的“误读”背后隐含的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性与民族性。普罗米修斯不仅是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更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影射的是中国文化的某些根本性特征。

普罗米修斯原型并非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人”的形象。他展现了“必然”（“命运”）与“理性”的结合，以及在此结合过程中“妥协”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后现代思想所探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英文参考资料

- Brunel, Pierre.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Greene, David. *Aeschylus II*, (trans. a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Guthrie, W. K.C. *The Greeks and Their Gods*, Boston, 1955.
- Hogan, James C.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Lattimore, Richmond. *The poetry of Greek Traged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ffan, John (trans.), *Greek Religion* (Burker),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Scully, James and Herington, C. J (trans.), "introduction", *Prometheus Bound*(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homson, George. *Aeschylus and Athe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0.
- Weil, Simone.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Greeks*, London and New York (first published 1952), Routledge, Reissued 1998.

### 中文参考书目

- [古希腊]埃斯基拉:《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杨晦转译,人文书店印行民国21年8月版。
- [古希腊]艾斯吉勒斯著:《浦罗米修斯被绑》,李健吾译,平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版。
-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曹兴:《超越神话——古希腊人的哲学智慧》,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 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陈中梅:《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陈中梅:《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陈中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成芳编：《我看尼采——中国学者论尼采（1949年前）》，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杜丽燕：《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
- 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
- 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英]J. G. 弗雷泽著：《金枝》（下），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 2006 年版。
- [英]简·艾伦·赫丽生著：《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谢世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 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 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
- 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
-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
-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梁宗岱译：《一切的峰顶》，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 [德]吕迪格尔·萨弗朗斯基著：《恶或者自由的戏剧》，卫茂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罗念生：《从芙蓉城到希腊》（《罗念生全集》第九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罗念生：《书信、自撰档案摘录及附录》（《罗念生全集》第十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六卷·小说 剧本），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
- 瞿秋白：《文艺论辑沙，瞿秋白文集》（二集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
-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 [法]让-皮埃尔·维尔南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一），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 陶东风主编：《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美]托马斯·R. 马丁著：《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杨敬清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
-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2），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
- 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 [英]雪莱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邵洵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著：《希腊人与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修订版。
-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 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之《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叶秀山：《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
-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
- 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
- 祝宏俊：《古希腊节制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 中文参考文献

- 陈婧陵：《普罗米修斯的历险——一个古希腊形象的中国流传与挖掘》，《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 傅守祥：《大众文化审美化：从纯审美到泛审美的范式转换》，《天府新论》2006年第6期。
- 李树志：《世俗的牵绊与心灵的安顿——谈王昌龄的心隐身仕之路》，《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02期。
- 刘东玲：《革命话语：政治先锋下的个人主义激情——20世纪20年代末普罗文学现象及其命运》，《学术月刊》，2010年6月第42卷6月号。
- 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王琼：《儒道互补的中国人性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结构》，《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18卷第2期。
- 王甜甜：《变异与重塑——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与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吴均：《论中国译介之魂——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严宝瑜：《冯至的歌德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0卷第4期。
- 杨武能：《狂飙突进的号角：关于普罗米修斯及其它颂歌》，《名作欣赏》1987年03期。
- 杨义：《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学术界》总第128期。
- 叶隽：《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普罗米修斯〉断片中的“宿命叛逆”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 余冰：《欧洲文学中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嬗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 中文参考文献

- [英]拜伦著：《普罗米修斯》，朱维基译，载于《诗人丛刊》1939年
- 樊仲云：《诗人拜伦的百年纪念》，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
- 非力·魏斯特姆著：《雪莱小传》，潘纫秋译，《青年诗人》1946年第3期。
- 郭沫若：《雪莱年谱》，《创造季刊》1923年第4期。
- 何肯：《献诗》，1927年《话剧特写》第1期。

- 洪深：《希腊的悲剧》，《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3期。
- 胡韵华：《希腊戏剧及其作者》，《青年月刊》1937年第4卷第6期。
- 华林：《希腊悲剧的研究》，《民铎》1926年第7卷第3期。
- 李得木司基：《普罗沫司》，《燕大月刊》1930年第7卷第1-2期。
- 梁遇春译：《论雪莱（续第十一号）》，Robert Lynd 著，《北新》1929年第3卷第14期。
- 柳无忌：《希腊悲剧中的人生观》，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
- 吕亮耕：《火的宣示》，《创造月刊》1942年第1卷第3期。
- 鲁迅：《火》，1934年《清华周刊》第41卷第3/4期。
- [德]马克思：《〈博士论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 缪灵珠：《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
- 潘纫秋译：《雪莱小传》，非力·魏斯特姆著，载于《青年诗人》，1946年。
- 沈雁冰：《拜伦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 诵虞：《拜伦名著述略》，《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 王统照：《拜伦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评论》，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
- 西谛：《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 西莽：《火》，《读书生活》1942年第1卷第1期。
- 潇霏：《火的微笑》，《华文大阪每日》1940年第5卷第6期。
- 徐志摩：《拜伦》，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4期。
- 徐祖正：《英国浪漫派三诗人》，1923年《创造季刊》第4期。
- 玄珠：《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文学周报》1929年第7卷。
- 严杰人：《今之普罗米修士》，《文艺阵地》1941年第6卷第4期。
- 因子：《火》，1946年《时代（重庆）》第9期。
- 张定璜：《Shelly》，1923年《创造季刊》第4期。
- 张闻天：《勃兰兑斯的拜伦论》，《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 郑思：《火》，《诗创作》1941年第6期。
- 郑振铎：《文学大纲（七）》，《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7期。

## 后 记

去年的冬天特别地寒冷。在好几个下雪天，行走在从家到对面学校的泥泞路上，我都在想着这篇博士毕业论文真正“出土”的那一刻。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欢欣愉悦？或是狂喜交加？只是，真正到写“后记”的时候，我反而却异常平静。30多岁的年龄、辞职、带着幼小的孩子，回首自己读博的三年，这其中的辛酸唯有我自己能够体会，这其中的快乐也是难以言传。

不可否认，在我这个年龄还在上学、还要奔波于求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人生已然走向了与大众生活不谐和的“偏执”。在别人看来，我衣食无忧，生活安逸，无需受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所忍受的是一种意识上的痛苦、观念性的痛苦，是我出于长期对知识的渴望而又不可得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痛苦。那么我想追寻的“知识”究竟是什么，对我自己而言这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读博的动因，竟是我想通过模糊的“知识”将自己与芸芸大众相区别。我想中国的许多博士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早就开始被嗤之以鼻，但这种思想根基却依然牢固地存在于那些必须要靠自己努力才能实现自己某种愿望的人的头脑中。三年前的我便是如此。所幸的是，我并没有在一个模糊的考博动因之下虚度三年。三年前，古希腊文学对我来说，只是一堆遥远的神话。感谢我的导师陈中梅先生，是他真正把我领进学术的殿堂，让我明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接近知识的锋芒。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帮助。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陈中梅先生。在论文的最初构思中，陈先生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我的整体思路，让我深切体会：“智慧来自痛苦的煎熬”。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更是细心地为我每个章节进行修改。感谢郑飞师姐这三年来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鼓励。感谢研究生院的栾贵川老师，虽只是通过邮件，在论文构思之初却深刻地体会到他对晚辈的关爱。感谢我的同门杨秀敏同学细心校对我的论文；与她的交谈是灵魂上的享受。感谢外文系张之栋、魏媛媛同学为我论文中有关英文翻译的大力相助。感谢我的家人为我读博三年的付出。

本人资质平平、才疏学浅，文中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各位老师及同仁批评指正。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普罗米修斯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形象变迁》，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B类），2013年02期。